
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

——非常态与新常态

胡令远 等

一、引言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 and 变化,中日关系也进入多事之秋。特别是随着两国综合国力的逆转,既有及新产生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两国关系一度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

如若中日两国战略对峙的态势长期持续下去,作为一水之隔的世界一大一强的邻国,不仅彼此要耗费大量战略资源,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来说,也绝非福音。

在两国关系的至暗时期,双方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致力于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政治学者、曾获孙平化著作奖、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希望能拿出“复旦方案”。具体做法是打造中日两国专家学者交流的机制化平台,以共同撰写《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方式,在深入探讨交流、切脉问诊的基础上,拿出切实的建言献策方案,为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贡献政治智慧。

由此,经 2014 年尝试之后,自翌年始,由中日两国一线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次第展开。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一合作方式本身即逐渐引起双方社会广泛关注。同时,为处于“现在进行时”的中日关系所做的及时、集中解读及其应有的方向性,做出了独特贡献。

2019 年秋,2014—2018 五个年度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结集后,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审定中,敬请期待!相信这本凝聚了中日两国诸多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书,对于深切认识五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中日关系,必将有所裨益。

这五年的中日关系报告书中,都包含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直面日益崛起的近邻中国,虽

然日本在经贸领域总体上视之为自身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从经济低迷期走向复苏的战略机遇,但在安全保障、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战略性疑虑和担忧。而且,这种疑虑,正逐步衍化成在战略上与中国相拮抗的日本的国策。而崛起中的中国所宣示和践行的和平发展理念,对日本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印证。如何化解日本战略疑虑、防止其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就需要中日共同探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新的战略平衡点何在?两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何在?对此,在持续深入的交流和共同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共识,谋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不言而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日两国学者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正是这种尝试之一。

继 2014—2018 五年合集之后,2020 年 2 月,复旦大学又推出了第六个年度的战略报告书《中日关系 2019:新时代的入口与阈值》。遗憾的是,在报告书撰写的关键时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报告书未能邀请日方学者共同撰写。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天灾之外,特朗普政府使中美关系陷于深渊。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尚未最终定型并会有所调整,但人们普遍认为总体不容乐观。而且,对中日关系而言,不同于特朗普时期的拜登政府的盟国策略,必然会给“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数。

今年,中日两国学者再度合作、共同撰写的《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非常态与新常态》正式发布。在对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中日关系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揭示了“非常态”下两国关系所显示的若干新特点。鉴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报告书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用两个专章重点考察了其对中日关系的意义,试图描述出“新常态”下中日关系的剪影。

本年度的报告书,依然采取了由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内容进行评论的方式。其间,两国学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共识所在多有;同时,意见相左、甚至歧见很大之处也不鲜见。不言而喻,基于民族立场的单向性思维很难全面客观把握认识对象,只有换位思考才能有助于探求认识对象的本质。

在新冠疫情尚未终息的今天,特别感谢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加茂具树教授及田岛英一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东京大学伊藤亚圣副教授等日本学者多年来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贡献。对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风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宋志勇研究员、复旦校友、旅日资深学者汪鸿祥教授、复旦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谢忱!对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吴寄南先生、原日本驻沪总领事、东京大学

教授小原雅博先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事务所小栗道明所长、日本学者太田宏昭教授等,在历年发布会上对报告书所作的精彩点评,谨表谢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对各年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撰写、发布以及结集出版等,自始至终给予悉心指导和鼎力支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对报告书的结集出版惠予指导并玉成其事。对此,谨表敬意!

二、总论

总论一 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变故与常态

胡令远 臧志军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端年份: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截至年底全球感染者已经突破7000万,其中死亡者高达160万,可谓公共卫生事件的一场浩劫。

受疫情影响,战后70余年来世界经济呈整体衰退最严重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GDP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世界经济将萎缩4.4%。

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格局也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其与美国大选年重叠。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在这次空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依然坚持“退群”,威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从而使美国继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再次从道德高地大幅滑落。这一方面导致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进一步动摇,预示世界格局将以疫情为契机迎来重大变化与挑战;同时,在人类面临巨大灾难之时,全球治理也曝露出极大缺陷。

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我们也看到人类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美与善。虽然新冠疫情尚未终息,但随着疫苗的普遍使用,拐点应该不远。痛定思痛,人类如何接受这次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深刻教训,摒弃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繁荣的世界,应该说新冠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

2020年,本应是为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注入巨大动力的关键年:因为预定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2年再次正式访问日本;此外,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峰值,预期将有1000万以上中国人去日本观光旅游。以此为杠杆,将会大大拉动中日经贸关系。

然而,2020年的三大变故,给日本和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数。一是天灾,日本新冠疫情感染者年底已达24万人,死亡3400余人。二是8月28日,安倍晋三首相突然宣布因病辞职,官房长官菅义伟匆忙接班。三是美国的大选年,也给2020年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但总体来说,2020 年中日关系所呈现的基本状态及其特点,说明新冠疫情下的 2020 年虽属“非常态”的年份,但近年中日关系改善的趋势、两国致力于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所形成的“新常态”,并未因新冠疫情而改变。

一、政治外交总体稳定、经贸合作显示韧性

通观 2020 年,日本虽然遭遇新冠疫情与首相更迭,但政局与社会基本稳定。而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后,总体企稳的基本方向也并未改变。风险可控、前景可期,是其基本态势。

但 2020 年适逢美国大选,其与新冠疫情的叠加,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愈加难以理喻,呈现出完全失去理性的疯狂状态。雪上加霜的中美关系,不言而喻,也给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投下阴影。

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外交领域,主要表现在疫情政治化、涉海、涉港,乃至中日两国原定的重大政治议程等方面。如关于疫情的起源以及中国的应对方式,日本部分政客跟风美国,将疫情的扩散归咎于中国,攻击中国应对疫情模式之外,还把中国对其他国家抗疫的物资援助等政治化,所谓借疫情外交扩大中国的影响力等。在涉海、涉港问题方面,8 月 7 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防长举行会议,重申所谓反对中方在东海、南海所采取的破坏地区局势的行为,强调维护地区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三国还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表达了所谓“关切”。与此同时,美国罔顾疫情肆虐,在南海继续实施所谓“自由航行”,并大打台海牌。在美国加大在东海、台海、南海、印度洋挑衅中国力度的背景下,日本也借机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指责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驱逐日本渔民“正常作业”、以及加大对钓鱼岛巡航力度和频度等。11 月 3 日,美日印澳共同举行“马拉巴尔”联合海上演习。日本共同社称这次演习,是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下的深化合作,训练目的在于制约中国。另外,对于中日两国疫情之前达成的、包括我国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等政治议程,如何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得以践行的问题上,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消极动向和杂音。

以上种种,表明中日关系在一些敏感领域的短板,并未因为疫情而暂时消弭,反而由于美国因素的刺激,依然对中日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接任的菅义伟政府基本承袭了安倍执政后期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新冠疫情、首相更迭、美国因素也只是把它们消极效应投射到中日两国传统的短板领域而已,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企稳向好的大方向。这充分表现在,疫情中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11 月 24 日访问日本时,与菅义伟政府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包括:一、遵循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精神,增进互信,正向互动,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二、继续携手抗击疫情,及时交流信息,开展医疗药物方面合作,维护两国民众健康,并为地区和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作出贡献。三、合作推进两国经济复苏,明年适时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继续加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电子商务、第三方市场等重点领域合作。四、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共同维护和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五、相互合作,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办好这两大盛事。适时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疫情结束后全面恢复双边人员往来,扩大地方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优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六项具体成果:一是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于本月内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进一步促进两国复工复产合作;二是建立中日食品农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加快沟通协调,推动该领域合作早日取得进展;三是建立两国气候变化政策磋商机制,推动气变环保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四是启动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并积极考虑将原定于今明两年举办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顺延到明后年;五是下月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强化两国外交主管部门和海上执法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六是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

以上重要共识与具体举措,为缓解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增强政治互信,管控危机,共同应对疫情与全球治理、深化经贸合作等,擘画了努力方向。

而在经贸领域,虽然疫情之初,曾产生因为供应链问题,日本政府出台协助日本在华企业撤回国内或向其他区域转移的政策,但其后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疫情较早较快得以控制,日本在华企业成为该企业集团业绩最好的海外企业。中国今年有望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日本GDP在第一季度下降3.4%之后,第二季度再度下滑27.8%,为战后最大降幅,预计全年实际增长率为负5.5%。因此,一般判断,疫情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将会增大。中日两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势在必行。

而2020年经贸领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RCEP的签署,预示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成功启动。同时,RCEP的签署,也意味着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被唾弃,对中国的一系列围堵遭遇严重挫折。而借助这一合作平台,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王毅国务委员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在助推RCEP成功签署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日本曾经将印度的加入作为其在RCEP中平衡

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表示要与印度一起参加 RCEP;当印度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宣布不参加 RCEP 后,日方曾经明确表示“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 RECP”。^①虽然 RECP 是一个多边经济框架,并非中日两国双边的经贸安排,但是事实上日本方面一直将其视为中日两国角力的重要场所。在美国特朗普政权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的背景下,日本放弃原来的立场,在印度没有加入的情况下签署 RECP,清楚地表明了其即便与中国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愿意在经贸领域完全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打压。日本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判断所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体现了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战略平衡感。对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维护和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理应得到积极的评价。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对中国加入 CPTPP,表达了积极意向。

二、国民感情:高开低走 回环徘徊

2020 年的中日关系,一方面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当时争相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两国传统文化纽带观照现实的象征。长期陷于低迷状态的国民感情,在共同应对疫情的大灾大难面前,得到了改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双方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与举措,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久违了的彼此命运一体、关键时刻友好相扶共度难关的邻里亲情,还是深深打动了两国国民的心弦,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两国媒体上有关两国地方、国民之间相互援助的种种报道,一时间感动了很多。虽然这份关心和感动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导致双方国民对对方国家的感情出现根本变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并且珍视在那些关心和感动背后存在的相互之间对于对方国民和国家的善意,这种源自于人性和人情的“善意”,是中日关系最为珍贵的资产和最为深厚的基础,终将促成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全面向好,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真正建立。这种植根于深层的地域与文化的连带感,其实也正是建构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把疫情责任大肆向中国甩锅,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一股疫情中国责任论的暗潮。另外,围绕作为两国关系“病灶”和“痛点”的钓鱼岛问题,石垣市议会利用疫情,试图通过将钓鱼岛行政区划重新命名,来强化所谓对该岛的实际控制。而日本右翼人士,对中国公务船正常巡航钓鱼岛,横加指责。部分日本媒体,也对此进行

^① 2019 年 11 月 29 日,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时的讲话。<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9-11-29/Q1PDKFDWLU6J01>。

高频度、长时间的报道与渲染。由此,疫情之初一度得以改善的两国国民感情,又重新陷于低谷。

根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日本“言论 NPO”联合进行的 2020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持“很好”和“相对较好”的比例为 45.2%,与 2019 年(45.9%)基本持平。整体来看,对日印象改善趋势从 2014 年开始持续至今,但回暖势头有所放缓。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呈现谨慎乐观态度。中国受访者支持两国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对中日在地区以及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双边合作抱有期待。受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变动以及中美关系动荡等现实因素影响,对当前中日关系处于观望态度的中国受访者明显增多。在受访者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时,选择“好”或“比较好”的比例为 22.1%,比 2019 年(34.3%)下降 12.2 个百分点。选择“比较差”或“差”的比例为 22.6%,比 2019 年(35.6%)下降 13 个百分点。

另据日本“言论 NPO”公布的调查结果,2020 年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人仅有 10%左右,较去年下降 5 个百分点;而对华印象“不好”的日本人较去年上升 5 个百分点,高达 89.7%。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中国人增加 7.7 个百分点达到 74.7%,而日本人则减少 8.5 个百分点,降至 64.2%,自 2005 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 7 成。“言论 NPO”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称,日本因钓鱼岛问题和中方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对中国加深了疑虑;“另一方面,似乎中国因美中对立而寄希望于对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依然恶化,中国则呈现出对日感情改善的基调,双方民意出现“温度差”。

综观 2020 年中日两国民意所呈现的高开低走、回环徘徊的特征,究其原因,无非是新冠疫情与痼疾发作的共同作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显示的善意,发自内心,自然显露;其后,主要在疫情起源、疫情应对方式方面,日本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抹黑中国,其中也明显有美国的影子。加之这些人又在钓鱼岛问题上挑事,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在疫情肆虐的状况下,这是令人十分痛心和遗憾的。

三、后疫情时期的中日关系:若干关键点

回顾 2020 年的中日关系,虽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辞职、美国大选等的冲击,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短板再次显示出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别在经贸领域,却也经受住了考验。

2021 年,日本将迎来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能否赢得大选,菅义伟能否长期执政,事关日本

政局的稳定及对外关系的延续。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走马上任。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必将大幅度调整,其
对日本以及中日关系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

展望疫情后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应牢牢抓住三个机会。首先,中日两国要为尽快实现中国最高领导人作为国宾正式访问日本、共同擘画两国关系未来愿景,创造条件和氛围。第二,积极推动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使其成为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拉动经贸合作的良机。第三,拜登上台后,应尽快寻求并力争实现中日美三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三国都重视的气候变化领域扩大合作。也期待在中美战略冲突加剧的情势下,日本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推波助澜。

2020年,在疫情这一特定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发展虽有一定曲折,但也显示了基础性坚韧的一面。在其延长线上,疫情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能够行稳致远,依然可期!

四、从现实出发:构建基于善意、平实的中日关系

处理中日关系,既不能抛弃睦邻友好的理想,也不能好高骛远、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急于解决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回顾2020年处于世界巨变中的中日关系,联想到数十年来中日关系的起伏变化,我们深切地感觉到现阶段建设“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一直面临着一些重大障碍,双方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且至今仍然找不到克服障碍、消除分歧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友好”变得空心化了,甚至好像成为了一种奢望。但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前辈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艰辛努力,不能抛弃实现良好的中日关系的理想,坚守“善意”这一底线。就目前包括国民感情在内的两国关系而言,“友好”虽有很大的困难,但“善意”却可以沟通内心、维系正常往来,并不断积累最终成为化解难题和超越障碍的积极条件。

此处的所谓“善意”,指的是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的同时,也关切对方的立场和主张;在暂时找不到克服障碍、化解分歧的方法时,不主动扩大矛盾、升级冲突;在处理双边关系以及涉及对方关切和利益的事项时,即便做不到事事互惠互利,也要时时顾及到对方的正当诉求和感受;在遇到双边关系中的突发事件时,沉着、理性,加强沟通,搞清楚事实,理解对方的真意。此处的“善意”,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的内涵,还可以通过双方基于上述内涵的善意互动,进一步体认和充实。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平实”也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平实,首先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实现理想的国家间关系固然需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条件和可能。世纪之交以来,中日两国对于双边关系的目标定位越来越高,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目标定位之间的乖离,总体上却越来越大。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担任日本内阁首相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甚至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到处丑化中国形象,以至于中日高层之间的往来陷于长期停顿。这一状况,一直到2018年才有所改变。换言之,“友好合作关系”也好,“战略互惠关系”也好,虽然双方确立了美好的目标,但是两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变得比宣布上述目标之前更加令人担忧。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是双方对中日关系中的困难、障碍和阻力的估计不充分,所设定的中日关系发展的现阶段的目标过于理想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之所以强调“平实”,还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障碍和困难方面存在着不切实际的要求。例如,众所周知,在有关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方面,中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目前找不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以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它们确实是“问题”和“悬案”,但却不应作为当下需要解决的“课题”;“有可能解决”是“课题”构成的必要条件,不具有解决的可能性的“问题”不能作为“课题”。所谓“平实”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主张双方在“善意”的基础上,不给对方和自己设置“难题”。

我们认为,“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中日关系”,是一个不断积累善意、扩大善端的过程;也是一个基于善意,冷静和理性地对待两国关系中的既有难题、绝不制造新的难题的过程。我们期盼中日两国政府在这一框架下,采取具体措施,增强政治互信、促进国民沟通、扩大各方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且造福于地区和世界。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东京大学)

“总论一”的内容很扎实,论述也妥当,可以共享的部分不少,但在某些枝叶的部分还可以讨论。

第一,有关中方时时所提到的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或曰中日关系的新常态,日方不一定有同样的看法。安倍前首相也用过“新时代”的日中关系这一说法,但是其所谓“新时代”的含

义,是指两国之间发生了经济地位的变化等客观情形而言。如果“新时代”和“新常态”等词有特别含义的话,日中双方可能需要厘清这些概念的定义。另外,如果中方认为这些概念是为将来日中关系定位之基础的话,应向日方说明其内涵。

第二,关于 RCEP。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度宣布不参加 RCEP,日本政府也表明“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 RECP”。中方很重视日本政府的这一发言,但日本国内并未有关于日本离开 RCEP 的讨论,只是有如何说服印度的讨论而已。所以,本来安倍前首相打算 12 月访问印度,但是印度国内发生问题,安倍不能访问了。之后,日本政府放弃了说服印度回到谈判的意图。“总论一”指出“在美国特朗普政权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的背景下,日本放弃原来的立场,在印度没有加入的情况下签署 RECP,清楚地表明了其即便与中国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在经贸领域完全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打压。日本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判断所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体现了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具有的灵活性和战略平衡感”。但是,我认为日本未必有那么好的平衡感,可能只是在与原来相同的方针路线上,选择印度不在的次善场合而已。

第三,有关国民感情。“总论一”指出“高开低走”之看法,是说“长期陷于低迷状态的国民感情,在共同应对疫情的大灾大难面前,得到了改善”。但是从日本社会的观点来说,几乎没有感觉得到这种“改善”。确实,一些媒体报道由“善意”而来的美好故事,但是一系列的美好故事不一定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感情的改善。“总论一”还指出,“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把疫情责任大肆向中国甩锅,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一股疫情中国责任论的暗潮”。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情,在疫情爆发之前早就恶化了。2020 年,日本对中国的感情与 2019 年相比,更恶化了一些,但是变化不大。日本言论 NPO 指出钓鱼岛问题是日本人对中国感情变化的原因,“总论一”也持同样的观点,指出“围绕作为两国关系‘病灶’和‘痛点’的钓鱼岛问题,石垣市议会利用疫情,试图通过将钓鱼岛行政区划重新命名,来强化所谓对该岛的实际控制。而日本右翼人士,对中国公务船正常巡航钓鱼岛,横加指责。部分日本媒体,也对此进行高频度、长时间的报道与渲染”。实际上,中国公务船的活动在疫情之下更活跃,这个事实刺激日本社会;但是疫情前后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重视,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日本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难以由单纯的二分法来把握的状态。“总论一”以“友好”和“善意”加以区分,认为“友好”很难,所以应由出于“善意”来改善两国关系。现在的日本社会,有向“平实”状态改善关系的因素,希望中方能够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的现

况。

二、青山瑠妙 教授(早稻田大学)

复旦大学今年也发表了《中日关系报告书》,这项工作每年坚持不断,对于把握日中关系的变化和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报告书也同往年一样,客观地把握了日中关系的大趋势,质量很高。

毫无疑问,2020年是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搅得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点在日中关系中也有反映。报告书的标题《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准确地反映了2020年的世界形势。由于新冠疫情,国际关系在加速变化,这也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新的合作的可能性。

在“总论一”中,论述了新冠疫情下日中关系变化的特征,高度评价了王毅外长访日所达成的五项共识与六项成果,其对缓和中日两国间结构性矛盾有重要意义。并且,报告书预计日中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后疫情时期也将持续。对于日中两国间的矛盾,如疫情中产生的新问题、海洋问题及香港问题等,“总论一”将日本国内批判中国的动向视为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在中日间的许多活动都通过网络进行的背景下,王毅外长亲自到访日本,在日本也被大幅报道,这对安定特殊时期的日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新冠疫情而停滞的日中间的商务往来,在2020年11月重启,这被日本视为积极信号。但也有遗憾之处,譬如由于疫情中中国严格的边检政策以及申请中国的邀请函时的繁杂手续,短期出差及常驻人员的往来都很困难。日中两国在取得外交成果时,有必要在具体的政策实施层面进行紧密磋商。

此外,在缓和结构性矛盾方面,王毅外长在访日时强调的“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共识极为重要。这一共识来源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近年包括疫情中的2020年,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安倍晋三首相都多次确认和强调这一共识,成为日中两国超越对立的重要前提。希望这一共识在两国国民中也获得广泛理解,这对于解决“总论一”所指出的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度低迷的问题,想必也会大有帮助。

三、加茂具树 教授(庆应义塾大学)

日方对现状的理解与中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是日中关系直面的挑战。通过《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了解这种“差异”的存在。

2012年9月,钓鱼岛等发生在东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使日中关系严重恶化。自2014年以来,日中两国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促进对话并积累了成果。具体而言,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之前,日中两国的外交当局举行了“旨在改善日中关系的会谈”。随后,以安倍首相和习

近平主席的首脑会谈为契机,两国关系虽历经曲折,但也日渐改善。

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进行电话会谈。以此为开端,当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同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2019年6月大阪G20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主席访日。经过这一系列往来,日中两国领导人确认双边关系已回到“正常轨道”,并共同形成了开拓“日中关系新时代”的方针。

基于此认识,可以说,2020年的日中两国是在“改善关系”的大方向之下进行交往的。2019年6月的首脑会谈之后,中国官方报道中日两国已就“十点共识”达成一致。可以说,2020年是中国将“十点共识”进行具体化的一年。^①这样一来,原定于2020年春季进行的习近平主席访日安排,中国方面应该是将其理解为向国内外展示具体开创“中日新时代”的机会。但是,日本社会对“日中新时代”理念的共感度并不高,其中如《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总论一”所引用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很低。

据《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总论一”所述,2020年日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受到自然灾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安倍内阁辞职和菅义伟新内阁的成立,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很大影响。然而,从日方的角度来看,报告书中所列出的因素并不是影响日中关系的唯一因素。其实,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安倍内阁总辞职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就日中关系发展的方向提出了重大质疑。如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等东海水域的行动、香港的动向等,日本社会对中国越来越担忧。

可以说,当前的日中关系已经陷入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日中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很高,相互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必不可少。但是,两国围绕安全保障(包括经济安全保障)问题存在互不信任的状况。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加强日美同盟、QUAD制度化),是对随着经济发展而国力增强的中国所做出的“反应”的结果。而中国在南海、台湾海峡、东海海空域的积极行动等,也可以说是对由日美同盟的强化、QUAD制度化而增强的“不安全感”的一种“反应”。日方的行动和中方的行动,是相互之间的“反应”。

“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中日关系”的想法,如果是在认识到中日之间很难消解的安全困境之上提出的,那么可以对其作出积极评价。通过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日方需要准确了解中方“反应”的原因,中方也需要准确了解日方“反应”的理由。因此,坦诚的讨论,有必要继续进行。

^① 《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人民网2019年6月28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628/c1002-31200493.html>,日本外务省官方记录中不存在《十点共识》的内容。“中日首脑会谈·晚餐会(令和元年6月27日)”外务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5086.html

四、伊藤亚圣 副教授(东京大学)

日中关系历经风风雨雨、充满跌宕起伏。在此过程中,本报告定期对日中关系进行评估,这对冷静回顾和展望两国关系具有深远意义。正如报告书所引用的舆论调查那样,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继续以负面印象为主。2020年,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感情恶化,但鉴于之前日本对中国的感情整体上已处于负面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新出现的变化反而较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没有发生改变。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新出现的变化是,把中国日益视为更大的风险国家。

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习近平国家主席计划在2020年春季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据我观察,截至2021年2月,日本社会并无就此开展讨论的气氛。尽管如此,应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断维持合作和日常交流,这是日中关系的底流,也应期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人员往来。国际秩序正在进入“未知的常态”,正因如此,更需要保持开诚布公的意见交换和持续的交流。同时,对对方说出的一些逆耳的话彼此要有心理准备,也有必要确认并接受一个事实,即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具有认知差异。

总论二 日本外交的双重轴线:“美日同盟”与“经济中心” ——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依然在其延长线上

冯 玮

2020年5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记者提出的“中美间对立,日本采取怎样的立场”这个问题,做了四点表示:第一,疫情是从中国向全世界扩散的,这是事实;第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维护基本人权、法治方面和美国有相同的立场。日本将这方面的问题作为国际性的课题对待;第三,希望中国对地区的和平、安定、繁荣采取负责任的应对方式;第四,面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疫情,以自由、透明、迅速的方式共享信息和认知是相当重要的。

与欧美国家领导人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回答同类问题的“暧昧”相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立场显得非常明确。是什么原因使安倍晋三在中美博弈时立场如此鲜明?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夹缝中生存”。若果真如此,为什么安倍晋三的上述表态,既没有选择日本人擅长的“暧昧”,也没有在中美之间选择“平衡”?菅义伟执政后,是否“萧规曹随”,继续安倍的外交路线?这是判断过去一年中日关系“因何而来”、今后“向何而去”,必须回答的问题。

原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在《战后史的真相》一书中写道,“日本追随美国的路

线不仅延续到日本独立以后,而且还被美化,并在战后 60 多年始终贯穿。”但是,战后日本外交除了始终以“日美同盟”为轴线,还有一条轴线贯穿始终,即“经济中心”。简而言之,迄今为止,在“日美同盟”轴线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标志,日本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经济中心”轴线上,中日关系虽然几经起伏,但“经贸互利”始终没有遭到动摇。换言之,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始终是“双重轴线”。

一、日本外交“双重轴线”的形成

百年来,中日关系从来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始终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二战结束后,无论中美对抗还是合作,日本都是受益者,都是“左右逢源”,并非“夹缝求生”。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使日本成为美国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但是冷战爆发后,以乔治·凯南为主任的政策规划设计室即提出:“确保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之外,并灵活利用这两个地区以实现重大目标,非常关键。”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看到了日本的“可乘之机”。他认识到,朝鲜战争所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将使美国成为日本的代言人和日本权益的维护者。正是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背景,1951 年 9 月,美国等 48 个国家和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和约》,美日两国间则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1952 年 2 月,日本和美国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由“两个条约一个协定”构成的“旧金山体系”最终形成。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日美安保条约》原先的名称是冗长的《根据日本国和联合国间和平条约及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制成的美国和日本国间集体自卫协定》,即日本希望和美国一样,享有“集体自卫权”,但遭到美国反对。因此,按照日本对宪法的解释,“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不得行使”。直到 2014 年 7 月,日本才通过内阁决议案,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第二,1951 年 6 月 30 日,日本外务省给美国发去一份绝密文件,题为《我方有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案》,希望将美国在日驻军明确写入《日美安保条约》。但是,美国要求将这一内容,写入无需经过国会审议的“行政协定”。于是,一是日本的防卫完全依赖美国,二是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享有了较充分的“自由”。

“政经分离”是日本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策略。冷战形成后,美国曾一度实施楔子战略,就是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离间两国关系。但是,中国明确站在苏联一边使美国很快放弃了幻想。1949 年 11 月,美国筹建了一个秘密机构,因总部设在巴黎而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1950 年 1 月 9 日,该机构正式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日本是 17 个成员国之一。但在“对华禁运”方面,日本没有完全顺从美国。1950 年初,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并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

和“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1952年4月,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表示,“我们深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国的提议获得了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5月底,出席本次会议的日方代表访问北京,高良富和南汉宸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至1958年,双方又签署了第二、第三、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62年又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条轴线的存在,美国统治阶层的意见并不一致。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CIA)认为,抑制中日贸易有助于加速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但是美国国务院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如果强行压制中日贸易,日本很可能因为经济难以提振而长期成为美国的财政包袱。最终,后者的意见占据上风。所以,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无论美国因素如何影响中日关系,迄今为止,“经济中心”这条中日关系的轴线始终存在。

二、“双重轴线”使日本“左右逢源”

防卫和经贸,是一国外交的两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战后日本在中美之间不是“夹缝求生”,而是“左右逢源”。纵观战后历史,中美关系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签署《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双方签署了“日美新安保条约”。第二次是1969年2月尼克松访华至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几乎同时制订并在1997年修订。第三次是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和2012年实施“战略再平衡”遏制中国,2014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次修订。2015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难发现,就“日美同盟”这条轴线而言,日本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实现了日本在日美同盟初建时的意愿。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日本利用美国“印太战略”的需求,不断扩充军备,贯彻“独立强军”的路线,使自身军事实力得以明显提升。在“经济中心”这条轴线上,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政经分离”;70年代的“政经统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热经热”;21世纪初的“政冷经热”;2012年后的“政冷经冷”五个阶段后,至迟在2017年,中日经贸关系重新回暖。根据日本海关统计,2017年中日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2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9.9%。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日本商工会议所所头三村明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三村明夫率领250人日本高级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磋商和交流。日本舆论认为,中日之间或将继1980年、1992年、2001年、2008年之后,迎来第5次经济热潮。尽管中日经贸关系受中日国内外局势影响“时冷时热”,但始终得以维系,而且没有如日美那样摩擦不断。

三、“双重轴心”现状和中国应采取的战略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长期稳定、相互信赖”,经 2006 年的“战略互惠”,到今天的“互为协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中日关系的每一次重新“定位”,都明显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现在的定位,恰好涉及“美日同盟”与“经济中心”的双重轴线。鉴往知来。认识过去一年这两条轴线的变化,对于制定中国外交战略,建立良性互动的中日关系,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就“互不构成威胁”而言,日本 2020 年版《防卫白皮书》用整整 34 页对中国军力进行分析,称中国军力快速增强,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升级,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忧虑因素。同时强调。“日本必须主动加强防卫力量,以此强化日美同盟。”渲染“中国威胁”是近几年日本《防卫白皮书》的“老调”,但和以往的《防卫白皮书》相比,2020 年《防卫白皮书》略有“新意”,即把涉及日本国家安全的范围扩展到除陆海空之外的宇宙空间、电磁空间、网络空间。其目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为修宪使自卫队合法化获取民意支持;第二,继续增加防卫预算,着力提升新型作战能力,实现“军事正常化”和“国家正常化”。第三,不仅继续贯彻“独立强军”路线,而且进一步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

就“互为协作伙伴”而言,作为日本“外交温度计”的 2020 年《外交蓝皮书》,虽然继续重申“今年是将日中关系推至‘日中新时代’的一年”;但同时明确表示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动向的方针,继续强调日美关系,将去年日美关系“前所未有的牢固”修改为“史上前所未有的牢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日本“经济中心”轴线遭到严重冲击。例如,2020 年 7 月 17 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刊登消息称:“美国政府要求企业禁止与五家中国企业交易”。这五家中国企业是华为、中兴通信、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大华技术、海能达通信。消息一出,引起日本企业界震动。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政策的“呼应”,4 月份日本政府正式确定了“撤离补助政策”,为此编制的预算总额是 2435 亿日元(约 159 亿元人民币)。但是,在华 3 万 5000 家日本企业中申请撤回日本国内或申请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的企业不足百家,约三分之二补助金尚无企业申领。据统计,日本 2020 年整体出口减少了 11.1%,但是对中国出口则增加了 2.7%;去年上半年,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总额增加 20%;日本在华直接投资额,2020 年 2 月为 142.7 亿元,5 月为 748 亿日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点,从以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基于上述分析似可得出结论:日本对外战略,战后开始形成的“美日同盟”与“经济中心”的双重轴线依然存在,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且在同步加强。菅义伟政府不会脱离这

两条轴线。因此,中国今后对日方针,当既遵循“历史规律”,也正视“国际现实”,不要试图改变这“两条轴线”,同时加强中日民间各方面交流合作,通过经贸互利和国民互信的良好互动,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总论二”分析日本对外政策的大原则为“政经分离”,即“安保靠美国,但经济自主”,并且说在疫情的前后此原则没有太大的变化,日中关系还在其延长线上。这一结论与事实符合,日本政府在21世纪与以前差不多一样实行“政经分离”,即“安保靠美国,但经济自主”之政策。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日本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同时与美国以及台湾继续在以美国为主的安保体系之内。21世纪,中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对象国,但在安保问题上关系紧张。日本实行“政经分离”政策,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并不奇特,其实大部分美国的盟国都追求差不多一样的方针。但是因为日本在东亚,与中国之间在海洋、领土主权和军事安保上的矛盾比较凸显,所以日中之间的军事安保“对立”比别的盟国明显一些。从中方来说,把紧密的经济关系作为杠杆,去柔化两国之间在军事安保等问题上的紧张。而在日本经济界,以及一些政治家,他们既重视日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希望日中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稳健化。可说,中方的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达成了目的。

但是,日本的大原则“政经分离”,即“安保靠美国,但经济自主”之政策,现今被美国的“脱钩”政策所影响。特别是在疫情之下,美国加大推动“脱钩”政策的力度,从而让日本的上述原则面对重大的挑战。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对象,主要为高科技的、最发达技术的产品。一般来说,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所谓“军民两用”,因此军方和经济界都重视这些技术。目前美国所重视的军民两用高科技产品,主要还限于在政府采购方面实行“脱钩”政策。如果美国向5 eyes,或者盟国要求同样的政策的话,日本则难以保持“政经分离”、“安保靠美国,但经济自主”之原则。日本政府试图在保持美日安保的同时,尽量逃避接受美国要求的对华交易的限制。在甘利明议员的推动之下,日本内阁府安全保障局设立经济安保部门,也是为了适当处理“脱钩”问题。

除了美国的“脱钩”政策以外,中国的出口管制法等政策也被日本社会认为是一种“脱钩”举措。对日本的“政经分离”、“安保靠美国,但经济自主”之原则来说,经济的政治化和军

事化,产业链的“脱钩”,都是重大考验。日本政府希望保持“政经分离”原则,但因为“脱钩”的进展,或者保守的经贸政策,日本还能否保持这一原则,将面临重大挑战。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总论二”解释了在中美对立加深后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本外交中的“日美同盟”与“重视经济”两个基轴。

如“总论二”所指出的,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日美同盟”与“重视经济”两个基轴共存,这一特征与自1950年代到中日两国回复邦交为止的日本对华政策相关联。并且,即使在中美关系对立加深的今日,也没有大幅改变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但是,“日美同盟”与“重视经济”这两个基轴是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的,形成两大基轴的政策又是以怎样的强度相互组合的?由此,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性也有所不同。必须要注意的是,现在日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日本国内政治的结构以至于国民舆论,都与冷战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冷战时代的“政经分离”,与现今的“政经分离”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总论三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陷阱中的“陷阱”

高 兰

2020年8月28日,作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之后,反复强调将“继承安倍外交”。而在新冠疫情中,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十分突出,中日关系呈现出在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之中的陷阱取向。

2020年,“中国议题”受到美国大选的关注。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是自美苏之后的“冷战2.0版”。^①吉米·卡特也警告说,中美两国正在走向一场“新冷战”。

美国正在将中国逼入“修昔底德陷阱”。WHO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当前,疫情的政治化问题严重,世界面临的重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以“中国病毒”等追责中国,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中战略竞争关系,将中国打造为一个政治上的敌人,转移国内的矛盾,从而将中国逼入修昔底德陷阱。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则警告称,最应重视的课题是美国内政。当前美国处于拐点,同时面临“四个历史性危机”:百余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年代

^① 沈大伟:“沈大伟:该接受美中冷战2.0并去适应它了,避免热战应是首要目标”,中美聚焦,2020-07-15, www.dunjiaodu.com/waijiao/6110.html

以来对种族正义最强烈的吁求,以及气候变化不可否认的现实和日益加剧的威胁。拜登表示:“我若当选总统,我的第一步将是控制疫情。”^①

日本极力避免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日本一部分人担心被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②提出必须谨慎行事,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但是,也有人认为,日本出现了新的战略机遇期,应利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保持同步,分享中美新冷战带来的巨大机遇,帮助日本再次崛起。

由此可见,日本对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知呈现多元化特征。即,日本应继续在维护日美同盟发展的同时,寻求美国许可下的灵活外交空间;认可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担忧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③另一方面,针对中美对立的发展趋势,日本出现了批评美国的声音,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加强危机管控。

事实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传统思维是:中美关系缓和,日本的周旋空间增大;中美对立,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的灵活性减少。2020年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全面对立的趋势日益凸显,日本希望尽量维持与中美两国的距离。但是,随着中美对立加剧,日本“平衡外交”的路线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如果与美国过度步调一致,将会遭到中国反对;而如果倾向于与中国高度接近,又会影响日美同盟。^④为此,日本在采取“选边站”策略的同时,寻求中美竞争框架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外交。^⑤

作为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日本希望发挥国际协调作用,防止中美对立局势走向危险边缘。日本的“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自立+中立+第三空间”外交,即,日本认为存在三种外交战略空间:第一空间为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在此框架下,日本应寻求有限的自立(自主)外交。第二空间为中美关系中的外交空间,日本可探求在中美对立

① 《拜登提名演讲强调团结美国应对四个危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5622925638091092&wfr=spider&for=pc>[2020-09-21]。

② 参见:小野寺五典「日米『一体化』で問われる日本の役割」、『外交』Vol.61、2020;佐佐江賢一郎「反グローバリズム再考:国際経済秩序を揺るがす危機要因の研究」,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経済研究会』報告書、令和2年3月;中西寛「アメリカ外交の 反国際主義は続くか」、『外交』Vol.59、2020;『米中対立で「難しいかじ取り」』佐々江賢一郎・前駐米大使』、2020年8月24日。

③ 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环球时报》,2020年2月21日。

④ 《日本政府担忧美中对立激化 如何保持距离成课题》,共同社,2020年7月27日。

⑤ “第三空间外交”的含义,与2010年6月日本首相菅直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不同,是指日本跳出中美对立的困境,寻求在中美之外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

的夹缝中相对“中立”的可能性,采取“中国-1”^①以及“美国+1”^②的做法实施“平衡外交”。第三空间为中美关系框架外的外交空间,日本希望加强与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此外寻求参与“五眼联盟”,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等经济安全合作。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采取的“自立+中立+第三空间”外交政策,将产生以下影响。

1、日本加强“自立”外交政策,加强有限自主外交与自主防卫的努力,将增强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但也会加深日美间的同盟困境。即美国对日本有强烈的盟国作用的期待,美国在要求日本发挥更多国际贡献的同时,将极力防止并纠正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但是,由于美国自身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对日本的同盟要求将日益力不从心。

2、日本采取在中美之间的“中立”外交,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关系。近年来,中日之间确立了重要共识,如三点原则和十点共识等。^③安倍在2020年1月的国会讲话中还誓言要营造“日中关系成熟”的“新时代”,强调亚洲两个大国“在地区和平与繁荣方面分担责任”,中日两国重回正轨,进一步改善深化双边关系的发展。

3、避免了日本在中美对立中必须进行“选边站”平衡外交的两难处境,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扩大了日本外交斡旋的空间。日本安全战略进入重大调整期,自主防卫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一直呼吁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防务合作。2020年7月1日,日本外务省新设专门负责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门,在负责与美国以外国家防务合作等的国际政策课内也新设课长级职位。

4、“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除日本之外,欧洲等国也逐步采取对华协调政策,因而相对降低了各国因对美“选边站”而对中国造成的周边压力。

未来,中日之间的传统问题仍将存在,并出现新的挑战,美国因素尤为重要,将在一定程

① 所谓“中国-1”,是指日本减少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从中国撤退部分企业,将供应链扩展到其他一些国家。

② 所谓“美国+1”,是指在美国“退群”的圈子里,日本继续“守群”,坚守并经营原先的“群”,同时期待美国重返并主导这些“群”。

③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提出“化竞争为协调”“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推进自由公平贸易”的日中关系三原则。2019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十点共识。

度上继续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敲打中国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战略的重点议题。根据投票结果，拜登将替代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他上台后将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①尽管如此，“特朗普主义”仍将继续发挥影响，由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共同打造的美日版“印太战略”能否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观察。2020年11月12日，日本菅义伟首相和拜登进行了电话交谈。菅义伟在电话中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也表示将“强化日美同盟，期待与日本合作，维护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②但是，与“亚太战略”相比，美日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此外，今后如果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安全部署，美国将对日本等盟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2020年7月2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中国的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探讨了中国至2050年的发展轨迹，认为今后中美关系可能有三种路径：平行伙伴(parallel partner)、相互碰撞的竞争对手(colliding competitors)和分道扬镳(diverging directions)。^③因此，日本认为，今后在中国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中美正在进入长期竞争的态势，日本必须严密观察，避免被动。^④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辰巳由纪告诫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要小心谨慎，不要造成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⑤

总之，拜登执政后，预计今后中美关系仍将持续性紧张，中美对立将进入常态，对抗不可避免，但依然存在灵活性、可控性。这是因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拥有50年的接触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实际利益惠及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美仍

①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② 日本外務省「菅総理大臣とハ・イテ・ン次期米国大統領との電話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2922.html

③ 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中国的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700/RR2798/RAND_RR2798.pdf。转引自：《兰德报告：2030年后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经济体》，《新京报》，2020年7月2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541275967580045&wfr=spider&for=pc\[2020-08-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3541275967580045&wfr=spider&for=pc[2020-08-20])。

④ 《BBC：中美全方位对抗 日本在夹缝中面临两难选择》，BBC 中文网，2020年6月9日，[https://www.allhot.net/finance/98234\[2020-08-20\]](https://www.allhot.net/finance/98234[2020-08-20])。

⑤ “日本對中國外交的兩難：政治壓力和經濟引力”，BBC News 中文，2020/6/9，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8294。

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①中美政治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但中美经济关系、社会联系依然十分紧密,中美两国人民仍然在努力合作改善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无法避免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双方均认识到,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从大局以及中长期角度出发,积极构筑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总体向好,但依然存在脆弱性、反复性。

日本是处于中美夹缝中极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战略走向值得密切关注。从历史上看,中美彼此争斗烈度越强,日本选择的余地愈少。美国正在考虑组建一个新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对付中国。可以预料,今后美国对东亚地区最坚定的盟国日本将提出更多的要求。日本实行“第三方力量”外交,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多边合作战略,在中日韩FTA、RCEP,乃至CPTTP等等,中日两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均具有多边合作的意愿与共同诉求,可以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顺利发展。今后,中国与日本应努力避免陷入“陷阱中的陷阱”,应共同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推动中美日关系的改善与积极发展。

(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总论三”指出,因为中美对立从而使日本的外交空间变小,所以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寻求自主/自立外交的可能性。此文设定第一空间(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第二空间(中美关系中的外交空间)和第三空间(中美关系框架外的外交空间),日本在第一和第二空间的话,难以寻求自主/自立外交,所以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在第三空间寻找新的可能性。对此,希望讨论以下两点。

第一,其实,日本国内也有类似的论述。在特朗普政权推动“美国第一”的保守经贸政策之时,一方面日本在安保上不得不靠美国;但另一方面,在有关“脱钩”问题、开放和自由的经贸体制问题上,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追求和美国不同的路线。新冠疫情使特朗普政权采用更严厉的“脱钩”政策,美中对立因此更加激烈,这些新的状况促使日本寻找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不是意味着离开美日安保,而是在其他领域寻找新的可能性。其实“脱钩”问题不只反映在军事安保领域,也与经济和气候变化等更多领域相关联,所以日本的新路线面对的是难

^① 2020年7月9日,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的发言。

以解决的困境。日本一方面保持开放和自由的经贸制度,很重视与中国的产业链问题;同时,美日安保体制又是日本国家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所以,为了兼顾两者起见,日本应该用更有弹性的思考和方法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譬如虽然美国主张在“军民两用”及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会影响到日本的选择,但日本可以与同样遭遇这样困境的国家一道,寻找与美国或者中美保持一些距离的政策。当然,这实际上相当困难。

第二,此文指出“从历史上看,中美彼此争斗烈度越强,日本选择的余地愈少”。因此,将此作为日本走向“第三方力量”外交的依据。但是,一般有关美中日三国关系的研究,大都指出在中美对立的时候,中国会接近日本。因此,在从历史经验中得出上述结论的考察中,希望参酌一些不同的观点。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总论三”指出,中日关系不单是中日两国的关系,而总是在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中展开。业界在论及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时,常常会陷入过分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这一“陷阱”。但在本文中,很好地避开了学术研究中的这个“陷阱”,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与自律性考虑在内。因此,本文所论日本的“自立+中立+第三空间”这一政策施展,以及“美国+1;中国-1”这一观点,均切中要点。

因为同时内含了“自立+中立+第三空间”这三个政策方向性,那么日本对外政策的总体方向性中哪个方面最为重要呢?“总论三”的论点,自然又引发出这一问题,期待有后续的讨论。

三、专题研究

专题一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社会:危机与契机

汪鸿祥

新冠疫情是2020年日本社会的最大变数。日本各大媒体发布的2020年十大新闻,几乎都把新冠疫情列为头条新闻。疫情给日本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危机,也促使日本社会进行反思,将危机变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契机。同时,疫情下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发生变化,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复杂的影响。

一、疫情下日本社会的危机与变化

2020年1月16日日本确认首例新冠感染。在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下,3月日本政府宣布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4月7日宣布一都六县进入“紧急事态”,4月16日“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全日本。此后疫情趋于好转,5月25日全日本范围解除“紧急事态”。然而,7月到10月形成第二波疫情,新冠感染人数逐步上升。日本政府为了经济恢复,冒着疫情扩大的风险,力推“去旅游”(Go to Travel)项目的实施。进入11月形成第三波疫情,新冠感染人数持续上升,菅义伟内阁被迫于12月14日宣布暂停“去旅游”项目。12月新冠感染人数迅速增加,创下新高,重症患者也不断刷新纪录,造成医疗现场接受病患的能力十分紧迫。2021年初,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将范围扩大至11个都府县。截至2021年1月24日,日本新冠感染者已达366435人,新冠死亡者达5133人。新冠疫情剧烈冲击了整个日本社会,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各种变化。

1、就业和收入状况变化,贫富差距扩大。疫情下,不少企业陷入困境、破产倒闭或停产停业,雇佣环境恶化,失业人员增加,非正规就业者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些企业解雇了非正式员工,有些企业的正式员工虽未失业,但收入锐减。女性失业率明显上升,服务业非正规雇佣的女性受到打击更大。贫困家庭陷入困境,单亲母子家庭最为严峻。由于学校临时停课,为了照顾孩子,不能外出工作,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更加艰难。打工的学生也受到很大影响,一半以上的学生打工收入减少,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学费和生活费问题被迫退学。疫情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将在2021年以后显现,减少招聘应届毕业生的公司可能增加。2021年雇佣环境将较为严峻。上年度研究报告提到的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在后疫情时代可能进一步拉大。日本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实施了一些救济和支援措施,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等。但是杯水车薪,难解贫困阶层的困境。建立弱势群体保护的安全机制,成为日本社会的紧迫课题。

2、家庭关系的变化。疫情下,居家办公,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等,对于日本的家庭、婚姻、夫妻关系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家庭延续着传统的丈夫工作、妻子专职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工薪族的丈夫早出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下丈夫居家办公,白天一家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空间,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间共处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由于长时间共处一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感情破裂,甚至出现“新冠离婚”的现象。疫情下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育儿负担集中到了父母尤其是母亲身上。一些有工作的女性,要负担家务和育儿,还要为居家工作的丈夫准备一日三餐,感到身心疲惫。疫情期间,“感觉压力非常大”和“感觉有压力”的家庭主妇高达70%以上。疫情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促使日本社会重新反思家庭问题和男女平等问

题,建构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

3、人际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不安。居家隔离、居家办公、自觉保持社交距离、取消聚会的“自肃”生活,对日本人的社会心理造成一定影响。一些人怕被感染而不想跟人见面,自我封闭。对疫情的不安致使抑郁、焦虑症状的人明显增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甚至出现了“新冠绝交”新现象。对疫情的不安容易滋生偏见和歧视。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的诽谤和中伤,一些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都遭受偏见和歧视。线上聊天、视频聊天等方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直接接触和交往大幅减少,使人际关系更为疏离。日本“有缘社会”走向“无缘化”。更有甚者,失业和社会孤立等问题使得近年来一度下降的自杀率大幅上升,自杀者多数是女性。警察厅统计显示,自杀率从6月开始骤升,10月上升至80%以上,2020年一年的自杀人数超过2万人,远超新冠死亡总人数。9月27日人气女演员竹内结子在家中自杀,令人震惊。上年度研究报告提及的社会不安在疫情期间更为严重。疫情促使日本加快构建安全、安心、安定的社会。

4、舆论调查反映日本人意识的变化。NHK于2020年11月4日至12月7日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82%的人认为疫情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认为影响很大的占33%。最困惑的事情是无法和亲朋好友见面(49%)、整天待在家里(30%)。30%的人表示收入减少,11%的人表示生活陷入困苦,32%的人认为支出增加,67%的人认为压力增大。关于疫情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91%的人习惯于戴口罩和洗手、53%的人习惯于房间消毒和通风、51%的人习惯于居家上班、46%的人开始使用电子支付。值得关注的是,86%的人认为出于遏制疫情的需要,限制个人移动和经济活动等个人自由也是应该允许的。87%的人赞同限制个人外出,82%的人赞成餐饮店等停业,52%的人赞成利用手机定位系统掌握个人行踪,42%的人认为政府和国会应该尽快修改法律,允许对个人自由实施限制。调查表明疫情下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主张自由和“自肃”,转变为如果防疫需要可以限制个人自由。这种意识的变化对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走向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2020年日本社会除了疫情的严重影响,还发生了其他天灾人祸。7月上旬九州地区遭受空前的暴雨袭击,河流泛滥,发生大规模水灾,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踪。受灾最为严重的熊本县,球磨川泛滥,造成65人死亡、4500栋房屋倒塌。中国地区和东北地区也遭受暴雨的损害。不仅遭受自然灾害,而且政治丑闻和治理失策接连不断。河井克行、河井案里夫妇及秋元司等国会议员因行贿受贿而相继被捕;由于“赏樱会”前夜祭招待问题,安倍前首相后援会被搜查;菅义伟首相拒绝任命6名日本学术会议成员而受到学界和舆论的批判。菅义伟首相上

任后,防疫对策不力,遭到日本社会舆论的批评。尤其在12月疫情扩大的形势下,菅义伟首相参加东京高级牛排店的忘年会,激起民众不满和舆论抨击。12月日本媒体报道,近60%的受访者对菅义伟内阁的防疫措施表示不满,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到39%,不支持率则上升到35%。如何处理好疫情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危机,关系到日本社会的未来,也关系到菅义伟2021年的政治命运。

二、疫情下日本社会的契机与转型

2020年日本社会虽然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总体平稳,秩序井然,没出现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浪潮。日本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准。疫情让日本进行反思,将危机变为推动日本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契机。疫情下日本社会正在孕育着一场变革。自民党《面向后新冠的经济社会成长战略》报告中,针对“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成长战略,重点提到了两个视角,一是尊重作为生活者的国民的立场,消除民众对疫情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不安,让国民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目标。二是避免走向“差距社会”,努力减少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阻断中产阶级向下流动的趋势。疫情促使日本社会的转型,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态势。

1、加强公共卫生防疫体制和实行“新生活方式”。疫情在东京等大城市蔓延的速度很快,随着感染人数上升,医院、病床陷入紧张状态,无症状和轻症患者不得不在自家、酒店等处隔离观察。疫情让日本再次反思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的问题,认识到应通过自助、共助、公助提高社会防疫能力。“自助”体现在民众实行“新生活方式”,在自己的健康管理上,减少出行,戴口罩,勤洗手,避开“三密场所”(即密封的空间、人员密集的场所、密切接触的场面)。“共助”体现在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扶助,非营利组织、志愿者对独居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关照。“公助”体现在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完善、核酸检测机制的构建、政府对陷于窘困的弱势群体的经济支援等。为了与新冠病毒长期间共存,就要遵循“新生活方式”的生活规则。疫情后,“新生活方式”或将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指南。

2、改变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疫情下居家办公、线上办公等迅速发展,上班族早出晚归的传统工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工作方式正在被社会普遍接受。据调查,70%以上的人希望疫情后仍能延续居家办公方式。居家办公或将成为疫情后常规工作方式之一。疫情下各类学校积极推动线上教育,使得教学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线上教育使日本潜在的教育差距问题显现。通信环境好的家庭学生的学习没受太大影响,低收入家庭电脑和网络不完备,学生上网课有较大影响。改变教育领域信息技术滞后的现状和缩小教育差距,成为不可忽视的课

题。工作和学习方式的变化,对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居家工作节省了上班时间,增加了在家时间,有利于夫妻共同育儿、共同承担家务、改善和促进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或许会有助于少子化的改善。

3、缓解东京一极化,促进地方区域社会的发展。上年度研究报告中提及大城市人口过密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难题”。疫情使东京一极化的弊害再次凸显。东京人口过于集中,自然成为疫情重灾区,新冠感染人数占全日本的30%。疫情使得东京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办公并非要去单位,有些工作并非要住在大城市。有些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公共设施齐全的地方城市或郊区受到青睐。地方生活成本较低,亲近自然,人际关系比较单纯,育儿环境比较宽松。一些工薪族表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日本政府在2014年地方创生战略中提出的2020年实现东京移动人口0增长的目标没能实现。以疫情为契机,日本政府开始第二期(2020~2024)地方创生计划。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出台移居支援政策。有学者提倡重新审视东京一极化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会。需要促进地方区域社会的发展,营造对迁居者友善宜居的社区。

4、加快数字化社会构建的步伐。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后推出了各种政策,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增设“数码厅”的重大改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一直在推动数字化社会的构建。2001年推出“e-Japan战略”,旨在五年内将日本建成最先进的IT国家之一,但该项目未能实现。2019年6月,作为增设数码厅的前期酝酿,制定了《数字时代的新IT大纲》。疫情进一步让日本社会认识到构建数字化社会的必要性。要想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必须建立全民共同参与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必将发生改变。增设数码厅适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从行政体制上为日本未来打造数字化社会做出了进一步的铺垫。

2020年日本社会的转型中,还出现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新变化。从文化界来看,作家吾峠呼世晴的漫画《鬼灭之刃》受到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好评,23卷全集的累计出版发行部数突破1亿2000万册。10月16日公开上映的动画片《鬼灭之刃》更是引起日本社会轰动,其票房收入在10天内突破100亿日元,12月13日为止突破300亿日元,创日本电影史的新高。《鬼灭之刃》相关的纪念品销售和景点参观,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再从体育界来看,将棋棋手藤井聪太在7月的棋圣战中荣获桂冠,开创了以17岁的最小年龄戴冠的记录。进而8月份,以18岁的年龄荣获王位,开创了日本将棋史上20岁前荣获双冠的新记录,同时获得了日本将棋史上最年轻晋升8段棋手的殊荣。

三、疫情下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

2020 年原本是中日关系非常关键的年份,预定春季习近平主席访日,中日两国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中日两国的外交日程,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发生新的变化,关于疫情的源头、中国抗疫的模式、中国对外抗疫物资的援助等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11 月 17 日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好的为 45.2%,不好的为 52.9%,与去年基本持平。但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好的仅有 10%,比上次调查下降 5 个百分点,不好的为 37%,比上次增加 14.2 个百分点。日本民众对华印象的恶化令人深思。

根据笔者在日本社会所闻,日本民众对华认知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从政治层面看,涉及到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问题。一些民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模式”持有怀疑态度,认为中国不是民主自由国家,认为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输出“中国模式”,担忧中国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会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日本社会在涉港、涉台以及涉及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种种言论,其实都是与制度和价值观的认识相联系的。第二,从安全层面看,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家战略问题。一些民众对中国增强军力和扩大海域活动深感不安,认为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纷争时倾向于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成为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认为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活动是对外扩张,构成对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的严重挑战。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中国“侵犯”钓鱼岛周边的领海和领空。在日本社会,中方海警“入侵尖阁”的新闻经各大媒体反复报道,不熟悉中日领土纠纷复杂历史的一般民众把钓鱼岛问题视为中国海上力量扩张的征兆。第三,从经济层面看,涉及到经济体制和经济利益问题。疫情下在华日企撤回国内或向其他区域转移问题一度引起关注,甚至出现“断链”的杂音。一些民众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是“假货”,认为中国口头表示维护自由贸易秩序,行动却是违反国际贸易秩序的“本国例外主义”。中国的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政策,破坏公平竞争,破坏市场规则。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日本虽然以“第三方市场合作”形式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但实际上疑虑重重,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经济扩张。

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变化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2000 年日本的 GDP 总量还是中国的 4 倍多,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了日本,到 2018 年,已是日本的 2.7 倍,这是一个具有大变局意义的变化。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站在亚洲区域的前列,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一部分日本人对于中国在经济上超越日本缺乏心理准备,对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感到困惑,在认知上出现一些偏差。二是美国战略的变化。近年

中美之间对抗性的战略博弈加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格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实施全面打压。中美博弈加剧对日本社会对华认知产生重要影响。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对华认知出现摇摆偏差。

针对日本社会对华认知的三个误区,需要在三个领域做出努力。一是在政治领域增进互信。认知上存在误区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政治互信。提升双方的国民感情是中日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消除不信,增进互信。当下需要积极开展“疫情下的外交”,尽量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在安全领域管控危机。钓鱼岛主权争议复杂,情绪失控或情报误判都易触发不必要的冲突。11月王毅外长访日时,中日达成五点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伪装的民间船只闯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动向,王毅提出不让公务船以外的船只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为了防止领土问题上对立激化,必须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在落实高层共识,强化对话机制和常态化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竭力寻找妥协点,以创造性智慧和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三是在经济领域扩大合作。在已有的中日经贸合作的基础上,中日之间的各种合作“链”将重新组合,中日将强化在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电子商务、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建设中日互利互惠的经济发展平台。在已经签订RCEP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广阔的前景。

中日关系还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但是人们认为中日关系向好的大势不会逆转。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竞合共生”将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常态”。期待习近平主席正式访日,中日之间签署反映新时代新特点的中日关系第五个政治文件,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汪鸿祥,日本创价大学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2020年,疫情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但在观察疫情之下的某些社会现象时,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如不要相信当地媒体“随便”报道的内容而下判断;不宜用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文化论”分析一些社会现象。

第一,“专题一”指出,新冠疫情下“打工的学生也受到很大影响,一半以上的学生打工收入减少,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学费和生活费问题被迫退学”。实际上,日本一些媒体有

关疫情之下日本的大学里退学的学生增加的相关报道,基本上是误导。虽然有一些学生因为疫情带来的困难不得不退学,但是因为疫情之下,学生们在故乡线上上课即可,不需要到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所以也就不需要花费平时那么多钱。日本的大学一般没有像中国那样可以接受全部学生入住的宿舍,所以老家不在大学所在地的学生们都需要租房子。租房费等是学生们生活费上最大的负担,可以说疫情压缩了部分外地同学的生活费。因此,有关学生因疫情而被迫退学的情况,还需要具体而全面的考察分析。

第二,虽然疫情给一般家庭带来新的境况,但并不一定发生媒体比较“随意”地报道的现象。此文指出,“家庭关系的变化。疫情下,居家办公,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等,对于日本的家庭、婚姻、夫妻关系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家庭延续着传统的丈夫工作、妻子专职主妇的性别分工模式,工薪族的丈夫早出晚归,与妻子子女相处时间短,也难有余暇参与家务和育儿。疫情下丈夫居家办公,白天一家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空间,夫妻从未有这么长的时间共处一个屋檐下,有的夫妻由于长时间共处一室,导致精神紧张、压抑,在家庭琐事、育儿、家务分工等方面产生分歧,感情破裂,甚至出现‘新冠离婚’的现象”。实际上,日本2020年的结婚与离婚数都比去年有所减少(厚生劳动省的网页:<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geppo/s2020/dl/202011.pdf>)。所以,虽然不能否定发生“新冠离婚”的现象,但是如果没有介绍离婚数量本身减少的话,有让读者误解的可能。

另外,“新冠绝交”、“新冠某某”的说法,大部分都是由媒体报道时为了吸引听众所使用的词汇。实际的状况,还是要通过统计数字等来判断。

有关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的部分,“专题一”指出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有“误区”。如果站在中方立场的话,可以认为日本社会对中国有认识“误区”之存在。但是希望探讨为何存在这种“误区”,以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感觉为什么在新冠疫情中依然是这么的不好。“专题一”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对华认知出现摇摆偏差”。但是,日本社会有关中国的舆论究竟受到美国的多少影响?“专题一”也引用了言论NPO的调查结果,即日本有50%以上的人们还是认为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与美国的民意调查比起来的话,马上就了解美日之间对中国的看法的差异。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专题一”论述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日本社会的变化,其最后部分中所提出的三项建议十分有益。政治领域中相互信赖关系的构建、安全保障对立问题的管理以及经济中相互依存关系的重建,这三项正是日中两国应着力的课题。

正如“专题一”所指出的,导致日中两国政治上的不信任、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度低迷的根本性问题之一是海洋问题。控制好由钓鱼岛问题所引发的对立,是打开中日关系困难局面的最好途径。在管理中日海洋问题方面,是否能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案?要说一切都取决于这一问题也不为过。

新冠疫情是国际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日本社会的存在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日本社会并未因此陷入危机。如本文所指出的“新冠离婚”、“新冠抑郁”、“新冠自杀”等,新冠这一危机的确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但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也很多。由于新冠疫情,在教育一线,电子教学的方法加速普及,社会对数字化的观念也在提高。并且,在新冠疫情中,SNS(社交网站服务)的使用变得活跃,束缚个人行为的“察言观色”这一日本社会的积习开始松动,批判日本政府或是政府政策的“直言不讳”的日本人也在增加。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初期阶段,日本社会中自发性支援武汉的行动也十分活跃,显示出在社会层面中日两国关系的强韧性。

专题二 新冠疫情下“脱钩”的表与里

包霞琴

2020年的中日关系出现了复杂化趋势,在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复杂化的双重影响下,中日关系出现反复和动摇也许不可避免。进入2020年后,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中国的全面施压、对抗和全方位“脱钩”,并且呼吁盟友“选边站队”,共同对抗中国。由此,日本内部亲美派势力附和美国的声有所抬头。安倍前首相提出的“从竞争走向协调”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摇摆和偏离,中日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一、政治安全领域的“选边站队”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的最优选择是:立足自身的国家利益进行战略调整,以维持自身的战略空间,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和对冲,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日本大力推行多边主义外交,高举自由主义贸易旗帜,调整对华政策重回正轨等等,都是对冲和平衡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表现。

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激化,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增强,再加上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日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选边站队”的迹象。

1、在所谓“两个世界秩序”、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和涉及领土安全和海洋通道等问题上,日本具有明显的选边站倾向。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搞“认同政治”的背景下,

日本乐见所谓“自由主义阵营”加强合作向中国施压的局面。

2、在地区安全和军事领域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一是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炒作中国海警船实际巡航的连续天数增加,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而推动美国深度介入东海问题,形成日美联合应对中国的局面;二是在南海问题上,加紧配合美国开展双边以及多边军事演习,试图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常态化”,增强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三是积极推动发展日美印澳“四国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印度之间的战略合作深度,推进“印太战略”的落实和发展。

3、以周边安全形势恶化为由,加快推动自主防卫建设和军事战斗能力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是否拥有“对敌攻击能力”问题。多年来日本的“防卫族”一直鼓吹日本要拥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由于这涉及到彻底改变“专守防卫”政策的嫌疑而遭到舆论反对。这次以终止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为契机,自民党内部火速成立“导弹防御讨论小组”,并向安倍内阁提交“为守护国民而提高遏制力的提案”;安倍首相紧急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表示“为确保遏制力,提出新对策是必要的”,日本的防卫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转变。二是美国是否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这将深刻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必将触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二、经贸高科技领域的“脱钩”迹象

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2020年日本舆论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即是供应链价值链的重组以及高科技领域的“脱钩”问题。

1.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突发和蔓延,日本物资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凸显。日本舆论出现了“经济相互依赖陷阱”、“经济脱钩论”等论调,有些媒体甚至呼吁紧随美国,与中国“脱钩”。日本政府也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始评估和应对“对华过度经济依赖”、“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经济产业省4月份推出了“改革供应链”的补助项目:一是设立补助预算达2200亿日元的“促进国内投资补助项目”,补贴企业回迁日本后的工厂建设和设备引进,以降低产品或零部件在疫情下可能断供的风险,以此加强涉及国民健康重要产品的国内产业链的坚韧性。二是设立“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等支援项目”,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体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疫情期间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的供应来源多样化增加供应量,二是通过汽车、电机、医疗器械的零部件和稀有金属材料的生产基地多元化强化供应链。

2.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中美科技战对日本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5G 技术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20 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物联网、5G、AI、量子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本技术创新的成败也将对未来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在通信安全问题上,日本跟随美国,全面排除在政府和自卫队中使用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通信设备。由于日本企业在 5G 领域中较为落后,全球的基站占比不到 2%。日本政府拟通过积极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以及提高技术壁垒等举措来推动国内的 5G 技术创新,扶持国内的通信企业发展,提升日本在通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日本《令和 2 年度税制》规定,在 5G 领域引进“日本政府认定的安全性较高的供应商设备”的日本通信运营商及有关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规模高达 15%。其次是财政预算投入,2019 年的修正预算案决定在 5G 方面投入 1100 亿日元,占“数字新政”修正预算中的 12%。

3.建立统筹处理经济与安全问题的机构和法律法规。为了应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和安全化问题,日本政府建立了统筹处理经济与安全问题的机构和法律法规。首先,在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置“经济班”,负责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战略,从国家安全角度审理重要经济事务,并加强信息搜集,防止技术外流。“经济班”发挥的“经贸事务战略化、安保化”司令塔功能,进一步得到加强。其次,在限制外资的法规方面,通过了修订后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强化对安全保障领域重要的特定日本企业的外资出资管理,这是日本政府为防止尖端技术外流而加强出口管理体制的举措。

三、相互依赖中难以“脱钩” 唯有合作才能共赢

中日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的深度互嵌,使日本在经贸领域难以实现对华“脱钩”。即便在新冠疫情下中日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日本对华出口也迅速恢复。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9 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为 14.7 万亿日元,占出口总额的 19.1%,2020 年则上升为 15 万亿日元,占出口总额的 22%,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国。事实证明,新冠疫情和美国的“脱钩”战略不仅没有影响到中日经贸关系,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此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 2020 年 3 月份至 4 月份对华东地区 710 家日企、华南地区 457 家日企开展了是否会调整供应链的紧急调查。结果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双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仍有约 85%在华日企选择维持现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 2020 年 5 月对 83 家在中国湖北省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20%表示“将扩大规模”,

72%表示“当前(1-2年内)不会改变计划”。由此可见,除了部分低附加值行业为了提升价格竞争力可能考虑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之外,日本制造业难以离开中国。

2020年已经过去,特朗普政府业已下台。“脱钩”和“对抗”给世界带来了混乱和动荡,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将如何开拓新局,全世界都拭目以待。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深刻化的背景下,日本战略上“选边站队”的政策不会改变。但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处在加速重塑之际,美国总体实力的衰退和美国内部的分裂状况难以改变,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将是必然趋势,日本寻求战略自主和“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选择亦是既定方针。

中日关系将如何开拓新局?近年来日本的对华认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即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与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邻居中国如何稳定关系是日本不得不努力的方向。安倍内阁后期在对华政策上的调整,正是建立在上述对华认知基础之上的举措。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中日携手走向新时代是必然的趋势。菅义伟政府上台后,多次重申稳定中日关系至关重要。但在充满动荡和分裂的世界中如何稳定中日关系,充满挑战。中日双方要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把握好中日关系趋稳向好的大方向,积极沟通 and 交流,缓解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困境。

中日两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不言而喻是抗击疫情和重振经济。中国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要向日本释放建立更加深入合作关系的信心,展现中国的市场魅力,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能量。中日关系不进则退,两国政府要保持高层次沟通,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第一,疫情不一定产生新的对立和变化,但有可能会推动或扩大既有的对立和变化。如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疫情而更激烈、更尖锐了。特别是在有关“军民两用”技术的“脱钩”问题上,给日本经济界带来不小的压力。对日本来说,“脱钩”问题的难点,在于难以将安保(政治外交)和经济分开。因为最发达的技术不只用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可以用于军事方面。因此,美国特别注重“军民两用”技术。但是,美国也难以全面性地与中国“脱钩”,只能采取限于最发达的技术、限于“政府采购”等与中国进行“脱钩”而已。而日本政府和日本经济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只能采取对政府相关行为进行限制而已,目前对于民间产业没有要

求它们控制与中国相关的产品、以及与中国相关的产业链。讨论有关疫情下“脱钩”的“表与里”的话,希望深入了解日本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难处。不然的话,可能难以解释日本在这一问题应对上的一些举措和现象。

第二,此文指出“经济产业省4月份推出了‘改革供应链’的补助项目:一是设立补助预算达2200亿日元的‘促进国内投资补助项目’,补贴企业回迁日本后的工厂建设和设备引进,以降低产品或零部件在疫情下可能断供的风险,以此加强涉及国民健康重要产品的国内产业链的坚韧性。二是设立‘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等支援项目’,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体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疫情期间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品的供应来源多样化增加供应量,二是通过汽车、电机、医疗器械的零部件和稀有金属材料的生产基地多元化强化供应链”。这里,似乎是认为以上经济产业省的措施,是为了应对日本舆论出现了日中“经济相互依赖陷阱”、“经济脱钩论”、甚至有些媒体呼吁紧随美国与中国“脱钩”等,所以日本政府迅速出台了上述一系列政策,以评估和应对“对华过度经济依赖”、“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但是,我们一看上述项目的结果,就明了这些政策的用意所在。如“促进国内投资补助项目”,主要是日本政府为了增进国内生产口罩等医疗防护产品的能力,利用这一项目帮助在中国的日本相关产业迁回日本,其中回流的也大部分都是口罩工厂等医疗产业的工厂。再如“海外供应链多元化等支援项目”,比“促进国内投资补助项目”预算要少得多。确有一些工厂受到国家经费支持离开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但是其数量极少。因此,经济产业省的这些项目跟所谓的“脱钩”问题,几乎没有较大的直接关系。

第三,有关日本企业的动态,“专题二”利用JETRO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指出,“由此可见,除了部分低附加值行业为了提升价格竞争力可能考虑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之外,日本制造业难以离开中国”。但这仅代表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的观点,而不是在日本国内的总公司的看法。最近,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与在国内的总公司(的人员)之间,在对中国的看法上差异不小。关于这一点,也需要予以关注,才能全面把握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态度。

因为日中之间有紧密的经济关系,难以进行所谓“脱钩”。如果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采用和美国同样的与中国进行“脱钩”的话,那是一个可能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难题。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困境,日本需要与美国协商的同时,也有必要与其他有和日本同样处境的盟国,一起探求应对之策。

二、青山瑠妙 教授

在日本,“脱钩”一般是指经济关系的分割。“专题二”对中日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

面、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脱钩”问题,进行了讨论,饶有意味。同时还考察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动向,提醒人们日本防卫政策将迎来重要变化的时期。

正如“专题二”所论述的,中日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很紧密,“脱钩”很困难。现状是日本企业不希望中日两国的经济分割,并且也没有为之做准备。

在日本,无论官民都对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安全保障具有很高的危机意识。如前所述,如果能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管理海洋问题对立的提案,那么就有改变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向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关于日本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上的“脱钩”,仅限于具有战略价值的产品、材料,以及对国民健康有重要价值的产品与材料。从经济产业省去年出台的“为保障供应链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的批准项目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仅限于口罩及医疗产品等物资,且几乎全都是对中小企业的援助。因此,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中日经济的“脱钩”这一认识,可能存在误解。并且,高科技合作在今后重建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上将会成为关键。

三、伊藤亚圣 副教授

新冠病毒流行后不久,日本对供应链中断的危机感日益增强。关于日本政府推行的供应链回流和多元化等政策,目前尚不清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在日本也有人认为,相比供应链回流,其分散化最应该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关于“脱钩”,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对核心通信设备实施规制也在日本国内得到一定支持。但是,关于是否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与中国“脱钩”,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东亚,要想实现技术、贸易和金融上的隔断,成本甚大。美国特朗普政府末期列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军方关联企业名单,禁止美国企业与其开展业务。在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公司,或许都不得不为潜在的“脱钩”做好准备,重新认真考虑他们的商业合作关系。

专题三 新冠疫情下中日经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宋志勇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本已疲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但在各国积极努力下,世界经济已看到曙光。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可喜的是历经多年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终于签署。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助推世界经济复苏,并对未来进一步深化中日经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衰退,也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格局更加复杂多变。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实所罕见:美国股市4次熔断,全球经济停摆,大多数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其影响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统计数据显示,美欧发达经济体经济大幅下滑:美国二季度GDP按年率下降32.9%,为1947年开始公布季度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欧盟第二季度环比下降12.1%,同比萎缩15%,为1995年以来最大跌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1月份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2020年,美国将下滑3.4%,日本下滑5.1%,欧元区下降7.2%。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国家在疫情之初对其的严重性重视不够,导致疫情发生后迅速蔓延且不断扩大。从5月份开始,美欧等多国还试图重启经济、放松管制,引发聚集性感染事件频发,疫情大幅反弹。特别是近期,病毒出现变异并迅速蔓延至多国,更增添了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疫情不断发展蔓延,各国经济重启艰难,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创,世界经济处于艰难恢复之中。

疫情对中日两国影响各异,年初中国所受影响巨大,经济、贸易均严重下挫。但是,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很快控制住疫情,并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虽然第一季度经济大幅下降,但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恢复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份就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增长的大型经济体。

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已衰退的日本经济同样造成巨大冲击,据日本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GDP环比萎缩7.8%,按年率计算下降27.8%,跌幅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后创下的17.8%,为1955年以来最差的记录。但由于疫情得到控制,第三季度经济大幅反弹。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欧美的第二波疫情冲击,近期日本新冠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加之已经延期至2021年的奥运会经济增长设想一旦落空,出现曙光迹象的日本经济能否持续保持恢复增长态势,仍需观察。

二、疫情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时间长,全球新冠疫情反复且不断出现新情况,对中日两国经济贸易都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总体来看,两国经贸关系基本保持稳定,双方贸易仍实现了增长。上半年中日贸易额有一定起伏,两国进出口额升降各异,但从9月份开始,中日贸易额保持了同

比增长势头。据中方统计,2020年,中日贸易额 317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0.8%。其中,中国对日出口 1426.6 亿美元,进口 1748.7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0.4%和增长 1.8%,中方贸易逆差 322.1 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速报值显示,中日贸易额 32.56 万亿日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 15.08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2.7%,进口 17.48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 5.3%,贸易逆差 0.24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 36.5%。应该说,2020 年日本对外出口面临巨大压力,全年出口暴跌 11.1%,为历史上第三大降幅。但是 12 月份,因对华出口同比增长 10.2%,日本对外出口 25 个月以来首次实现了 2.7%的增长,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的地位。投资方面,据统计,2020 年,日本在华新设立的企业有 799 家,同比下降 20.1%,实际金额 33.8 亿美元,同比下降 9.3%。截止 2020 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设立企业 53633 家,实际使用金额 1190.8 亿美元,日本位居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国首位。

新冠疫情对中国对日走出去亦有影响,对日投资与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保持稳步发展态势,但派往日本的技能实习生大幅下降。2020 年,中国对日全行业直接投资 3.6 亿美元,同比 33.3%;中国企业在日本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中国向日本派出技能实习生 15976 人,比上年下降 61.3%。截止 2020 年年底,中国对日全行业直接投资累计 44.6 亿美元,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52.6 亿美元,中国在日本技能实习生总数 8.3 万人。

对日旅游方面,因疫情受到重创。自 2003 年日本政府提出“观光立国”战略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积极努力争取的重要国家。2019 年,仅中国大陆访日游客就近 980 万人次。但是,新冠疫情重创日本旅游业,由于疫情持续扩散、航班缩减,中国访日游客大幅减少。日本国家旅游局宣布,2020 年,中国访日游客同比减少了 88.9%。

三、RCEP 签署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新冠疫情持续发展,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渐盛行的国际形势下,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RCEP 终于在 2020 年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即将诞生,也向后疫情时代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发出了强烈信号:中日两国将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因此,RCEP 的签署,不论对中日两国,还是对经济全球化和推动自由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将为中日两国更好的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更大舞台。

随着中日两国降税安排等各领域承诺的逐步落实,两国经贸合作将获得进一步发展。对

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如电子机械等关税减低,将提高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其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日本降低或减免中国对日出口商品关税,如服装类产品、农产品、食品以及化学制品等,将促进中国对日出口增加。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呈现不平衡状态。RCEP 签署以后,日本投资自由化程度提高,有利于中国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将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发展。

RCEP 签署后,中日首次成为相互开放市场的自贸伙伴关系,意义非常重大。一直以来,中日两国均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且互补性非常强,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的智库研究成果也认为,双方如能建立自贸区,将会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尽管中方非常积极地推进包括中日韩 FTA 在内的自贸协定的谈判,双方始终未能签署自贸协定。此次签署 RCEP,对正在谈判的中日韩 FTA 是一个积极信号,将有助于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

此外,中日两国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受益者,两国就 RCEP 达成一致,反映了双方在多边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应继续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体制,有效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构建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

四、未来中日经贸合作展望

目前,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有余,虽然仍将持续,但在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曙光已现。据 2021 年 1 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由于多支新冠疫苗获准上市,疫情出现改善的希望大增。尽管新一轮疫情来袭,变异病毒出现,也给经济前景蒙上阴影,不过,今年全球经济将实现复苏。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长 4.3%,其中美国 5.1%、欧元区 4.2%、日本 3.1%,亚洲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预计增长 8.3%,其中中国 8.1%。

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日两国,既遭受了疫情给经济所带来的重创,也深刻体会到加强合作的重要性。疫情下中日两国之间一度出现短暂产业链、供应链断裂、贸易显著下滑等现象。但因中国采取果断有力措施,经济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问题已得到缓解,中日经贸合作恢复增长。中日贸易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增长,再次证明了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及其合作的重要性。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加强合作,成为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实际上,中日两国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一是 2020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过去重视出口,转变为更加重视中国市

场的发展,这为日本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中日两国可以共同合作,在中国市场上创造、寻求更多的商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提到“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这一信号不应被忽视。二是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历经多年,这一倡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赞同。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可以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中得到发挥,共同实现拓展第三方市场的构想。三是充分发挥 RCEP 签署带来的新机遇,进一步推动两国区域经济合作,探讨如何更好地深化双方的合作领域。可以说,RCEP 将有助于中日未来的经贸关系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有意加入 CPTPP,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会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作为 CPTPP 的重要成员国,日本应该积极与中国探讨如何推动中国更好更快地加入 CPTPP。一旦中国加入 CPTPP,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对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宋志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专题三”客观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指出经贸是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基础的同时,也考察了新冠疫情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在此补充以下三点:第一,“专题三”指出中国的双循环将对中日经济关系带来新变化,这一点特别重要。比如,丰田公司等在中国采用了新的经营模式,即该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利用中国国内的产业链进行生产,生产出的产品也在中国市场出售。这一模式,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第二,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在重视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可以找出新的经济合作方向。即在后疫情时代,中日双方如何探索新的合作领域。比如围绕气候变化的产业、数字化产业等领域,会成为将来两国合作的亮点。第三,日方经济界非常关注中国所制定的“出口管制法”,如果中美双方“脱钩”的话,日本等与中国具有紧密产业链的国家,都将受到很大的打击。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专题三”对 2020 年的中日经济关系进行了事实确认,论述了 RCEP、CPTPP 提供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中日贸易呈现出复苏迹象。这种经济状况,显示出在经济关系中的中日两国彼此需要对方。并且,即使是在新冠疫情中,中国的对日直接投资和外包项目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增长趋势。这给人们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即中日经济关系逐渐进入一种新的结构。

中国加入 CPTPP 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机遇,这也关系到中国的深化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日本也能听到许多支持的声音。

三、加茂具树 教授

对于日本经济而言,中国是市场、工厂和投资者。与中国建立稳定和良好的经济关系,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然而,日本社会对中国的风险意识仍然很高。我认为有必要在《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中,对此类问题的发生机制进行讨论。

由于对中日关系发展方向的怀疑和担忧,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活动的日本企业,对于今后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感受到了更多的风险。例如,《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法治(rule of law)和言论自由等问题的关注,日本商界担心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

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方法可能有助于在中国成功控制新冠疫情,并快速实现经济复苏。但是,日本企业却从中感受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风险因素,以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安定风险,而且不易找到缓解以上问题的出路。

四、伊藤亚圣 副教授

新冠危机表明,即使人员往来中断,货物贸易也可持续。日中之间贸易额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包括中国游客在内,大量国外入境需求蒸发,这对日本的地方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在这个意义上,RCEP 的签署对于东亚贸易秩序的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日本国内也有观点认为,RCEP 的许多章节在安全保障和公共政策上允许例外,约束性较低。中国政府表明了有意参加 CPTPP 的意向,这对于在亚洲建立和扩大基于规则的多边国际经济秩序,是值得欢迎的举措。但是,CPTPP 关于国有企业和数字经济等章节中的具体规定,似乎与中国经济现状和制度并不一致。中国一再频繁提及的改革开放政策,其真实性如何将受到考验。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内循环理论最终具有何种含义,将导致怎样的实践,对此日本和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专题四 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外交逆势而行

贺 平

2020年,在全球疫情突如其来、中美战略竞争外溢效应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自身也经历了领导人更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难言乐观。尽管如此,经济外交仍踵事增华,成为日本外交的一抹亮色,在全球阴霾中也显得颇为耀眼。

一、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外交亮点纷呈

“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英EPA)于2020年6月9日正式启动谈判,经过7次视频会议便于9月11日和10月23日分别达成原则性协议和正式签署,且在2021年1月1日生效。这成为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的“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之后,日本在全球特别是亚太以外地区开展经济外交的又一重大成果。

11月15日,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作为RCEP最积极的初始倡议方之一,这一全球涉及人口最多、经贸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历经八年31轮谈判的延宕和波折后终告收官,对日本而言无疑同样意义非凡。

此外,日本在其中扮演重要牵引作用的“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在后续扩容上不断传出重要信号,不仅是原先的一些候选国以及英国等域外国家,而且中国、韩国等域内的重要经济体都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加入的意愿。

二、日本经济外交成果的意义

上述进展既是安倍长期政权在经济外交上持续投入、瓜熟蒂落的阶段性成果,也离不开日本决策层和战略界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下审时度势、激流勇进。以下三点尤值得关注。

1、区域与全球:日英EPA的样本意义。日英EPA谈判的快速进展与两国全球视野的对接息息相关。无论是在约翰逊政府的“全球化英国”的政策理念中,还是在安倍政府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中,自由、开放、进取的贸易政策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全球布局和经济伙伴关系的网络营造上,日英两国在战略方向殊途同归,在路径选择上不谋而合。

由于日欧EPA珠玉在前,仅就规则体系的雄心水平和对日本的短期直接收益而言,日英EPA或许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全球第三和第五大国别经济体之间签署的这项高水平贸易协定,其价值并不仅限于自身。它充分表明,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是相互对立、彼此取舍的关

系,而恰恰是互为表里的。一言以蔽之,不存在没有全球化的区域化,反过来,全球化也无法超越区域化,必然具体而微地体现在各个区域的区域化上。全球化如若停滞甚至倒退,区域化亦无立锥之地。期待与既有的全球化保持一定距离的区域化、醉心于范围狭小的区域化乃至本地化在短期内或许是某种应激之举,但从中长期来看定然是不可持续的。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辩证关系正在呈现新的逻辑和样态。但究其根本,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整合和深化,只有放在全球视野中才具有现实意义。

就产业结构和基础人口而言,日本绝非是一个“小国”。但在今天的世界中,即便是“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也难以靠一己或一隅之力取得真正的发展。战后日本历史的正反经历充分揭示,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化取向是日本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石。过去一年日本在经济外交上的重大成果,都是在当前“去全球化”讨论下跨区域合作的崭新实践。在保护主义、经济摩擦、内视倾向频频成为世界经济关键词的背景下,这些阶段性成果难能可贵,也更具示范价值。

2、诸边与双边:RCEP 对中日关系的特殊作用。RCEP 谈判在 2020 年骤然加速,原因有三,都与中日关系须臾交织。首先,RCEP 的出现本是中国两国携手倡议的结果,一改“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与“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等不同畅想胶着并峙的状态。2013 年 5 月正式启动谈判后,两国对 RCEP 的战略取向和政策考量深刻影响着后者的发展方向与谈判走势。尽管谈判期间,各方不乏分歧,但最后关头的奋力冲刺说明中日两国求同存异,在维护区域经贸秩序、应对共同挑战上再度建立了共识,也相互体认了对方在特殊时期的关键诉求。其次,印度退出 RCEP 谈判后,日本国内一直对其重返充满期待,也多次主张“印度不参加,RCEP 就没有意义”。但现实表明,印度的立场改变并非故作姿态、坐地起价,而是确有苦衷,因此去意已决。事实上,印度在自然人流动等议题上的利益诉求,对包括中日在内的其他谈判方均是较大的挑战。有鉴于此,日本也揆情度理,对谈判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态度。最后,在中美战略竞争未有根本性改变的背景下,中国显然加大了对亚太和欧洲的战略投入。对日本而言,如何在中美对峙的框架下化被动为主动,有效提升自身的地区影响力、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也日益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美国对 RCEP 的轻慢,客观上也使中日两国相向而行受到的外来掣肘有所减轻。

如果说日英 EPA 在跨区域合作中彰显了全球价值,那么 RCEP 则在诸边和区域平台上透视出双边意义。借由 RCEP,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建立起了自由贸易关系。对日本而言,这是完善全球 FTA 网络的一块最大拼图;对中国而言,则是首次与世界

经济排名前十的国家同属一个 FTA。在中日韩 FTA 短期内仍进退两难的背景下,RCEP 有助于提升中日经济的合作能级和制度化水平,支撑双边关系在重回正轨的方向上稳步前行。

受疫情影响,中日经济合作的不少指标在 2020 年不降反增、更显突出。例如,2020 年日本贸易出口在整体减少 11.1% 的背景下,对华出口仍实现了 2.7% 的增长,由此中国也时隔两年再度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如果清醒地看待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基础和运行逻辑,也就不必为了疫情特殊时期的进退得失而过于喜忧。

3、局内与局外:围绕 CPTPP 的战略试探。202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20 日,习近平国家主席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24 日,王毅外长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谈中就习主席的表态交换了意见。根据日方测算,CPTPP 将使日本 GDP 增加 1.5%,而如果中国加入,增幅可能会翻番。因此,日本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意向的态度尤为令人关注。

近期,日本首相菅义伟、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驻华大使垂秀夫都相继就中国与 CPTPP 的问题接受了采访。整体而言,日本官方和主流声音在对中国加入 CPTPP 持较为积极态度同时,强调应以落实 RCEP 为当务之急,且需坚定维持 CPTPP 的高标准。

中国加入 CPTPP 的问题,首当其冲当然是自身具有何种政治意愿和政治魄力,在多大程度上对核心议题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外部的支持、鼓励和推动也不可或缺。此前,日本在 CPTPP 的落地中发挥了关键的引领和协调作用,2021 年又肩负 CPTPP 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期待日本能够一如既往扮演起一个独特、重要而积极的角色,这或许也可以成为今后一个阶段中日经济合作乃至战略合作的一个抓手。

三、展望 2021:隐忧浮现与百尺竿头

在进入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际,或许没有一个国家对于自身的经济增长充满了十足的自信,日本亦不例外。事实上,对日本而言,可谓不乏近忧。一方面,在全球疫情尚未迎来拐点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仍将在下行通道徘徊。对于 2019 年已结束战后最长扩张周期的日本经济而言,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由疫情进一步放大的就业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心理淤积等问题,亦非一朝一夕能够缓解。另一方面,无论东京奥运是否举办、以何种方式举办,其对东道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都将是空前的。这将对日本的财政负担和中长期经济预期,带来沉重的压力。

2020 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日本外交的六大重点领域,除了日美同盟、朝鲜、东亚近邻、中东等四个具体的区域和国别指向之外,“在制定新的共同规则中由日本发挥主导

作用的经济外交”和“应对全球化问题”是另两个议题导向型的领域。战后七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一再印证,成功的经济外交往往是在长期稳定政权时期实现的。菅义伟政府能否经受住内外交困的重重考验,尚在未定之数。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要想进一步开疆拓土、纵横捭阖,也需要更大的意愿和技巧。

随着时代转换和政权更迭,在既有动能渐渐消退的情况下,日本能否在经济外交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不仅关系到自身,也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的进程和走势。如果说经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在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中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背离甚至反转,其积极作用在中日关系中可以说有增无减。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反思才能更好地谋划和展望。过去几年全球格局的起伏跌宕,使中日两国都对彼此的经济外交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也使经济外交愈加超越纯粹的在商言商和工具理性,真正体现出“经济”与“外交”互构的应有之义。

(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专题四”对日本的“经济外交”评价较高,可能让经济产业省的官员高兴点。对2020年日本的经济外交,可以补充以下两点。第一,确实日本推动了不少多边经济机制,但是目前的“脱钩”动向,也还是会影响到这些机制的意义和效果。第二,目前世界经济的快速变化,数字化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多边经济机制的内容也应该包括这些新的动向。特别是,数字化以前形成的机制,都需要随着新的动向更新内容。第三,有关CPTPP,台湾是否加入,可能会成为2021年的争点,我们需要继续关注。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专题四”俯瞰了2020年新冠疫情下RCEP、CPTPP、日欧EPA等日本的经济外交进展,正如其所指出的,近年日本的经济外交愈发活跃,CPTPP、亚太的RCEP以及日欧EPA所组成的日本的全球主要FTA的经济战略,已经接近完成。

日本巨大的FTA经济战略与中国的FTA战略具有很高的亲和性,能够通过相互并轨运行来促进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尽早加入CPTPP十分重要,应该尽快推进。

中日韩FTA是长年未决的悬案,RCEP缔结后,中日韩FTA的难度会相应变高,所以有必要达成更高质量的协定。

专题五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军事安全发展动向

江新凤

新冠疫情和政权更替是 2020 年日本两大“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加速国际秩序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调整,也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安倍首相突然辞职,使其任期内“修宪”梦破灭,但菅义伟政权在内外政策上总体上延续安倍路线。总体看,2020 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以新型力量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发展自主军事能力,推动军事安全政策转型;同时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全方位合作,积极推进“印太战略”。

一、加速推动军事安全政策转型,探讨防卫力量由“盾”向“矛”转变

日本政府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三个纲领性文件,重点探讨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问题。安倍呼吁日本需要建立可直接攻击敌导弹基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8 月,自民党提交建议案,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修改为“拥有在敌方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能力”。11 月,日本政府称考虑到公民党的谨慎态度,暂缓把“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内容写入《防卫计划大纲》,菅义伟称政府将继续探讨“除拦截能力以外的提高威慑力的对策”。然而,无论是“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还是“拥有在敌方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能力”,均违背了以“不对对方实施先发制人攻击”为基本含义的“专守防卫”原则。如果把“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即将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将向主动先制方向调整,在今后美日联手介入地区军事冲突中,日本将更多地扮演“矛”的角色。这将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

二、保持防卫费持续增长,进一步提升自主军事能力

2020 年 9 月,日本防卫省提交 2021 年度预算申请,申请额为 5.49 万亿日元(约合 520 亿美元),^①较上年度增长 3.3 个百分点,系日本年度防卫预算连续第 9 年增长。日本加大对武器装备研发和更新力度,重点提升侦察预警能力、制空制海能力、防空反导能力、防区外打击能力,着力打造攻防兼备的独立作战力量。

在侦察监视方面,日本自卫队将部署 E-2D 预警指挥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提升预警侦察能力。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加入美国“千颗卫星群”计划,以加强对敌弹道导弹和太空

① 日本防卫省「わが国の防衛と予算——令和 3 年度概算要求の概要」、2020 年 9 月 30 日。

垃圾的监视,实现日美情报共享。^①在制空制海方面,日本计划从美国引进 F-35 战斗机,并在青森县三泽基地新编两个 F-35 飞行队,同时对现有战斗机进行升级,并研发新一代战斗机;新建两艘“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将两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改造成能起降 F-35B 的航母,以提高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发展新型“大鲸”级潜艇,提升水下作战能力。在防空反导方面,日本宣布暂停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部署计划后,对导弹防御体系进行重新规划。一方面加强海基反导力量建设,包括新建“摩耶”级宙斯盾舰,建造弹道导弹拦截专用舰。另一方面引进机载“联合攻击导弹”(JSM 和 JASSM)、高超音速导弹、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拟用远程导弹打击敌导弹及设施,建立攻防兼备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时提升防区外打击能力。

三、加快天网电新兴领域能力生成,提升多域联合作战能力

2020 年度《防卫白皮书》指出,自卫队正着力完善新兴领域作战部队体制,强化太空态势感知及情报搜集能力,充实并强化系统与网络,研发引进高水平电子战设备等。在太空领域,日本航空自卫队新设约 20 人的“太空作战队”,2023 年度将扩充至 120 人,负责太空监视等任务。在网络领域,在熊本县健军基地成立 40 人规模的首支地方网络部队,“网络防卫队”计划由 220 人增编至约 290 人,在陆上总队直属系统通信团新编陆自“网络防护队”,以强化自卫队网络防卫能力。在电磁领域,日本计划在熊本县健军基地组建约 80 人的电子战部队,主要任务是确保前沿部队通信、干扰敌雷达及制导电波。日本还计划在东京朝霞基地组建继北海道、熊本之后的第三支电子战部队。2019 年 8 月,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发布《研究开发愿景——多域联合防卫力量的实现与未来》,制定了太空、网络、电磁、水下等新兴领域技术与装备的中远期研发计划,表明日本正在着力加强新型作战力量的体制和能力建设,提升多域联合作战能力,以抢占新兴领域优势地位。

四、继续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

首先是加强高层战略协调。安倍首相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 60 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日美安保条约是守护亚洲和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支柱”。菅义伟 9 月担任首相后即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双方表示将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两国防长多次举行电话会议,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并强调日美同盟对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将继续加强日美合作。拜登当选总统后,菅义伟与其进行电话首脑会谈,确认双方将强化

^① 《日媒:日本将正式讨论加入美“卫星群”》,参考消息网,2021 年 1 月 13 日, www.cankaoxiaoxi.com/mil/20210113/2431998.shhtm。

日美同盟,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开展密切合作,并再次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①

其次是加强军事联合训演。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日美部分年度联合训演计划取消或推迟,但在日本疫情得到控制后,很快恢复日美联演,重点演练两栖作战。如2020年1月至2月日美在美加州举行“铁拳”年度演习,主要演练两栖登陆等科目;2月在位冲绳美军蓝色海滩训练场开展联合两栖作战训练;10月至11月,日美在日本本土及冲绳附近海域举行“利剑”联合演习,主要演练“离岛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时的两栖登陆作战。12月,日美在自卫队建军驻地举行“山樱”联合指挥所演习。受疫情影响,此次演习通过兵棋推演方式进行,参加人数也少于往年,远方部队以在线会议方式参加。

在国际战略格局加速调整和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美两国政府继续强化日美同盟,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东海、南海问题以及太空、网络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加速军事一体化进程,提升联合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日本今后将越来越多地走向前台,美国则退居其后,为日本提供延伸威慑和力量支援。

五、加强双多边安全合作,构筑“印太战略”新格局

日本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积极开展与印、澳、东盟及欧洲等国家的双多边安全合作,努力构筑以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为核心的“印太战略”格局。

一是加强与印澳的安全合作。日本与印度于2019年11月首次举行“2+2”外长与防长会议,协商开展联合演训及无人地面车辆装备研发、共享海上情报等,确认将实施空中力量首次联演,并于9月举行代号为“JIMEX-20”的海上演习,提升双方海上部队的协作能力。日印于2020年9月正式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两国将在维和、人道主义救援及其他军事合作活动中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日澳两国防长10月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开展无人机联合研发、进行航天与网络领域合作,并就自卫队向澳军舰艇飞机提供“武器等防护”达成原则共识。11月19日,日澳就《互惠准入协定》框架达成共识,这一协定允许日澳双方部队能够相互访问、训练和联合军事行动。一旦协定生效,澳大利亚将成为美国之外首个自平时起可接受日本“武器等防护”、军队特许入境日本的对象国,日澳“准军事同盟”关系可能形成,两国军事合作将显著深化。

二是强化日美澳印四边机制。在日美两国共同推动“印太战略”的背景下,日美澳印四边

^① 《日美首脑首次电话会谈 确认强化同盟关系》,中评社,2021年1月28日, www.CRNTT.com。

对话自 2017 年重启并呈现常态化趋势,旨在加强四国防务合作和海上安全合作,制衡中国。日美澳印四国外长于 2020 年 10 月举行第二次会议,确认四国在实现印太地区稳定及应对新冠疫情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12 月,“四边对话”再次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重点讨论包括共同应对疫情等事宜。“四边机制”正在成为美日积极推动的“印太战略”的基本依托。11 月,美日印澳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0”四国联合军演,演练防空、反潜、对海对空射击等科目。尽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此轮演习参演兵力规模较小、规格较低,但却标志着日美澳印开启“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四国军事合作机制。

三是强化与东盟、欧洲国家的安全合作。菅义伟就任首相后于 10 月首访越南、印尼,与越达成《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计划向越出售巡逻艇、反潜机、雷达等装备,并签署覆盖基础设施、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并与印尼达成加快《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谈判的共识。早在 2019 年 1 月,日本就与英国达成提升战略伙伴关系并扩大军事合作的共识,并于 4 月举行第四次日英“2+2”会谈,双方就制定“关于安全与防务合作的联合计划”达成一致。此外,日本还提出加入由美英加澳新组成的情报共享网络“五眼联盟”,成为“第六只眼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20 年 12 月发布第五份“阿米蒂奇报告”——《2020 年的美日同盟:一个平等的全球同盟》,积极建议将日本纳入“五眼联盟”。一旦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日本与其他五国之间的情报交换将更加密切,意味着日本与美盟的安全合作将有实质性提升。

总的看,日本以“印太构想”为抓手强化海上安全合作,尤其是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明显提速、深化,在机制化磋商、情报共享、后勤支持、联合军演等方面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正在朝着准军事联盟或“亚洲版北约”方向发展。

(江新风,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第一,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问题。

“专题五”指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违背了以‘不对对方实施先发制人攻击’为基本含义的‘专守防卫’原则”。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国内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它违反“专守防卫”原则。此文指出“如果把‘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即将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将向主动先制方向调整,在今后美日联手介入地区军事冲突中,日

本将更多地扮演‘矛’的角色。这将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并对日本关于这一问题的态度表示担忧。关于菅义伟政府对“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所持的态度,可以参考2020年9月18日小西洋之议员(参议院/立宪民主党)向参议院提出的“质问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此的答复。即日本政府在答复中再一次指出:目前政府依然坚持之前有关“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解释。另外,关于自卫的范围,则以实际发生的武力攻击规模和状态来判断。也就是说,菅义伟政府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态度,还是与之前的日本政府一样,没有把它写入《防卫计划大纲》。但是,对日本来说,因为东亚的安保环境有所变化,所以不得不讨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问题。

第二,关于“军事能力的增常和安保合作的进展”问题。

日本的防卫预算今年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对日本来说,近年中国在日本近海的军事活动越来越活跃,日本国家和社会感到的“威胁”越来越强。所以,舆论也支持日本政府增加防卫预算,我们可看到东亚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状态。

中国认为目前美国与其盟国在构建立新的安保合作机制,“专题五”指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正在朝着准军事联盟或‘亚洲版北约’方向发展”。其实,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早就表明,今后美国无法担任世界警察,因此要求盟国①增加军事预算(减少美国的军事负担);②同盟关系脱离“单行”模式而采取“双行”模式;③美国希望西太平洋的盟国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和安全网络(security network)。从战后历史来看,美国和西太平洋盟国之间的关系,与美国和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即美国与北约国家之间有安保条约,但与西太平洋盟国之间并非均有安保条约,只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轴(hub & spokes)的关系。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试图与西太平洋的“辐”(spokes)国家建立新的安保合作关系。但是,目前西太平洋或者印太地区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跟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同。如果西太平洋的盟国之间建立安保条约关系的话,那才是这一地区将出现“亚洲版北约”。但是,目前此可能性还是不大。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专题五”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军费上涨、美日同盟以及印太战略为中心,考察了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诚然,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讨论日本安全保障问题时无法回避的是安全保障的两难问题。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确实在改变,军费也在增加。对于这个问题,希望用本报告书“总论一”中所提议的“善意”与“平实”的精神来应对。也就是说,冷静接受,不做过度反应,才能确保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全发展。

关于印太战略也是如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与印太战略有许多重合之处,只有从

“合作的视角”而不是“对立的视角”出发,才能有效消解中日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束缚。与加入 CPTPP 同样,“一带一路”构想与印太战略的合作(“对接”)也并非没有可能。

专题六 新冠疫情与中日海洋问题的变化

王广涛

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 2020 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显示,接近 9 成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①而所给出的理由中,“经常侵犯钓鱼岛周边的日本领海与领空”、“中国采取与国际规则相异的行动”、“中国在南海等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过于强势而反感”位居前三。对于中国的受访者而言,“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所引起的对立”,亦是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的重要理由。此外,中日两国的受访者都认为,“以钓鱼岛为中心的领土争端问题”,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②尽管舆论调查的数据未必能够反映两国关系的全部,但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表明,以领土争端为核心的海洋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依然如此。

一、中日海洋问题的症结点

目前,中日两国之间的所谓海洋问题主要包括,围绕钓鱼岛的领土争端、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南海海域海洋通道和自由航行等问题。这些问题因为属性不同,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所差异。

如表 1 所示,中日两国在东海、南海等海域议题的主张对比差异明显。其中,钓鱼岛所涉及的是领土争端问题,是中日关系的重中之重;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所涉及的主要是领海争端问题;南海对于日本而言则主要涉及海上航行通道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看似有区别,实际上又有机结合在一起。日本政府一直将这三个问题视为中国积极“进出”海洋的重要表现。由于东海油气田开发和钓鱼岛领土争端与日本直接相关,中国的动向一直牵动日本的神经,以至于日本政府的防卫经费预算持续近十年的连续增长,其安全保障的重点亦放在西南诸岛的防卫上。海洋问题是中国作为“改变现状”国家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威胁论”话题制造的重要来源。对此,中国一方面强调钓鱼岛、南海岛屿等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主张外,主张当事方本着搁置争议、协作开发的原则致力于争议的和平解决。当然,中国政府对于“改变现状”的

^① 日本言论 NPO 官方网页, <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2.html> (2021 年 1 月 23 日访问)。

^② 同上。

表 1 中日两国在海洋问题上的主张差异

议题	中方主张	日方主张	关键点
钓鱼岛	中方坚持并恪守“搁置”钓鱼岛主权争端,在东海划界时不以这些岛屿为基点。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土。	日方则认为在钓鱼岛主权上不存在争议,主张钓鱼岛在划界时应享有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	1、钓鱼岛问题不是单纯的主权之争,而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一部分。 2、中日两国不仅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而且对钓鱼岛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也存在不同主张。 3、中日之间的四项原则共识(2014 年)。 4、美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争端。
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	中国主张按照 1982 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划界,冲绳海槽构成中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日本主张按照 1958 年缔结的《大陆架公约》的“中间线”原则划界。日方认为中国在东海中方一侧开发的平湖和春晓天然气田已越界开采,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1、石油资源是划界问题的主要诱因。 2、国际法理上的博弈:中日双方都希望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原则进行划分,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提出了有利于己方的东海划界原则立场。 3、《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即“618 共识”)。
南海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岛礁的主权要求并不会影响该海域的国际航行自由与自由飞越,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坚持由当事国在东盟范围内通过双方平等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	日本坚持认为有关南海问题的争端应该在有美日等国参与的国际框架内解决,并积极倡导和支持相关国际框架的构建,事实上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1、日本之所以比其他区外大国更关注南海争端,还在于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争端。试图通过介入南海问题来获得在东海问题及钓鱼岛争端上与中国进行博弈的筹码。 2、日本是“南海仲裁案”的重要谋划者和参与者。 3、日本军舰穿越南海海域以及同美国等国在南海周边海域军事演习,日本是否参与美国主导的“自由航行行动”等。

说辞并不认同,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时间节点仍有讨论的空间(中方认为 2012 年 9 月日本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是“改变现状”的行为)。其实,关于这类问题,陷入“不毛之争”往往是常态。

二、新冠疫情与中日海洋问题的新变化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全球范围内大爆发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海洋问题上的争端并没有缓和的迹象。笔者分别以“钓鱼岛”、“尖阁诸岛”为关键词对《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相关报道进行检索,其中在《朝日新闻》中检索到 144 条相关报道,而在《人民日报》中仅检索到 9 条

相关报道。^①可以看出,中国一直在试图淡化两国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为改善中日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空间,但是日本方面似乎一直试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以期望将钓鱼岛问题作为领导人访日等重大议程的筹码。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东海油气田开发的问题上,日本方面要求回到“6.18 共识”原则框架的呼声在 2020 年亦有所增加。在日本媒体涉及钓鱼岛问题的报道中,中国海警船(公务船)进出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报道占据多数。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2020 年中国海警船(公务船)出入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天数为 333 天,大幅超出 2019 年 282 天的记录。^②

除了媒体的报道之外,两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自治体针对钓鱼岛问题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制衡或反制衡。例如,2020 年 6 月 22 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通过了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关于将钓鱼岛行政名称改为“登野城尖阁”的提案。紧接着 6 月 23 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公布我国东海部分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的公告》,将东海该地的 55 处地点和 25 个暗礁命名。这些地点和暗礁位于钓鱼岛周边海域,其中包括“钓鱼洼地”、“钓鱼海底峡谷群”、“赤尾海岭”等名称,很多都包括“钓鱼”的字样。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互动较少,但仍然在有限的交流中将海洋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商讨,其中代表性的案例有王毅国务委员的访日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视频会见。王毅在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谈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日方来历不明的渔船(伪装渔船)频繁进出钓鱼岛敏感海域让中国不得不做出回应。对此,茂木没有当场予以回应亦遭到日本国内的批评。在两国国防部长的视频对话中,岸信夫就钓鱼岛以及南海问题表明了日方的不满和立场。对此,中方则强调了对钓鱼岛和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由此可见中日双方高层对钓鱼岛问题的高度敏感和谨慎对待的态度。

三、缓解中日海洋问题的路径选择

以钓鱼岛为中心的海洋争端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中日关系要重新回到正轨并且有所发展,必须要在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找到灵活的解决措施。一劳永逸解决钓鱼岛问题毕竟困难,对于中长期的中日关系而言,如何在搁置争端争议、减少意外摩擦的基础上做加法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

① 检索时间段均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数据分别来自于《人民日报》《朝日新闻》官方网站的检索。

② 「中国公船の尖閣周辺航行、2020 年は過去最多の 333 日間 日本漁船追尾も」、『毎日新聞』、2021 年 1 月 5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0105/k00/00m/010/116000c> (2021 年 1 月 25 日访问)。

第一,基于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共识,尽速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热线电话。中日两国虽然建立了海空联络机制,但是目前尚处于“开店即休业”的状态,“热线电话”作为该机制的重要一环并没有付诸实施。前述王毅国务委员访日和两国国防部长的视频会见都讨论了热线电话的问题,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此,中日双方可参考相对较为成熟的日韩热线机制,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另外,由于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所属问题上的对立,海空联络机制并没有规定明确的适用范围以及涉及海警、海上保安厅之间的对接,针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可能发生的摩擦或冲突,中日两国亦应保持协商。

第二,扩大中日两国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中日两国应以海空联络机制的建立为契机,积极组织两国海洋事务的高级别对话,这种对话不应该拘泥于两国外交主管部门或海上执法部门,同时还应该拓展到退休外交官、退役将领等二轨外交渠道。此外,来自两国研究机构、智库学者的参与亦可以为解决两国在海洋问题上的争端提供智识基础。另外,两国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以定期会晤的形式机制化以后,可以成为中日两国解决海洋问题的平台,并进而外溢到其他争端领域,成为中日两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窗口。

第三,建议双方积极正面回应彼此的核心关切。例如,日本方面应正确理解中国对海洋开发以及海洋进出的正当诉求,而中国方面则应理解南海作为日本海上航线重要通道的意义。以此为前提,中日双方在避免第三方因素干扰的前提下彼此给予可信承诺,积极正面回应彼此的核心关切,逐步建立信赖关系。

第四,加强两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日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或多有龃龉,但是在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领域则具有相对广阔的空间,两国在海上搜救、反海盗、海上环境联合调查等领域本就有过合作,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领域、海上军事演习等领域也应减少排他性的零和博弈。^①以非传统安全带动传统安全,这对于中日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安全关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① 张晓磊:《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现状及路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89页。

“专题六”比较冷静地分析了中日之间的海洋问题和其变化。

第一,关于中日海洋问题的症结点。在疫情之前的部分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此文指出,“钓鱼岛问题不是单纯的主权之争,而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中方的,因为中方主张“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问题才成为历史问题之一部分。但如果按日本的主张,钓鱼岛属于南西诸岛的话,那么这一问题就不一定成为历史问题之一部分。其二,日方认为,《中日关于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即“618 共识”)是在海洋问题上中日两国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虽然中方对此共识有与日本不同的看法,但是对日本来说,这一共识为讨论海洋问题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第二,关于新冠疫情与中日海洋问题的新变化。关于东海问题,“专题六”对中日两国的报纸(《人民日报》和《朝日新闻》)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然后指出“可以看出,中国一直在试图淡化两国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为改善中日关系营造良好的舆论空间,但是日本方面似乎一直试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做文章,以期望将钓鱼岛问题作为领导人访日等重大议程的筹码”。但是,日方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首先,《朝日新闻》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如果该报报道东海问题的次数增加的话,那么可能会表示中方的海警在这一海域的活动更活跃。因为日方报纸报道的对象,基本上是以中方海警的活动为主。其次,为何日本报纸报道东海的数次较多?是因为在疫情之下,东海,特别是“岛”附近的中国公船的活动比以前更活跃。可能一般日本人认为,如果中方要创造良好的舆论空间的话,先把公务船的活动消极化即可。日本社会看到,在疫情之下中方公务船的活动更积极,感到不少“威胁”,所以一些保守派对此有比较敏感的反应。

第三,关于缓解中日海洋问题的路径选择。完全赞同此文所主张的推动中日海洋合作的必要性。

因循不守旧： 日本对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的回应

秦渝斌

内容提要 美国大战略调整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战略扩张和战略收缩通常呈交替态势。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推行了一系列具有明显战略收缩意涵的政策，包括收缩海外驻军、削减战略承诺、加强盟友责任等。面对这一变局，日本政府在遵循对美追随路线的前提下积极介入区域和全球事务、填补美国缺位产生的空间。同时，日本也积极修补、提升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也赋予其外交政策协调、舒张等新的动向。然则，随着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逐渐升级及美日关系陷入纠葛，日本得以发挥作用的空間存在萎缩的可能，对中美两面下注的平衡政策也受到挑战。拜登政府修补盟友关系的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日关系，但其对华竞争政策并未突破特朗普政府的大框架。中美竞争的制度化与常态化从根本上压缩了日本的外交空间，也使日本处于持续的选择困境之中。

关键词 美日关系 战略收缩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印太战略

9·11 事件之后，进攻性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受此影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出击，从而陷入过度扩张状态。^①为此，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战略收缩政策，例如结束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数次削减军费并大力压缩美军规模等，从而开启了美国战略收缩的通道。2016 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后，对美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剧烈的调整，其商人逻辑和“孤立”取向进一步助推了“华盛顿改变……友善慷慨巨人的思维习惯”。^②此举加剧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步伐，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相应地，作为美国亚

① 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 年第 4 期，第 4-28 页。

② 孙兴杰：《“特朗普主义”的终结？》，载《外交评论》2002 年第 6 期，第 24-47 页。

太地缘安全格局中的“次轴心”，^① 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态势冲击了日本的政策路线，也对其外交战略提出新的挑战。

一、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与日本对美认知

（一）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

一般而言，国家的实力和战略抱负是相互匹配的，当国家处于相对衰落期时，战略收缩是必要的选择。^② 与战略扩张相对，战略收缩意指通过缩减战略承诺来应对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局面。这一战略要求国家将资源从边缘义务转移至核心义务，并借此实现降低外交政策成本的目的。^③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大国的战略收缩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其一，单方面放弃自身承担的某些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减少战略成本支出；其二，与威胁性较少的大国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通过分享好处分摊维持现状的成本；其三，对新兴大国退让而寻求对其野心进行绥靖，通过接受竞争对手崛起而避免冲突。^④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情况下开始推行战略收缩政策。特朗普更是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无助的失败”，^⑤ 想放弃这一战略的观念要素，因而在执政之后便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加速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中抽身而出。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态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缩减海外驻军。大国在过度扩张后战略学习能力的强弱表现在是否可以尽快调整旧有的战略观念并重新部署武装力量。^⑥ 从历史上看，在军事开支高企、战略成本急需削减的情况下，从战争中撤军、减少海外军事部署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主要方式之一。研究显示，美国每向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一名军人，年均开支就要增加 1 至 4 万美元，而一个海外基地的年均维护费用更是高达 5000 万至 2 亿美元。^⑦ 因而，为削减开支，特朗普数次发布撤军命令，裁减各

①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第 39-53、157 页。

②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

③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 4, 2011, pp.7-44.

④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0-191 页。

⑤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7 页。

⑥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2 期，第 4-37 页。

⑦ 陈航辉、索泽：《美海外驻军平添生乱生战风险》，载《解放军报》2020 年 7 月 2 日，第 11 版。

地驻军。2018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撤出大约2000名士兵。^①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再次宣布将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剩余的美军部队,仅在叙南部保留小部分兵力。^②2020年11月,特朗普下令在来年1月撤出2000名驻阿富汗美军和500名驻伊拉克美军。2021年初,特朗普又下令撤出驻扎在索马里的约700名美军士兵。^③此外,特朗普也以防卫分摊比例过低为由,威胁撤出驻扎在盟国的美军。例如特朗普曾以德国未能遵守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应当至少占GDP总额2%的规定为由,威胁将驻德美军数量从当前的5.2万人削减至2.5万人。^④

削减战略承诺。战后,借助强大的国力,美国影响力遍布全球,但这一地位也带来了大量的战略承诺和国际义务。在竞选中,特朗普抱怨美国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承诺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发誓要把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⑤上台以后,特朗普便开启了一系列“退群”行为以践行其竞选承诺。上任第三天,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被他称之为“我们国家潜在灾难”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TPP),^⑥从而葬送了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此后,特朗普政府不断上演“退群”戏码。据统计,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重大的“退群行为”达到十次之多,涉及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重要组织和协定,成为战后“退群”次数最多的一届政府。^⑦此外,特朗普政

① “Defense Department signs executive order to withdraw troops from Syria,” the Hill, December 23th, 2018,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422701-defense-department-signs-executive-order-to-withdraw-troops-from-syria>.(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②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garding Turkey’s Actions in Northeast Syria,”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4th,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regarding-turkeys-actions-northeast-syria/>.(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③ “Trump orders Pentagon to pull nearly all troops from Somalia,” the Hill, December 4th, 2020,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28842-trump-orders-pentagon-to-pull-nearly-all-troops-from-somalia>.(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④ Rebecca Kheel, “Trump confirms plan to cut US troops in Germany to 25,000,” the Hill, June 15th, 2020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02824-trump-confirms-plan-to-cut-us-troops-in-germany-to-25000>.(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⑤ 《特朗普正式踏上竞选总统之路》,2016年7月21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7/21/c_129164761.htm。(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⑥ Rebecca Savransky, “Trump to sign executive order to withdraw from TPP,” the Hill, January 23th, 2017, <https://thehill.com/business-a-lobbying/315598-trump-to-sign-executive-order-on-plan-to-withdraw-from-tpp>.(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⑦ 《迄今为止,美国都退了哪些群?》,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2021年3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896996。(访问时间:2021年3月30日)

府还威胁进一步退出包括北约(NATO)、世界贸易组织(WTO)甚至联合国(UN)在内的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①一系列“退群行为”背后是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减承诺、逃避义务以节省战略成本、缓解国际体系压力的意图。“退群行为”的本质是美国变革国际秩序的一种手段,试图以低成本方式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②但其单边主义的做法严重动摇了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也折损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加强盟友责任分摊。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L. Rothstein)指出,同盟提供“实现目标的具体承诺”,从而增大各方努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③奥巴马时期,为了争取盟国或伙伴的支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适当让步,以促使盟友与伙伴对其战略追随,^④从而实现广泛的“战略、运作和战术”目标、提升美国“面对未来危机和意外事件的能力”。^⑤但特朗普政府宣称:“我们期待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北约、中东还是太平洋地区国家,都能在战略和军事行动中扮演直接和有意义的角色,并且承担它们应该支付的费用。”^⑥因此,特朗普政府数次要求盟友增加军事开支、分摊驻军费用。1991年至2018年,韩国承担的美国驻韩军队防卫分摊费用从1.5亿美元增加到8.5亿美元。^⑦2019年又进一步提高到9.24亿美元,涨幅高达8.2%。^⑧对待北约盟国,特朗普政府也就军费分摊问题频频发难,要求北约国家必须将其国防开支占各自GDP的比例提升到2%,而且还应进一步提高到4%。^⑨在经贸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必

① 《环球网评:那些年,美国退出的“群”》,环球网,2020年7月8日,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3yyRK7IxSiM>。(访问时间:2020年4月7日)

② 凌胜利、王彦飞:《特朗普政府为何“退群”?》,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74-114页。

③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第二版),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63-564、566页。

④ 凌胜利:《“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4期,第1-16、131、137-142页。

⑤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p.9. https://archive.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⑥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Joint Address to Congres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8th,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joint-address-congress/>。(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⑦ Won Gon Park, *A Challenge for the ROK-U.S. Alliance: Defense Cost-Sharing*, July 2013, <https://www.files.ethz.ch/isn/167988/2013080218343716.pdf>。(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⑧ Joe Gould, “Trump says South Korea will pay more for US military protection,” *Defense News*, August 7th, 2019, <https://www.defensenews.com/congress/2019/08/07/trump-says-south-korea-will-pay-more-for-us-military-protection/>。(访问日期:2021年4月7日)

⑨ 《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立即增加防务开支》,新华网,2018年7月12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7/12/c_1123112997.htm。(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须重新审视众多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使之更加公正、平等。2018年3月,美韩就修订自贸协定达成协议。根据新的协定,韩国需要降低美国汽车的准入门槛;同时提高每家美国车企出口韩国汽车的上限;限制韩国对美钢铁出口。^①2018年调整后的《美墨加协定》(USMCA)也被认为带有明显维护美国利益的色彩。^②

(二)矛盾的认知与纠结的日本

从战后历史看,日本对美国的认知呈现一种近乎矛盾的状态:作为战败国和被占领国,日本将战后的经历视为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而也对美国保有些许敌意;但作为在美国庇护下获得高速发展的受益者,日本又对美国怀有难以名状的好感和敬意。^③前一种认知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名节意识。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维护自身名誉是一项近于义务的行为,因而“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稳’”。^④这一种认知在日本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对美协调的外交政策、驻日美军问题等议题也常常成为激起日本民族情绪的因素。后一种认知则更多基于理性的判断和日本外交传统中的“希律王主义”。理性意味着在某种给定情景下采取与特定目标相一致的行为;^⑤而“希律王主义”则希望在维持民族的延续的同时学习外部强大的文明奥秘。^⑥这一认知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响应者较多,战后“吉田路线”就是这一认知的现实映射之一。具象化到政策层面,前者鼓励日本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保持与美国的距离;而后者则要求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各种合作,在美国的统治下学习美国。进而,矛盾的认知和摇摆的政策使得日本在处理与美关系时更多扮演着不情愿或纠结的追随者这一角色,沦入想拥抱美国却担心陷入战争漩涡、想要与美国拉开差距又担心被美国抛弃的矛盾心态。

就现实层面而言,特朗普政府治下“逐渐不可靠”的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对其

① 吴乐珺、陈尚文:《美韩就修订自贸协定达成协议》,人民网,2018年3月29日, <http://korea.people.com.cn/n1/2018/0329/c407882-29896366.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② 具体调整内容可参见李馥伊:《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内容及特点分析》,载《中国经贸导刊》2012年12月(上),第26-28页。

③ 孙承:《论影响日本国家战略的几个因素》,载《日本文论》2020年第1辑,第123-170页。

④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页。

⑤ 参见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2, 1985, pp.293-304.

⑥ 五百旗头真编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的信任,以至于日本媒体公开质疑安倍政府对美追随政策是否能让本国获益。^①在特朗普政府摆出战略收缩姿态特别是提出要更新盟友政策之后,日本政府本就矛盾的心态愈加纠结:一方面担心美国大幅撤出东亚会给日本的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安倍政府也认为美国的举措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强化军备的契机。^②而日本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担忧显然更甚,据《每日新闻》2017年1月22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对特朗普就任后日美关系的走向而言,56%的受访者认为“会比现在差”,29%的人回答“不会变”,回答“会变好”的只有5%。^③应当说,日本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矛盾心态伴随其任期始终。在这一认知之下,日本政府首先并且经常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拉住美国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又能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进一步提升日本的主动性。而日本国民显然也处于矛盾的心态中:在保持对美“亲近感”的同时,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满逐渐发酵。^④

二、日本的政策应对

阿特菲尔德(Michael F. Altfeld)认为,当同盟的边际生产力提高时,国家会倾向于组建联盟。这种情况下,参与其中的国家以部分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获得联盟支持。作为回报,缔约方可以借此减少军备支出,从而增加财富。^⑤美日同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如此。就美日同盟而言,由于两国在实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别,日本在同盟中自主性不足,处处受美国掣肘。詹姆斯·摩罗(James D. Morrow)指出,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所获得自主权,而弱势一方则通过牺牲自主性获得安全。^⑥但在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民族自尊心不断恢复,但经济和政治地位之间的不协调使日本民族自尊心再度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恶性膨胀,^⑦也使日本政界对追求“正常国家”政治目标的意愿更加强烈。同时,对美斗争

① William Sposato, “Japan regrets trusting Trump on trade,” December 7th, 2019, <https://www.the-snews.net/foreign-policy/japan-regrets-trusting-trump-trade>.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7日)

② 梁云祥:《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第34-46页。

③ 张朋辉、李珍等:《日本高调“示爱”特朗普政府 安倍急赴美要谈钓鱼岛》,环球时报,2017年1月23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ZYhx>.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6日)

④ 卢昊:《国际变局下的日美关系及日本的应对》,载《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5期,第56-70、147-148页。

⑤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84, pp.523-544.

⑥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904-933.

⑦ 郝月峰、毕亚娜:《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第14-32页。

来获得更多自主权的愿望也刺激着日本政府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至于日本正在从自我束缚的规则中挣脱出来,寻求恢复自 1945 年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积极外交政策。^①

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日本的外交空间获得扩展,成为“正常国家”和寻求对美自主的愿望也逐渐滋长。因而,日本展现出较为积极的外交姿态,其外交政策也逐渐呈现出协调、舒张等新特征。在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下,日本也希望作为“第三方力量”,在谨慎维持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同时,有限引导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②以防中美局势滑向危险的边缘。虽则如此,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美协调的外交基轴之上,因而也难以跳脱战后确立的战略框架。

(一) 追随:加深、拓宽与美国合作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外交战略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在大战略上,日本基本采取了追随美国的路线。面对新局势,安倍政府也延续了这个趋势,“尽管情况如此艰难”,日本仍然着力于“强化日美同盟”。^③ 2017 年 1 月 20 日,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发表演讲,强调日本将与特朗普政府构建密切关系。^④ 2 月,美日举行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首脑会晤,双方确认美日之间“不可动摇”的同盟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繁荣和自由的基石”。^⑤ 此后,双方多次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在 2019 年 8 月美日首脑会谈中,美日两国再次确认了美日同盟比以往更加强大这一认识,一致同意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毫不动摇的美日同盟。仅仅一个月后,双方又一次就这一立场表态。^⑥ 此外,由于美国的收缩,日本开始在印太战略、防务、新兴领域等方面展现出更加主动的姿态,与美国合作范围也不断扩大。

① Kenneth B. Pyle, “Japan’s Return to Great Power Politics: Abe’s Restoration” *Asia Policy*, 2018, Vol. 13, No. 2, 2018, pp.69-90.

② 高兰、赵丽娟:《中美夹缝中的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分析》,载《日本学刊》2020 年第 6 期,第 22-45 页。

③ 細谷雄一「トランプ大統領は日米同盟を破壊するのか」,2018 年 7 月 24 日, <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423/>。(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27 日)

④ 《日本外相发表外交演讲 愿与特朗普政府构建密切关系》,中国新闻网,2017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1-20/8130837.s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5 月 26 日)

⑤ “Joint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0,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president-donald-j-trump-prime-minister-shinzo-abe/>。(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⑥ *Defense of Japan 2020*,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EN_Full.pdf。(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1、双边防务合作

在安全领域,日本虽时常表现一定的自主性,但基本上“停止思考”、惟美国是从。^①面对特朗普要求日本提高防务开支的主张,安倍政府予以积极回应。在2017年3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表示,鉴于亚太地区当前的安全环境,日本需要确保充足的预算以维持有效的国防。同时他也认为,将国防开支控制在GDP的1%以下的目标不再必要。^②据统计,自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防务开支就出现连续上涨势头,2020财年的防务预算更是达到创纪录的5.3133万亿日元。^③此外,双方还通过一系列合作加强协同作战能力。2017年8月17日,美日举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首次“2+2”会谈,除了重申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外,双方承诺在ISR(信息收集,警报监视和侦察)、人员培训和演习、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构建和设施共享等领域扩大合作。^④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美日多次举行防长会议和首脑会谈,双方就同盟关系、朝鲜问题及地区局势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同意加强安全防务协作及多边合作。^⑤2020年8月29日,美日两国国防部长在关岛会晤,同意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加强全面导弹防空能力和机载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应对周边国家军事活动的日益活跃和军事技术的进步。^⑥

2、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

2017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首提印太概念,宣布就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日本达成一致,^⑦呼吁共同推动“印太战略”。201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认定“印太战略”对于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和确保美国主导地位

① 吴寄南:《日本“大国梦”的虚与实——20实际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与教训》,载《日本评论》2020年第1辑,第1-38页。

② “Japan’s Defense Budget and the 1% Limit,” Nippon, May 18th, 2018, <https://www.nippon.com/en/features/h00196/>. (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③ 姜俏梅:《日本财政健全化目标恐遥遥无期》,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12月25日,A03版。

④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本防衛省、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623291/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2017/08/js_17_j.pdf。(访问时间:2021年3月30日)

⑤ 『平成30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8/w2018_00.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7日)

⑥ 「日米防衛相会談の概要」、日本防衛省、2020年8月29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2020/0829_usa-j.html。(访问时间:2021年3月30日)

⑦ 吴怀中:《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13-21、62-63页。

的必要性,要求美国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①12月,国会又祭出《亚洲和平倡议法案》,提出在2019–2023财年拨款15亿美元经费用于增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利益、巩固其盟友防卫能力等目的。^②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出台《印太战略报告》,认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现有盟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将继续为美国提供红利。此外,报告还寻求与印度实现“主要防卫伙伴关系”,加强与斯里兰卡、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安全协作。^③自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以来,美国主导顶层设计,而日本则全面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思维,体现出传统的“美主日从”的互动局面。^④为呼应美国战略,日本提出与美国一道主导与相关国家的合作,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⑤在多边层面,显著的案例莫过于日本积极参与“马拉巴尔演习”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至于蒂勒森盛赞美国、印度和日本三国海军演习首次在印度洋展示了他们的力量,“为三个民主国家的合力提供了例证”。^⑥2020年澳大利亚加入之后,该演习更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小北约”的雏形。

3、新兴领域合作

在太空战略层面,自2016年以来,日本自卫队每年都参与由美国战略司令部(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组织的太空态势感知演习,有关人员也在美国科罗拉多的空军基地接受培训。在美国提出建立太空军之后不久,日本便迅速跟进。2018年8月,安倍在出席“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时强调网络及太空等新领域的优势对于日本的防卫是“生死攸

① “H.R.5515–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text?q=%7B%22search%22%3A%22John+S+McCain+National+Defense+Authorization+Act%22%7D&r=5&s=5>. (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②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S.2736),”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736>. (访问时间:2020年4月11日)

③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p.21,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DoD-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_201906.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④ 高兰:《印太战略的走向及其对美日同盟的影响——双重模糊、双重确保与双重牵制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5期,第36–47页。

⑤ 高兰:《多边安全合作视野下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动因与影响》,载《日本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8–16页。

⑥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An Address by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October 18, 201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efining-our-relationship-india-next-century-address-us-secretary-state-rex-tillerson>. (访问时间:2021年1月10日)

关的”。^① 2018 年的新防卫大纲更是提出要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包括情报搜集、通信、定位等在内的各项能力。^② 2019 年 12 月,在美国建立太空军的同时,安倍内阁也批准了总计 506 亿日元的预算计划,用于组建宇宙作战队等太空项目。在美太空军军旗亮相后不久,日本也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宣布正式建立宇宙作战队。此后,双方又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 2023 年和 2024 年在种子岛航天中心发射两枚由美方提供的有效载荷,以增进两国的空间合作。^③ 在网络安全层面,2019 年美日防长和外交“2+2”安全磋商会议上,美日双方认识到“恶意网络活动对各自的安全和繁荣”形成了愈加严重的威胁,认同“加强网络问题合作”的必要性。两国首次确认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可被视为武装攻击而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此外,两国表示将以双边和多边方式在本地区开展联合演习、港口停靠等演练活动,加强海上执法等领域的能力建设。^④ 当年 12 月,美日在“山樱”年度例行演习中便着重操演双方共同应对城市游击活动、网络、电磁波等领域攻击的流程。^⑤

(二)协调:修补、提升与中国关系

日本对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认知是影响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变化的首要因素。^⑥ 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构想下,美国加深了与日本的高层对话,通过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明确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等措施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种种举措下,美日关系保持高位运行。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对日理念及政策上区别于前任政府,出台了一些几乎不顾及日本承受限度与心理感受的新政策。^⑦ 受到“特朗普冲击”的影响,安倍政府开始检视其对华政策,在战术层面调整对华政策,寻求与中国在外交、安全

① 徐万胜、姬世伦:《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1 期,第 34-46、132-133 页。

② 「平成 31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日本防衛省、2018 年 12 月 18 日、18 頁、<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英文版参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_e.pdf, p.19。(访问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

③ 《日本宇宙作战队训练画面曝光》,人民网,2020 年 12 月 2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0/1225/c10111-31979159.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2 日)

④ 《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议,首次确认日本遭网络攻击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文汇报,2019 年 4 月 21 日,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914880192_7222c0c002000k9a1.html?from=news&subch=onews。(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

⑤ 《日美举行“山樱”指挥所联合演习 将于 16 日结束》,新华网,2019 年 12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12/09/c_1210388547.htm。(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⑥ 张云:《日本对华认知与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0 期,第 13-21 页。

⑦ 陈友骏:《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载《日本学刊》2019 年第 6 期,第 52-74 页。

和经济领域开展局部合作。^①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日本展现出的积极姿态和意愿,为缓和与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回归正轨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中方也对日方行动予以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善意举动。2018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上一年度两国通过积极的高层往来,关系改善势头显著增强。蓝皮书还提出,中日两国要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上,从大局观出发,持续推进双方各领域和水平的对话与合作,稳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②2018年,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双方实现领导人互访,日本也宣布将继续推动双方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③之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提升,2019年更被认为是面向“日中新时代”、将双边关系推向新阶段的一年。^④2019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也对中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日益增强,不仅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工作,还主动参与各种人道主义和救灾工作。白皮书同时认为,中国将在应对地区和全球议题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⑤

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淡漠的态度不同,日本第一时间就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1月26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疫情事宜与王毅外长通电话,表示愿向中方全力支持与帮助。^⑥1月29日,日本政府紧急向中国运送第一批援助物资,包括口罩约1.5万个、手套5万双、防护眼镜8千副、医用外科口罩2千个、防护服套装50套。^⑦2月7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⑧2月10日,二

① 张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86-106、159页。

② 『平成30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8)』、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index.html>。(访问日期:2021年4月11日)

③ 『令和元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9)』、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html/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④ 『令和2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20)』、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html/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⑤ 『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9/w2019_00.html。(访问时间:2021年1月5日)

⑥ 《日中外长电话会谈(2020年1月26日)》,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020年1月28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356_00002.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⑦ 《日本政府向中方提供支援物资,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020年1月29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00_000356_00003.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⑧ 《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表示愿举全国之力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新华网,2020年2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08/c_1125544600.htm?ivk_sa=1023197a。(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阶俊博宣布从每名该党议员的年度开支中扣除 5000 日元，^① 筹措总共约 200 万日元以支援中国抗疫。此后，日本政府、地方及民间团体不断向中国提供物资、资金援助。得益于日本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帮助，中国民众对日本好感度不断上升，达到 45% 的高点。^②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不断就疫情和香港问题指责中国的舆论表态，安倍政府也与之保持距离。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发表联合声明，污蔑香港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一国两制’框架、限制香港民众权利与自由、被用于铲除异见”。^③ 面对美国的施压，日本政府也不愿在香港问题上对美亦步亦趋、采取同样强硬的态度。可以说两国关系虽然遭受疫情和香港问题的冲击，但持续改善双边关系的政治共识没有发生改变，继续合作的意愿与趋势依然强劲。^④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西方世界对华态度不断恶化。日本也不得不采取追随态度，屡次以疫情、香港问题、人权、军费不透明等指责中国，这也让本已升温的中日关系出现逆潮。这也说明，如果日本不彻底扭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中日关系无法迎来真正的改善。诚如郑毅教授强调的那样，如果日本政治家依然将中国视为“一个要差异化的巨大他者存在”的话，横亘在中日之间的“那条河”将依然存在。^⑤

（三）舒张：介入国际合作，填补战略空间

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开始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框架，更关注于共同塑造地区乃至全球秩序。^⑥ 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其兑现亚太盟友战略承诺要求的能力也逐渐减退。这一承诺难题也导致美国盟友的自主性开始上升。^⑦ 故而，日本寻求突破同盟体制束缚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等更是多次提及“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地缘战略，以

① 「中国への支援金『有志の議員』で二階幹事長」、テレビ朝日、2020 年 2 月 15 日、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176343.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② 《新民环球 | 让中日民间好感度同步上升》，大众网，2020 年 12 月 10 日，https://www.dzwww.com/xinwen/guojixinwen/202012/t20201210_20018353.htm。（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③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美澳加四国外长发表涉港联合声明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使馆，2020 年 1 月 11 日，<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chn/sgryr/t1845506.htm>。（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④ 胡令远、李超：《新冠疫情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管窥》，载《日本问题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7-24 页。

⑤ 苍丽影：《吉田茂政治理念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郑毅教授〈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观研究〉》，载《大连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143-144 页。

⑥ 衣昭杰：《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 页。

⑦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3 期，第 4-28、156 页。

求将“更广阔的亚洲”发展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庞大网络。^①第二次担任首相之后,安倍在外交战略上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理念,意图加强与美国、西方国家及区域盟友的关系。^②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在引发了国际社会持续不安之余,也进一步扩展了日本外交的发挥空间。以至于第二届安倍内阁被视为战后首届敢于或善于偏离美国的宏观轨道束缚、以“日本优先”为口号大胆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内阁。^③

在经贸方面,日本积极参与乃至领导区域合作框架。在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联合其余 10 国继续推进这一自由贸易协定。2017 年 11 月,除美国外的其余 11 个 TPP 发起国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并决定将其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拉拢其他国家加入 CPTPP。例如 2020 年 10 月 23 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和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签署《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时表示,日本将“坚定决心”支持英国早日加入 CPTPP。茂木同时承诺,如果正式启动加入程序,日本将向英国提供 CPTPP 下的日本关税表等相关文件。^④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倾向还表现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上。2020 年 11 月 15 日,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 15 个国家正式签署 RCEP 协议。面对印度的缺席,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日本将继续发挥主导性作用,促使印度重返该协议。^⑤此外,2017 年以来,日本逐渐转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态度,转而希望通过这一机制发挥更大作用。安倍更是公开宣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连接不同地域的潜力”,愿意同中方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合作。^⑥

①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H.E.Mr.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ugust 22, 2007,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② 刘江永:《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0 年第 3 期,第 37-43 页。

③ 吴怀中:《中日关系:改善回暖之下能否行稳致远?》,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2019)——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7-223 页。

④ 「日本政府、英国の CPTPP 早期加入を強く支持」、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0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0/10/9bdf2b26802a9eea.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⑤ 「RCEP 15 か国が協定に署名 世界人口の約 3 割 巨大自由貿易圏に」、NHK、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01115/k10012713351000.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3 日)

⑥ 张利华、胡芳欣:《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变及其机遇》,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 年第 3 期,第 86-94 页。

安全方面,安倍政府将其作为“摆脱战后体制”的重点试验田,不断进行突破,^①寻求扩大自主性。具体而言,日本在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的同时,继续加速、加强日本的自身防卫能力建设,践行“积极和平主义”,并将其视为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第一基石。^②2018年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认为,作为独立国家,日本“政府的第一要义便是守护国民生命、健康、财产及国家领土、领海、领空”,并强调要通过“日本主体性和自主性来履行上述责任。”^③据悉,这是防卫大纲中首次强调要强化防卫力量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此外,日本也通过积极发展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安全关系以推动防卫自主性。2020年11月,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互惠准入协定》(RAA),这一协定成为日本自1960年与美国签订《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对外达成的第一个深度防务协定,也是除美国之外的亚太国家之间的第一个类似防务协定。^④

总之,在新局势下,日本并非全然致力于跟随美国的脚步。相反,安倍政府试图寻求一种更为复杂和平衡的外交政策,以期在“位于美中之间以及经济与国家安全相克的雷区”谨慎通行,进而寻求“中、美、日三边的有利地位”,放大自身作用、平衡三角态势,借势谋取大国地位。^⑤

三、日本政策面临的挑战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政策受体系压力的决定性影响。对于日本而言,“日美、日中关系构成日本外交的两大坐标轴”,日本需要“在美中的夹缝中进行高难度的技巧搭配,以避免被美中力量关系的变动所吞没”。^⑥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收缩,日本政府依托日美同盟积极开展的带有自主色彩的外交战略正是这一认知的具体体现。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分析的那样,对日本而言,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寻求

① 孟晓旭:《竞争时代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战略构建及其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第46-75、158-159页。

② 韦宗友:《“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第84-98页。

③ 「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日本防衛省、2018年12月18日、18頁、<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英文版参见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_e.pdf, p.19。(访问时间:2020年12月30日)

④ 《日澳基本达成“历史性防卫协定”,外媒:剑指中国》,观察者网,2020年11月18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668951269514785&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1年4月12日)

⑤ 吴怀中:《中日关系:改善回暖之下能否行稳致远?》,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2019)——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第207-223页。

⑥ 杨伯江:《世界大变局:日本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载《南开日本研究》2020年第一辑,第1-13页。

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的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同盟”。^①就其效果而言,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升了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退群”所带来的阵痛。但这一战略也因为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而面临结构性制约,依附霸权与固执的假想敌偏见让日本丧失了战略独立的可能,^②也压缩了其理性选择的余地。

(一)美日关系走低,同盟面临危机

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带有一定自主性色彩,但都依托于美日同盟这一基础。特朗普政府在战略收缩之际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多贡献,甚至不惜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就逻辑而言,这一困境可以通过增加同盟成本加以掩盖或缓解。事实上,日本确实通过增加军费、加强与美国合作等方式应对这一困境,舒缓其被抛却与牵连的担忧。然而,长期的成本投入会将同盟抛弃与牵连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为投入的成本越高,被抛弃与牵连时承担的代价也就越高。^③

在驻军费用分摊问题上,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声称“美国在保护欧洲、亚洲盟友安全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必须为此付费”,不然就应该“让他们自生自灭”。^④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向盟友索要军费,对日本自然也概莫能外。根据日媒公布的数据,自安倍 2012 年担任首相以来,日本每年的防务开支的都出现较大涨幅。2015 年日美商定,今后五年内由日方负担驻日美军经费预算额为 9465 亿日元(约合 500 亿元人民币),较上个五年增加 133 亿日元。^⑤而就军费分担情况而言,驻日美军军费最近几年的分摊比例大致为 1:3,也就是日本提供大约 75% 的驻军费用。^⑥在美国世界各地的盟友中,无论是费用分担的比例还是数额的绝对值,日本都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仍不满足,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访日期间甚至提出在现有水平上将分摊费用增加五倍的要求。这一要求遭到日方官员的断然回

①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49 页。

② 卢昊:《日本外交:虽四面出击,却难改“附美”本色》,载《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3 期,第 26-27 页。

③ 张景全、刘丽莉:《成本与困境:同盟理论的新探索》,载《东北亚论坛》2016 年第 2 期,第 11-22 页。

④ 倪峰:《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考察——兼论中美日三国互动及地区影响》,载《日本学刊》2017 年第 5 期,第 130-150 页。

⑤ 潘寅茹:《60 年美日同盟要生变? 驻军费用、汽车关税都是棘手挑战》,第一财经,2020 年 1 月 20 日, <https://www.yicai.com/news/100475374.html>。(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⑥ 《不断要求盟国为驻军埋单 揭秘美国天价“保护费”用在哪》,环球网,2019 年 11 月 21 日, <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7RMagFXKeDS>。(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绝,让美日关系再生龃龉。^①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对日施压,点名批评日本,称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的增长幅度已经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②要求日本削减进口关税。日本被迫作出大幅让步,基本遵循 TPP 协议承诺的内容框架与美签署贸易协议,扩大农产品及部分工业制品市场开放程度。但美国却决口不提实现已经答应的撤销对日汽车等工业品关税的事宜。^③这一协议虽然被特朗普称赞为“将创造无数的就业机会,扩大投资和商业,大幅减少我们的贸易逆差”,^④但却对日本相关产业造成严重影响。因而,该协议也被认为是日本的“完败”和单方面让步。^⑤此外,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引发的民众抗议也让美日关系矛盾丛生。

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对美日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长期处于“同盟陷阱”或“被抛弃”这一单向同盟困境中的日本更加疑虑重重。^⑥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美国优先”理念招致日本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以至于只有 2% 的日本民众表示喜欢特朗普,而喜欢其前任奥巴马的比例是 54%。^⑦2019 年 5 月特朗普访日期间,日本甚至出现大规模抗议事件。^⑧美日关系的走低让这一“最为牢固”的同盟面临危机,也动摇了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基轴。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既没有赢得日本对美国精明的尊重,更未能使东京相信美国的联盟承诺。^⑨

① “Ignoring facts, Trump driven to increase Japan’s pay to U.S. forces,” Asahi Shimbun, August 1st, 2019, <http://www.asahi.com/ajw/articles/AJ201908010053.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3 日)

② “Trade Deficit with Mexico and Japan Continues to Grow at Unsustainable Rat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y 24th, 2017,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7/05/trade-deficit-mexico-and-japan-continues-grow-unsustainable-rate>. (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

③ 《日美正式签署新贸易协定》,人民网,2019 年 10 月 10 日,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9/1010/c35421-31390888.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④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Signing of the U.S.-Japan Trade Agreement and 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7th, 2019,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signing-u-s-japan-trade-agreement-u-s-japan-digital-trade-agreement/>. (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1 日)

⑤ 张玉来:《日美贸易谈判解析——一场“迷你交易”难解结构性困境》,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2021)——改元之年的日本与“新时代中日关系”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91-108页。

⑥ 关于美日同盟中日本的处境,参见焦世新:《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96-125,7 页。

⑦ 《调查:七成日本人对美国有好感,但喜欢特朗普的仅占 2%》,日本东方新闻,2020 年 5 月 19 日, http://www.livejapan.cn/news/news_jp/20200519/27470.html. (访问时间:2021 年 4 月 11 日)

⑧ 王广涛:《G20 前日本为何现反美情绪》,载《环球时报》2019 年 6 月 26 日,第 15 版。

⑨ 韦宗友:《“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84-98 页。

(二)中美竞争加剧,日本发挥空间面临萎缩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在中美两国之间扮演第三方力量的角色,很大程度可以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所带来的平稳局面。然而这一局面在特朗普时期被打破。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俄两国对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构成挑战,并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① 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更是认定“中国将继续推行军事现代化计划,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在未来取代美国实现全球优势”。^② 在此基础上,5月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更是指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首要任务。法案强调,“美国需要整合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及军事等多个国家力量要素,保护和加强国家安全。”^③ 在重拾冷战思维之余,特朗普政府甚至人为制造矛盾,将双方的经济纠纷上升为中国对美国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挑战。

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对华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已经对美国造成包括经济、价值观和安全在内的全面挑战。方针指出,美国政府将持续向中国施加压力,必要时将同盟友和伙伴国合作,抵制中国的威胁,维护美国的利益。^④ 2020年7月,蓬佩奥(Mike Pompeo)甚至抛出所谓的“新冷战宣言”,在诋毁中国共产党之余还宣布“盲目接触中国的旧模式已经失败”。^⑤ 这一系列举动表明中美关系由竞争合作并存态势转入竞争乃至对抗状态。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影响着两国间总体关系的发展,也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显著影响。^⑥ 随着中美竞争态势的进一步加剧,日本战略空间遭遇挤压,再次面临“二选一”问题,在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政策也迎来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美国意欲斩断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再升级的对华制裁措施让日本对华出口举步维艰。根据最新披露的《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美国印太战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4日)

③ “Sec 1261 of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H.R.5515),” <https://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232/PLAW-115publ232.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11日)

④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访问时间:2021年1月2日)

⑤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 2020,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31日)

⑥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159页。

略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该地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①在美国的高压态势和战略收缩背景下，中国作为日本“防范对象”与经济伙伴的同一性使得这两种角色双向强化。这促使日本陷入经济与安全的抉择困境之中，也让作为日本外交和安全基础的日美同盟面临考验。

四、新政府的新趋向与老问题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相对优势地位逐渐面临更多挑战，但背负的责任却不断增加。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继续战略收缩路线，试图通过削减海外驻军、挣脱国际义务、加强盟友责任分摊等方式卸下“重担”。在此背景下，日本的自主性出现增长，在维持美日同盟基轴的基础上扩展美日合作、修补中日关系、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商人思维和独特的人格特点让其决策团队在国家层面上缺乏利益竞逐的战略性和目的性。^②因而，特朗普政府不断对盟友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其让渡部分利益以支持美国的霸权。异质的美国总统对美国外交传统的背离致使日本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③也让美日同盟面临挑战。2020至2021年，日美两国先后经历了领导的更迭与政府的重组。随着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的上台，美国的联盟政策重回常轨，2021年3月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要“重新激活联盟和伙伴体系并使之现代化”。^④在美日同盟上，拜登上任以来频频出手，无论是在美日“2+2”会谈、首脑会谈还是在各个层面的双边会晤上都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因此，特朗普时期美日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观。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举行新政府间的第一次美日首脑会议，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以及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国家等的合作，并再次重申《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⑤期间，双方还签署了三份联合声明，重申美日同盟的紧密性及其

①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2t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访问时间:2021年1月14日)

② 王一鸣、时殷弘：《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98-127页。

③ 細谷雄一「トランプ大統領は日米同盟を破壊するのか」、2018年7月24日、<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423/>。(访问时间:2021年5月27日)

④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1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7日)

⑤ 「日米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21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51.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26日)

对新时代的重要意义,^①号召两国在5G、研发、数字经济、供应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②呼吁两国加强在气候问题、去碳化及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③虽则如此,日本外交空间仍因中美竞争和中日、美日关系的错位发展而面临结构和双边层面的制约。

就结构层面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的局面已难以逆转。拜登上台之后虽然取消了前任政府的部分对华极端措施、恢复了一些对华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但没有改变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基调,因而双边关系的改善将是渐进的、有限的甚至是艰难的。^④在就职演说中,拜登强调美国能够再次成为世界上“向善的主导力量”。^⑤在拜登政府的认知中,全球范围内权力分布的改变正在产生新的威胁,而中国是美国首要的竞争对手,因为它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并构成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⑥《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更是将中国认定为“与美国几乎实力相当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盟友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及价值相悖。^⑦因而,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则成为“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⑧202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公开声称:“接触的年代已经结束”,“美国正进入与中国的激烈竞争时期……”^⑨在美国战略的裹挟下,日本不得不做出回应。在2021年3月份的美日“2+2”会谈期间,两国防长一致认为中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秩序,进而挑战了美日同盟与国际社会。因此,

①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16, 2021,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18.pdf>.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6日)

② “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7722.pdf>.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6日)

③ “Japan-U.S. Climate Partnership on Ambition, Decarbonization, and Clean Energ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78075.pdf>.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6日)

④ 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34-48、131页。

⑤ “Inaugural Address by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Jan 20, 2021,”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1/20/inaugural-address-by-president-joseph-r-biden-jr/>.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2日)

⑥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p.7-8,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2日)

⑦ “S. 1169, 117th Con., 1st Ses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7s1169is/pdf/BILLS-117s1169is.pdf>. (访问时间:2021年4月22日)

⑧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rd,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访问时间:2021年5月28日)

⑨ 林日、青木、张晗、杨升、胡馨予、任重:《美“亚洲沙皇”谈中国声称“接触时期结束”,中方回应》,环球网,2021年5月28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31bmhlKJ92>. (访问时间:2021年6月2日)

两国应当采取应对措施回应这种挑战。^①在七国集团(G7)外交和发展部长会议上,日本也附和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就新疆和香港局势发表错误言论,^②甚至意欲在台海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③

就双边层面看,美日关系虽“转危为安”,但仍龃龉不断;而中日关系虽有所降温,但仍极具韧性。就美日而言,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军费分摊问题。美国国内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日方负担额度的意见较多,而日本国内弥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拜登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金额势在必行;^④其二,奥运会、旅行等问题。在菅义伟访美期间,拜登并未就是否出席东京奥运会作出明确表态。当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会保证派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时,菅义伟也没有给出直接回应。^⑤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将对日旅行警告提升至最高的4级,建议美国民众不要前往日本,^⑥此举被认为隐含对东京奥运会的担忧。就中日而言,双边关系虽然较之疫情初期有所下滑,但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复苏,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对华依赖度进一步提升。日本财务省的初步报告显示,2020年度日本实现贸易顺差1.307万亿日元,^⑦对华出口额达到1.63万亿日元,占日本总出口额的22.9%,同比增长37.2%。^⑧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庞大的中国市场,日本可能再度陷入贸易逆差。2020年度日本GDP较上一年度下滑4.6%。^⑨在经济下滑和疫情反复的情况下,对华经济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安全和政治方面,日本仍然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在安全上倚靠美国的同时还借所谓的“中国威胁”强化对美自主政

① 「日米防衛相会談の概要」、日本防衛省、2021年3月16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2021/0316a_usa-j.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22日)

② 「G7 外務・開発大臣会合」、日本防衛省、2021年5月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pc/page6_000558.html。(访问时间:2021年6月1日)

③ 「2021年5月 日本の出来事」、Nippon、2021年6月1日、<https://www.nippon.com/ja/news/q202105/>。(访问时间:2021年6月1日)

④ 吕耀东:《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25-30页。

⑤ 张梅、张伯玉:《国会补缺败选,菅义伟又面临考验》,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0期,第26-27页。

⑥ 参见美国国务院官网:<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traveladvisories/traveladvisories/japan-travel-advisory.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27日)

⑦ 《日本3年来首次实现年度贸易顺差》,2021年4月20日,人民网日本频道,<http://cjkeizai.j.people.com.cn/n1/2021/0420/c368505-32082997.html>。(访问时间:2021年6月1日)

⑧ 《这个国家的出口创逾3年新高!对华出口占比同时达到10年最高点》,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2021年4月22日,<http://www.ccpitzj.gov.cn/article/19586.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28日)

⑨ 《日本2020年度GDP下降4.6%创二战后最大降幅》,人民网日本频道,2021年5月18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1/0518/c35421-32106575.html>。(访问时间:2021年6月1日)

策。日本防卫省防务研究所的报告就指出,为了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在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之余,日本也要“谋求自主充实防卫态势”。^①

综上,在美日两国政府轮替之后,尽管双边关系呈现出企稳回升的发展态势,且两国与亚太地区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也在增加,但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存在,日本外交政策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仍然没有较大改观,甚至其外交空间呈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中日经济联系的持续深化让日本在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不得不频频西望。因为对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难免会引发双重强化、对等极化的风险,进而导致日本外交战略的撕裂,这显然也是菅义伟政府不愿看到的。在这一趋势未逆转的情况下,日本更可能在日美同盟的“基轴”上更积极地推进外交战略多元化,主动介入并影响地区以至全球秩序的重构。^②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日本可能表现出比以往更强的平衡感与务实态度,维持协调的对华政策基调,在强调牵制的同时强化协调、合作的面向。

五、结论

“崛起困境”理论指出,崛起国和守成国实力越接近,崛起国受到的来自守成国的压力就越大,守成国利用现行秩序赋予的制度优势和领导权威压制崛起国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增长的意愿也会逐渐提升。^③疫情之下,中国采取了果断的防疫措施,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与美国形成鲜明反差。这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使中美在经贸领域出现回暖的痕迹,也无法逆转双方在安全领域的紧张态势,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全面竞争和持续恶化的通道。^④中美对抗的持续与烈化也让日本赖以发挥作用的腾挪空间不断萎缩。冷战中,美日同盟关系之所以能颠而不破的关键在于其安全基础,但当今世界国家间关系复杂且相互依赖加深,国家间斗争方式逐渐从战争转变为获取战略主动的相对竞争优势。^⑤这一转变使得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不再突出,也使得美日同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共同利

① 日本防卫省防务研究所:《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21: 新时代的中国军事战略(中文版)》,第 66 页,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CN_web_2021_A01.pdf。(访问时间:2021 年 6 月 1 日)

② 卢昊:《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 年第 5 期,第 26-30 页。

③ 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2 期,第 21-37 页,第 155-156 页。

④ 齐皓、王侯嘉遇、宰英祺:《美国施压下的中美贸易战特征:与入世谈判的对比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55-161 页。

⑤ 主父笑飞:《国家安全竞争战略探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32-51 页、151-152 页。

益和路径依赖的存在,美日同盟仍然稳固,乃至会出现进一步强化的可能,但日本显然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①明治以来对华优越感的“梦醒时分”也比预想的更快到来。^②从长期来看,同盟的内聚性最终“取决于内外压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盟国应得到的利益与应付责任的比例”。^③追随行为的发生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安全,更在于获取利益的诉求。^④与战后初期美国单方面为日本提供保护的同盟形态不同,当下的日美同盟更强调日本捐献资金以支持美国的全球战略。^⑤而当维系美日同盟所需的边际成本超过其边际收益之后,日本在“二择一”中倒向中国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大。正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的义务或未展现出重大的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日关系并非中美关系的纯粹从属变量。^⑦因而,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仔细分辨日本外交中的美国因素和自主意识,因势利导,维持稳定、连贯的对日政策,尤其是在中日双边关系面临美国因素干扰时;而在处理分歧和矛盾时,我们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坚守底线和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尽量避免外交场合的情绪化表达。此外,两国天然的文化亲缘性也能成为发展对日关系的助推剂,因而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时,我们应当挖掘中日文化中的共通因素,发挥“东方智慧”。但这一姿态并不意味着隐忍与退让,在钓鱼岛主权、核废水倾倒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及牵扯人类共同安全的问题上,我国应当坚守立场,采取坚决斗争态度。

(秦渝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津上俊哉:《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李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序论,第21页。

③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第二版),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564页。

④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72-107.

⑤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0.

⑥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全球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⑦ 张晓磊:《从平成到令和:日本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21期,第62-63页。

浅论新冠疫情对日本国内政治及 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晓燕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新冠疫情在日本爆发后 2021 年年初政府出台并付诸实行的多项有关遏制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分析出发,阐述疫情对日本国内政治以及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日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之所以不得人心,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政策本身,而在于日本民众对政策要求的“高标准”:既要求政策顺应“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价值观,又要求政策制定处处以美国为标准。面对高需求的民众,不仅执政党表现得束手无策,在野党也迟迟未能推出有效的代替政策,因此有理由预测在将于 2021 年举行的“总选举”中,即便自民党无法获得“稳定多数”的议席,在野党中也不太可能出现取而代之的新兴政治势力。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两国间曾短暂出现过面对灾害同舟共济的小阳春,但整体维持近年来的低走态势。疫情对中日两国关系虽然没有产生本质性影响,但进入抗疫平稳阶段以后中国政府向世界呈现了一党执政体制的高效性,成功获得了日本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的肯定,对扭转中日两国关系的下沉局面起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积极作用。其他国家的疫情持续时间越长,中国式抗疫的优越性越是明显。疫情在挑战各国政府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及其他国家重新评价中国政治运行机制提供了良好契机。

关键词 新冠疫情 2021 年日本“总选举” 联立政权 一党执政优越性

日本放送协会(NHK)公开的数据显示,仅 2021 年 1 月 21 日一日,日本全国新冠病毒新增感染人数就达到 5650 人,感染总人数攀升至 351969 人,死者人数达到 4873 人。^①与日均感染人数高达数万的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感染状况在发达国家里还不算太严重,然而这并

① 「特設サイト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NHK、<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data-all/>。

不代表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比欧美国家更有效,或者日本政府面临的抗疫压力更小。本文将从疫情在日本爆发开始到 2021 年 1 月末为止,日本政府出台并付诸实行的多项有关遏制疫情、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分析出发,阐述日本疫情对国内政治与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有关疫情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笔者认为自民党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之所以不得人心,问题并不在政策本身,而在于日本民众对政策的“高要求”:既要求政策顺应“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价值观,又要求政策制定事无巨细地向美国看齐。事实上,面对怨声载道的民众,不仅执政党表现得有些束手无策,在野党也迟迟未能推出反映民意的有效代替政策。

在疫情给日本国内政治带去混乱的同时,它也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了独特的考验。2020 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原定对日进行国事访问,日本也本会迎来东京奥运会,本应有更多中国游客赴日观光考察,官民交流双双得到深化,但疫情的突然爆发以及失控蔓延使得两国间的交流水平再次降至邦交恢复以后的历史低点。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两国关系短暂出现过面对灾害同舟共济的小阳春,但整体维持近年来的低走态势,传统短板如钓鱼岛问题、人权问题、意识形态分歧仍制约着两国关系的改善。与此同时,进入抗疫平稳阶段以后,中国政府向世界呈现了一党执政体制的高效性,成功获得了日本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的肯定,对扭转中日两国关系的下沉局面起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积极作用。展望未来两国关系之际,必须注意到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并没有放弃“经济优先”的外交策略,日本民众虽然对中国政府初期的抗疫对策存有误解与不满,但在华日本企业得益于中国抗疫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日本人以更柔韧务实的态度处理和看待中日两国关系。中日两国如何跨域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着眼于构建更加繁荣、稳定、和平的东亚地区将会是两国政府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疫情对日本国内政治影响

(一)一波三折的“特别定额给付金”

安倍晋三前首相,从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被命名为内阁总理大臣开始到 2020 年 8 月辞职为止,连续在职天数达到 2799 天,打破其祖父之弟,佐藤荣作前首相的记录。除了在任记录,由其姓氏命名的“安倍经济学”(日语:アベノミクス,英语:Abenomics)不但作为新生经济

学语受到全球经济界关注,还曾获得 2013 年日本“新语流行语大赏”。^① 安倍本人对“安倍经济学”也颇得意,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成长功不可没。^② 国内外有关“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③ 日本民众对优先大企业利益的“安倍经济学”也颇多微词,但整体呈宽容接纳态度。相比之下,2020 年同样由安倍姓氏命名的“安倍口罩”(日语:アベノマスク,英语:Abenomask)便没有那样幸运了。

2020 年 2 月 20 日,日本国内感染人数还停留在两位数(94 人),而一个月后的 3 月 20 日,感染人数以突破一千(1015 人)。日本各大城市开始出现口罩短缺现象,对此安倍前首相在 4 月 1 日举行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提出将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日本邮政向全日本 5000 万余户家庭,每户分发两枚可以洗涤反复使用的口罩的决定。此决定一经公开,日本社会一片哗然,一时间网络新闻评论、各种社交媒体上充斥了民众对“安倍口罩”的嘲讽与揶揄。彭博新闻以“从安倍经济学到安倍口罩:日本口罩派送计划遭遇嘲讽”为题,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日本人对“安倍口罩”的不满。^④ 由于决定公开当天为西方传统的“愚人节”,美国福克斯新闻更将“安倍口罩”戏称为日本政府和大家开的玩笑。^⑤ 民众的反应不难理解。2020 年 3 月以后,以航空、旅游为首的服务性行业遭受重创,失业人数逐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援助期待远远超过一户两枚的纱布口罩。

那么,比起口罩,日本民众的具体诉求又是什么呢?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表的失业人数数据显示,2020 年 4 到 6 月的失业人数比前年同期增加 24 万人,完全失业率从 2.4% 上升至

① “安倍经济学”泛指安倍及其内阁在安倍第二次内阁(2012.12-2014.9)期间为了打破日本经济困局,所提出的一系列本质为量化宽松经济的政策。

② 2015 年 11 月 6 日安倍前首相在读卖经济恳谈会(YIES)上就提到安倍经济学使 GDP 增长从负到正。参见「2020 年には GDP600 兆円達成できる」(中文:2020 年 GDP 可以达到 600 兆日元)、産経ニュース、2015 年 11 月 6 日、<https://www.sankei.com/premium/news/151106/prm1511060014-n1.html>。

③ 比如 Saori Shibata 指出,安倍经济学不过是老酒新装,对提高日本企业收益或许有效,但无法解决将企业受益分配至劳动者手中的问题。参见 Saori Shibata,“Re-packaging old policies? ‘Abenomics’ and the lack of an alternative growth model for Japan's political economy,” *Japan Forum*, Vol. 29, No.3, 2017, pp. 399-402.

④ “From Abenomics to Abenomask: Japan Mask Plan Meets With Derision,” Bloomberg, 2020 年 4 月 2 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4-02/from-abenomics-to-abenomask-japan-mask-plan-meets-with-derision>.

⑤ “Coronavirus measure in Japan of 2 masks per home taken as April Fool's joke, mocked as ‘Abenomask’”, Fox News, 2020 年 4 月 2 日, <https://www.foxnews.com/world/coronavirus-japan-abenomask-april-fools-joke-outbreak-mask-per-home>.

2.8%。^① 全社会范围面临失业,工时减少,收入减少等问题,政府内外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政府派发现金或者代金券缓解民众的生存压力。日本人对政府派送现金并不陌生,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日本政府就曾向所有在日本国内拥有居民登记的日本人、外国人派发过一人12000日元的现金。^② 不少研究事后分析认为高达2兆日元的现金派送最终流向了个人储蓄市场,对刺激经济增长效果甚微。^③ 经此“教训”,以副总理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为首的自民党领导对派发现金颇为抵触。^④ 然而,当时经济受创之大已经到了现金补助无法避免的地步,在民众要求“现金给付”的强烈呼声中,经过多番调整后政府最终妥协,宣布向一亿两千万以上的“全国民”,^⑤ 派送一人10万日元的“特别定额给付金”。^⑥

以后的几个月里,市面上的口罩短缺问题因为生产厂商的产量大幅增加得到缓解,“安倍口罩”不但没有产生政府预期的雪中送炭效果,更因其质量、设计问题而差评不断。^⑦ 后来采购派送口罩的费用从一开始的466亿日元精简压缩了260亿(其中76亿用在运费等上),但“安倍口罩”依然被视作一项浪费税金的愚策。

“安倍口罩”计划决定后不多日,4月7日日本政府宣布在东京都、大阪府及埼玉、千叶、神奈川、兵库、福冈五县开始“紧急事态宣言”,同月16日“宣言”范围扩大至全国。“宣言”原定5月6日解除,后延长至5月25日。解除当天新增感染人数为21人。政府先前承诺的“特

① 「労働力調査(詳細集計)2020年(令和2年)4~6月期平均」、日本総務省統計局、2020年8月11日、https://www.stat.go.jp/data/roudou/rireki/4hanki/dt/pdf/2020_2.pdf。

② 派发工作在2009年启动,基本派发金额为12000日元,基准日当天65岁以上以及18岁以下的人的派发金额为一个人20000日元。

③ 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对现金派发的评价为0分。参见「クルーグマン教授「給付金は0点だ」 与謝野氏と対談」朝日新聞デジタル、2009年5月25日、<http://www.asahi.com/special/teigaku-kyufukin/TKY200905240130.html>。

④ 2020年3月19日的记者会上,麻生以副总理与财务大臣的身份对记者表示,财务省尚没有派送现金的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尝试过派送现金,但对刺激经济并没有大的效果。参见「急転直下!なぜ10万円に?」、NHK、2020年4月22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34154.html>。

⑤ 这里的“全国民”定义基准与2008年现金派发时相同:在日本有住所登记,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现金派发对象。

⑥ 有关“给付金”的金额,派送对象,是否对收入做出限制的决定过程颇多曲折,最初决定(4月7日)以收入减少的家庭为单位,一户三十万日元,后经各党派根据党内党外意见协调折中,4月20日正式发表无关收入、一人十万的派发政策。

⑦ 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的报告,受访人群对“安倍口罩”的使用率仅为3.5%。参见「『アベノマスク』使用は3.5% 民間意識調査」、日本経済新聞、2020年8月13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62611360T10C20A8000000>。

别定额给付金”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达成了 99.4% 的派发率。^① 疫情得到控制, 民生得到支援保障, 从表面来看, 政局趋向稳定, 然而从二月起呈下降态势的内阁支持率依旧持续下滑 (2020 年 2 月与 6 月对比: 支持率 45%→36%; 不支持率 37%→49%)。^② 这其中虽然有疫情以外的因素, 但“安倍口罩”的不得人心, “特别定额给付金”决定过程中执政党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混乱, 以及部分世袭政治家脱离民情、无视民益的言论对自民党执政也带去深刻打击。2020 年下半年度日本政坛经历了非正常首相更迭, 由新内阁强力推行的“Go To Campaign”造成病毒感染人数大范围扩大。面对混乱局面, 自民党新上任党首菅义伟首相在多方压力下叫停“Go To Campaign”, 新首相的领导能力以及危机管控意识因此受到了民众的质疑。那么“Go To Campaign”究竟是一项何种性质的经济刺激项目呢? 它是否只有过错而无一丝功劳呢? 从日本民众对它的反馈评价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何种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启发呢?

(二) 违背公平原则的“Go To Campaign”

公布“安倍口罩”计划的同时, 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另一项高达 16 兆 8057 亿日元的补充预算, 其中 1 兆 6794 亿计划用于旨在唤起民众对旅游, 饮食, 娱乐集会活动需求的“Go To Campaign”上。作为大型财政补贴项目, “Go To Campaign”由“Go To Travel”“Go To Eat”“Go To Event”以及“Go To 商店街”四大部分组成。它们各自的补贴对象, 内容以及实施状况汇总如表 1。^③

如表 1 所示, “Go To Campaign”的实施状况相当复杂。首先, 活动开始时间因“自治体”而各异。比如, 7 月 22 日至 9 月末的“Go To Travel”排除了旅行出发地与目的地为东京的旅程。其次, 因为大多数补贴计划需要运营商的参与主导, 一部分本应该由代表政府的行政单位行使的权限被移交给了预约网站、旅馆、餐饮单位等“民间事业者”。虽然政府公示了补贴标准, 具体实施上却因“民间事业者”的内部政策而不尽相同。以“Go To Eat”为例, 对于点数的申请、使用方式, 不同的预约网站有不同的政策。事实上, 不仅是消费者, “民间事业者”也被缺乏统一标准的“Go To Campaign”搞得晕头转向, 参加政府主办的说明会的旅游业界人士面对媒体采访时纷纷抱怨“Go To”不知所云。^④

① 「特別定額給付金の給付済金額の推移」、日本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enu_seisaku/gyoumukanri_sonota/covid-19/kyufukin.html#suii。

② 「NHK 世論調査 内閣支持率」、NHK、<http://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此网页随时更新。

③ 有关补贴对象的详细内容可参考「令和 2 年度国土交通省関係補正予算の概要」、日本国土交通省、2020 年 4 月 7 日、<https://www.mlit.go.jp/report/press/content/001339698.pdf>。

④ 「開始 2 日目の『Go To ラベル事業者説明会』困惑の声相次ぐ」YouTube 北海道ニュースUHB、2020 年 7 月 23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1XQREfKf8>。

表 1 “Go To Campaign”的政策内容与执行状况

项目名称 / 负责部门	政策内容	执行状况
Go To Travel 国土交通省 观光厅	通过观光厅登记在案的旅行代理店预定旅馆, 报名参加旅游项目将获得上限为两万日元, 占消费总额 35% 的折扣以及可以在观光地当地餐馆, 纪念品商店等使用的占消费总额 15% 的“地域共通优惠券”。(一日游补贴上限金额为一万日元)	● 2020 年 7 月 2 日起实施, 计划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结束(东京除外)。 ● 10 月 1 日起“地域共通优惠券”投入使用, “Go To Travel”在包括东京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 ● 12 月 28 日起全国范围统一暂停。
Go To Eat 农林水产省	1) 通过特定预约网站预约并消费, 可获得饮食点数, 一个人每次最多可获得相当于一千日元的点数, 这些点数可以在下一次用餐时使用 2) 发行优惠饮食券, e.g. 20000 日元可以购买到价值 25000 日元的优惠饮食券	● 附送点数: 9 月下旬开始实施, 11 月 24 日到达预算金额, 中断, 所获饮食点数使用有效期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 ● 优惠饮食券发行: 11 月末起各都道府县相继暂停发售。
Go To Event 经济产业省	通过票务中介购买的特定娱乐类票务可享受相当于票价两成的折扣或者优惠券	● 受疫情扩大影响, 未正式开始。
Go To 商店街 经济产业省	以商店街团体为单位, 根据申请状况, 每个团体接受补助上限为 300 万日元	● 50 个团体申请并得到批准的 34 个项目从 2020 年 10 月 19 日起实施。 ^①

根据一份在 2020 年 9 月最后一周进行的网络调查, 受访的 965 人中 16% 认为自己熟知“Go To Travel”的条款, 56% 的受访人群已经参加或有参加的打算。^② 10 月 23 日到 24 日之间进行的有关“Go To Eat”的网络调查则显示 50% 以上的受访人群已经参加过活动。^③ 考虑到活动还未正式结束, 且受调查时间、受访人群的限制, 上述数据无法一般化, 然而它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Go To”系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民众支持的。如果没有病毒第二波、第三波的到来, 极有可能被当作安倍或者菅内阁的政绩而受到正面评价。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正当日本社会沉浸在如火如荼的“Go To”活动中, 享受政府补贴带来的经济实惠时, 日本单日新增感染人数首次突破两千(2193 人), 其后至今每日新增感染人

① 「新型コロナ Go To 商店街、50 体が参加へ 19 日から各地で」、毎日新聞、2020 年 10 月 17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1017/ddm/008/040/134000c>。

② 「Go To ラベルキャンペーン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https://go-to-campaign.jp/questionnaire/>。

③ 「『Go To Eat キャンペーン』の利用実態調査」、ぐるなびリサーチ部、2020 年 11 月 10 日、<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1023.000001511.html>。

数没有跌破过四位数。^① 12月14日,作为对来自反对党、民众强烈呼吁的回应,菅首相宣布“Go To Campaign”在12月28日到1月11日之间暂停。^② 12月,菅内阁支持率为42%,从上任时的62%跌落了20个百分点。^③

尽管内阁顺应民意叫停了“Go To”,但被认为“太迟了”。^④ 海外媒体也用“慢一拍”来形容菅内阁的决策速度。^⑤ 菅内阁迟迟不叫停“Go To Campaign”的原因何在呢? 不少人认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对菅首相施加的压力致使政府叫停“Go To”的时机大为延迟。^⑥ 二阶俊博是公认的自民党内“亲中派”。^⑦ 从中国疫情爆发开始,二阶就致力于支援中国抗疫活动以及推动原定四月份的中国最高首脑访日计划。身兼“全国旅行行业协会会长”及“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观光立国调查会最高顾问”二职的二阶是日本观光立国和中国人访日观光旅游事业的强力推行者。为此,日本舆论将二阶视为中国在日本政坛的代言人,并将疫情早期政府未能防病毒于未然的责任归咎于二阶对观光业以及中国游客的“忖度”上。^⑧ 这种论调在二阶及相关自民党员接受观光事业团体至少4200万日元政治献金的事实陪衬下显得极有说服力。^⑨ 然而,应当注意到的是,“Go To”的目的在于通过“史无前例的旅游产品折扣唤醒国内观光需求,促进观光地整体的消费”,观光事业复苏沸腾意味着日本社会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能从中获益。不论二阶在国会是否是观光利益团体或者中国的代言人,他与菅内阁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迅速恢复日本经济。经济与民生息息相关,按理说经济复苏,民众受益,

① 「特設サイト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NHK、<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data-all/>。此网页随时更新。

② 其后延长至3月7日,至本稿提交日4月20日时尚未恢复。

③ 「NHK 世論調査 内閣支持率」、NHK、<http://www.nhk.or.jp/senkyo/shijiritsu/>。此网页随时更新。

④ 「菅内閣支持率が相次ぎ4割を切る、Go To 停止『遅すぎた』」、Bloomberg、2020年12月21日、<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20-12-21/QLNXDJDWLU6E01>。

⑤ 《东京等地进入紧急状态,菅义伟决策为何“慢一拍”?》,澎湃新闻,2021年1月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83013。

⑥ 在12月4日政府举行的记者会上,记者就二阶作为全国旅行行业协会会长强力推行“Go To”活动一事,向菅首相提问政府有否优厚待遇旅行观光业。详细参见「二階氏が会長だからGo To 優遇? 首相『特別じゃない』」、朝日デジタル、2020年12月4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D46GR3ND4UTFK023.html>。

⑦ 由美国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出版的白皮书 China's Influence in Japan: Everywhere Yet Nowhere in Particular 亦将二阶归类为亲华政治家。参见 Devin Stewart, China's Influence in Japan: Everywhere Yet Nowhere in Particular, CSIS, 2020, p.16。

⑧ 「習近平国賓訪日への忖度が招いた日本の『水際失敗』」、Newsweek、2020年2月20日、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20/02/post-92453_1.php。

⑨ 「Go To キャンペーン受託団体が二階幹事長らに4200万円献金」、『周刊文春』、2020年7月30日号。

日本民众为什么对自民党政府全力推行的经济方案全不领情呢？依笔者之管见，日本社会虽然从明治维新开始的一个半世纪多以来致力学习效仿西方社会制度，但源于中国的儒学经典依然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处事和思维方式。民众对“Go To Campaign”的消极反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传统“国民性”。在大部分日本人眼中，“Go To Campaign”的福利只有有钱有闲又深谙网络操作的人才能享受。因此，不论“Go To”系列优惠措施是否能够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它首先是一项不公平的政策。政策一旦不公平，不管它能否刺激经济，它已经在人群当中掀起了不安，对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思想影响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宁可忍受“寡”与“贫”，也不愿支持违反公平原则，给民众带来不安困扰的优惠政策。更何况旅游、外食、聚众娱乐等活动确实不利于疫情控制。除此之外，日本民众对政府财政预算分配、经济复兴计划方面的不满还源于事事向美国看齐的“约定俗成”。2020年4月全国热烈讨论“特定给付金”的金额和发放对象时，日本民众毫不犹豫地 will 美国政府制定的现金派送政策作为标准，要求细致到派送次数、补贴金额与其完全一致。日本民众认为不管是派送金额还是派送次数，日本政府所做的样样比不上美国。^①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满足传统儒家社会对施政者的要求，又要满足民众不顾国情、凡事都向美国看齐的现代标准，是日本政府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国民要求高并不是自民党政府逃避施政失败责任的理由，自民党政府内的确存在脱离民情、违背民意的问题，比如大资产阶级出身的自民党领导高高在上的说话方式，缺乏同情心、同理心的发言内容，经过媒体宣传放大，大大伤害了一心谋求公平、安定政策的普通民众的感情，并且让不少原先对草根出身的菅首相抱有希望的民众失望。那么，菅首相是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对上任不久的菅内阁来说，在处理部分拖其内阁支持率后腿的自民党员问题上，即便他与这些人的政治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以他目前在党内的地位根基，应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20年8月底安倍前首相因病辞去总理一职时，二阶首先提出拥立时为官房长官的菅义伟竞选总裁一职，加之其在政坛的“先辈”身份，菅首相在心理上对二阶始终存有忌惮，因此有所任之之嫌。同理，面对出身于政治世家，在自民党内有一手遮天影响力的麻生太郎，菅义伟应该有更大的顾忌。菅内阁是过渡政权，但他本人希望能从“过渡”中“转正”，然而在其任期内如果不与麻生、二阶以及前首相森喜朗这三位自民党人的“长老”、民众眼里的“老

^① 截至交稿，日本派送1次，金额为一人10万日元；美国派送2次，最近一次的金额为一人约15万元。

害”保持距离甚至划清界限,很难想象内阁支持率会有大的起色。不出意外,民众对自民党执政的不满将会在 2021 年总选举那一天集中火力喷射出来。另一方面,民众对执政党不满的同时,对在野党也是批评不断,因此完全有理由预测在将于 2021 年下半年举行的“总选举”中,即便自民党无法获得“稳定多数”的议席,在野党中也不太可能获得能与之抗衡的选票数。2021 年总选举以后很有可能出现联立政权。

二、疫情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败也疫情,成也疫情”

2020 年 9 月与 10 月之间,日本特定非盈利法人言论 NPO 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实施了第十六次关于中日两国人如何看待对方国家国民的问卷调查(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人持有“不好”(良くない)印象的日本人占总数的 89.7%(比去年增加 5 个百分点),对中国持有“好”(良い)印象的日本人仅占总数的 10%(比去年减少 5 个百分点)。中国方面,对日本人持有好印象的中国人占到受访人群的 45.2%,对日本持不好印象的百分比为 52.9%(两项均与去年持平)。^①

从言论 NPO 发布的历年“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报告来看,近十年来日本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百分比始终居高不下,这不得不使人疑惑日本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中国印象不好呢?比起冰冷的数字,一则旅游观光地的零食店告示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这则大概率由日本人写成,中文翻译没有经过校对的告示如下:

“中国人种进入商店禁止”

- ・1 只散布冠状病毒的中国人种即便足够也是进入商店禁止
- ・为玫瑰花撒冠状病毒而请不要到箱根到日本来
- ・虽然本来就是荒唐的人种为撒而能来箱根但是玫瑰花到病毒令人讨厌
- ※但是不如上碰到香港国家的香港人,台湾国家的台湾人的各位请不要被误解!!

店主^②

可能是 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病毒传染事件(SARS 事件)留给日本人的印象太过深刻,

① 「第 16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2020 年)」,言論 NPO、2020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generati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2.html>。

② 「新型肺炎を理由に『中国人は入店禁止』箱根の駄菓子店」,朝日デジタル、2020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1P6Q80N1PULOB02D.htm>。

也可能是缺乏基本卫生常识以及对中国现代卫生饮食文化的误解,不少日本人倾向于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便将病毒发源、扩散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大陆。如言论 NPO 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的那样,中国对新冠疫情的举措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2020 年上半年,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武汉乃新冠病毒病源地的说法毫不怀疑,一致单方面地认为中国应该对病毒的全球扩散负责。到了下半年,多国研究机构表明早在 2019 年新冠病毒就已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但由于“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说法经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背书后太过深入日本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乃病毒发源地,中国政府需为病毒扩散负责的说法坚信不疑。

除了新冠疫情加深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好印象”,告示还传递了中日两国间的另一大问题:两国关系中的传统短板,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造成了日本人“轻大陆而重港台”的对华态度。2020 年香港国安法开始施行,日本舆论在本国和西方媒体的影响下认为国安法的施行是对民主主义的挑战,民众对乱港分子表现出了非理性的同情。例如,乱港分子周庭(Agnes Chow)因通晓日语,多次接受日本媒体访问,部分新闻媒体甚至将她称作“民主女神”。言论 NPO 的舆论调查实施前夕正值周庭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逮捕,日本社交媒体竞相报道,并且在网上组织了颇受瞩目的“Free Agnes”(释放周庭)签名活动。除了香港,日本对于昔日殖民地台湾在疫情中的处境亦关切有加。疫情期间,台湾采取全方位封锁政策,有效控制住了病毒蔓延。此举在日本获得极大反响,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实施的“日本人对台湾意识调查”(日本人の台湾に対する意識調査)显示,56.7%的受访日本人表示他们对台湾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死亡人数之少予以较高评价。受访人群中对台湾抱有亲切感(親しみを感ずる)的百分比则为 77.6%。^①产经新闻评论表示日本有对华感情恶化的同时,对台亲近感增强的倾向。^②不得不说,“轻大陆重港台”的路线方针既是日本人追随美国的必然结果,也是近现代史上中日两国交涉中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日渐成为日本全民路线的“轻大陆重港台”潮流给修复中日两国国民感情带来了挑战。

言论 NPO 的共同舆论调查还显示,47%的受访日本人对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体感到违

① 「台湾に対する意識調査報告書 2020 年 12 月」由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委托一般社团法人中央调查社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至同月 26 日实施。受访对象为 20 岁至 80 岁之间的日本人,调查结果通过网络以及电话调查获得。

② 「台湾に『親しみ』78%、コロナ対策 57%『評価』、日本人の意識調査、対中感情との差浮き彫り」、産経ニュース、2021 年 1 月 6 日、<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210106/wor2101060019-n1.html>。

和。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政府未能及时公开信息可能增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信息公开方面的不信任感,但是中国政府在进入抗疫平稳阶段以后向世界各国呈现了一党执政体制的高效率以及优越性,通过派驻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相关人士的反馈,已经成功获得了日本政府民间有识之士的肯定,对扭转中日两国关系的下沉局面起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作用。2020 年因为国内经济衰退、海外游客大量减少,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然而日本去年 12 月的经常收支却出现了 1 兆 1656 亿日元的黑字。出现黑字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出口额的增加。不夸张地说,倘若中国抗疫工作没有获得成效,日本在华企业按原计划撤回本国或搬去其他国家,按照 2020 年后半年的世界经济走势,日本经济不可能出现与前年同月比增长额为 2 倍以上的巨额黑字。当日本举国认识到中国的稳定增长能带动日本企业发展的时候,日本人的对华感情会自动发生变化。另外,通过日本本国抗疫情势,不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已经体会到抗疫不易,信任并支援对方国家远比隔岸观火、轻易评判来得有效实际。只要日本媒体能够坚持报道中立的基本操守,不偏不倚地报道中国抗疫成功对国内外的正面影响,此次疫情大有可能成为日本及其他国家重新评价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有效契机,正所谓“败也疫情,成也疫情”。

(二)是政府间的问题还是“国民”的问题?

按计划,原定 2020 年春,中国最高领导人将赴日进行国事访问。但因为疫情的爆发,访日行程只得搁浅。2020 年 7 月 3 日自民党外交部会与外交调查会在干部会议上以反对国安法为由通过决议案,呼吁政府取消邀请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决议案通过当日还未被递交给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即被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截下,理由是决议内容事关重大,应在党内讨论以后再议。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向记者对决议内容表达了不满。^①从结论来看,反对习主席以国宾身份访日的这份决议并未达到目的,政府与自民党内重视中日关系的力量仍旧占了上风。但不可忽视的是,决议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日本国民的心声:疫情爆发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不仅日本国门必须关闭,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奥运会等一切国际交流都应该延期或者取消。不久后,日本国内病毒感染状况即迎来“第二波”,新闻媒体的焦点集中在了对疫情以及“Go To Campaign”的报道上。数月过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日,中日两国关系再次升温成为焦点。有关王毅外长在访日

^① 「習氏の来日反対決議案に猛反発二階氏」、毎日新聞、2020 年 7 月 4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704/ddm/005/010/051000c>。

期间与日方达成的五点重要共识与六项具体成果,中国方面的主要媒体均做了详尽的报道;相比之下,日本媒体对这些极具建设性意义的成果却只是一笔带过。调度安排王毅外长访日的同时,日本政府有效但短暂地针对中国商务人士打开国门、方便进出。这种姿态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视与协调。事后各项数据显示病毒感染的“第三波”与11月间日本打开国门不无关系,然而日本政府的本意在于加快两国经济合作人员交流往来。不仅如此,从感染人员的背景来看,新增感染人员更多来自于欧美国家,与当时差不多已经实现“0感染”的中国关系并不大。可惜的是,日本民众在媒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诱导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感染扩大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以及积极推动中日两国交流的政治家身上,导致两国感情再生嫌隙。

2020年12月14日,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召开上任记者招待会,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言论NPO有关中日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的日本国内对华感情恶化的问题时,垂大使指出:“中国政府应该为改善日本对华感情付诸努力”。记者招待会三天后,垂大使接受《环球时报》采访,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在过去中国人对日印象极为不佳的时期,中方经常要求日本政府采取举措。而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比如健全吸引中国游客的制度,切实开展各种文体交流和青年交流活动等。”^①毫无疑问,改善两国关系和相互感情需要两国政府的合作。然而,分析日本对中国不好印象的具体事项时,不难发现日本的“诉求”关系到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社会安定(国安法在香港施行)、关乎人民生命(抗疫手段)等根本问题,中国无法通过分裂自己来取悦日本民众,中国也不可能为了得到部分崇尚自由的日本人和西方人士的赞许而对疫情等闲视之。不难预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的对华感情将持续走低。另一方面,与其说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朝着正面发展的是自民党政府,不如说“高需求”的日本国民才是问题所在。垂大使认为中国政府方面对日本如有积极举措便有可能改善两国间关系的主张不无道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两国国民截然不同的“国民性”:日本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紧跟美国,比之日本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起在处理看待国际事务上拥有高度柔韧性的中国人,日本人事事以美国为标准,宁可被西方媒体牵着鼻子走,也不愿意亲身体验、了解中国大陆,即使中国政府采取类似日本政府那样大力开展民间交流的策略,日本民众未必会积极参与响应。

^① 《专访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对华政策抉择》,环球时报,2020年12月18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97cLWwb5>。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是“分裂”的。在同文同源的历史文化连带感的影响下,日本对陷入危难的邻国产生了真诚自然的亲近感。疫情在中国爆发伊始,口罩及其他医疗资源短缺,日本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然而,为了紧跟西方社会的步伐,迎合同盟国的价值观,日本人又不可控制地走到中国的对立面,对中国的抗疫方针和内政问题横加指责。政策的改变可以在朝夕之间完成,然而改变人的想法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如此看来,中日两国之间不尽人意的关系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值得铭记的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那样由共同文化积淀催生出的连带力量随时都有可能点燃两国人民心中的友好热情,虽然这股力量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走向,但有理由相信两国人民向往和平友好、互惠互利、共存共生的内在愿望只是暂时被抑制,在未来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文化连带感随时都有复苏的可能。

三、结语

对日本来说,进入新千年以后,2021 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挑战与未知性。首先东京奥运会召开与否对日本经济乃至国运影响深远,目前民众对召开奥运会的支持率仅为 16%。^①即便中国有意支持推动东京奥运会如期召开,日本民众也未必领情。其次,根据总选举结果,日本政坛可能会出现巨大变化,然而无论是自民党继续执政,还是在野党上台,亦或是建立联合政权,缺少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生代力量会是日本政坛的一个短时期无法改善的短板。没有一股优秀、高效、超越党派利益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日本抗疫成功和经济复苏估计还有一段坎坷旅程要走。无人能够预知疫情何时结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有一个国家还处于病毒危机中,全世界都可能受其影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的疫情状况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倘若日本能够及时认识到中国无疫情对日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实,不仅中日两国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日本也将逐渐实现经济复苏,社会原有秩序恢复。

(作者为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兼助理武藏野大学国际综合研究所客员研究员)

^① 根据 NHK 调查,受访人群对停办奥运会以及延期举办的意见分别为 38%与 39%。参见「東京五輪・パラ『開催すべき』16% 先月より11ポイント減」、NHK、2021 年 1 月 13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10113/k10012810061000.html>。

日本的孟加拉湾地区政策:定位、实践与前景

张 婷

内容提要 近年来,处在印太地区中心位置的孟加拉湾正逐渐从“战略死水”转变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凸显的战略要地,日本在其“印太”战略之下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关注,日版孟加拉湾地区政策呼之欲出。对日本而言,孟加拉湾地区是其“印太”战略下的深耕区,即是日本的拓展新兴市场的战略储备区、确保海上安全的战略航道区、对冲中国的战略制衡区。在经济层面上,日本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开发援助两手抓;在安全层面上,践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三步走”战略,以此积极推进其孟加拉湾地区政策。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基于其孟加拉湾地区政策实施的有利条件和掣肘因素,将继续深化在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存在,而未来如何在该区推行其孟加拉湾地区政策仍然值得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 印太战略 日本 孟加拉湾地区

随着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印太”已经从一个地缘概念演进为一个国家对外现实战略,印度洋正重新成为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区域,而作为印度洋最大海域的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也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和经济竞争的关键舞台。^①孟加拉湾在地理范围意义上通常被定义为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之间从西向东延伸的“三角盆地”,位于印度洋的东北部,西部及西北部与印度接壤,北部与孟加拉国接壤,东部与缅甸和印度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接壤,南部边界大致沿着斯里兰卡栋德勒角(Dondra Head)和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最西北角的分界线。^②该地区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六个沿海国家,不丹、尼泊尔和中国三

^①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23-25.

^② “Bay of Bengal,” *Banglapedia: 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angladesh*, 2012, http://en.banglapedia.org/index.php?title=Bay_of_Bengal.

个孟加拉湾内陆国家,以及与该地区有经贸联系的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新加坡,^①囊括了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人口的密集使孟加拉湾地区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在2012—2016年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仍保持着3.4%至7.5%的平均年增长率。^②此外,孟加拉湾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每年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货物要通过孟加拉湾。因此,孟加拉湾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价值。

日本虽然不属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但日本对孟加拉湾的战略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孟加拉湾对印度洋的重要性与南中国海对太平洋的重要性相当。^③尽管日本政府并未明确出台关于孟加拉湾地区的政策性文件,但日本对该地区的政策走向日益明显。自2000年以来,日本海上保安厅(Japan Coast Guard)一直定期驻扎在孟加拉湾,与印度定期举行演习。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也一直在孟加拉湾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府开发援助。2012年安倍二次组阁之后,在该地区实行了日美同盟基轴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对华包围制衡等一系列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寻求与该地区国家密切合作。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梳理日本关于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分析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实践与实质,而通过对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分析则将有助于我们去全面认识日本“印太”战略的未来走向。

① 关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环孟加拉湾地区国家共有七个,其中四个核心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印度,三个周边国家包括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二是从海洋生态系统和相关流域的划分出发,认为环孟加拉湾地区国家共有十一个,即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马来西亚;三是将新加坡列入其中,认为共有十二个环孟地区国家,且将之分为三种类型——沿海国家六个(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内陆国家三个(不丹、尼泊尔、中国)以及与该区有经贸联系的其他国家(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新加坡)。综合上述三种说法,本文结合地理意义上的划分和经济上的联系,支持第三种说法。参见 Kent E. Calder, “The Bay of Bengal Political-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July, 2018, pp.34–36; J. Samarakoon, “Issues of Livelihoo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Bay of Bengal,”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Vol.33, No. 1, 2004, pp.34–44; Bhandari, Bishnu B. “The Bay of Bengal: A Forgotten Sea,” The Proceeding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Bay of Bengal, February 4th, 2016, pp.7–14; Constantino Xavier and Riya Sinha. “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India’s BIMSTEC Policy,” *National Security*,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ol. 3, No. 1, 2020, pp.34–51; “Countries of the Bay of Bengal,”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tries_of_the_Bay_of_Bengal.

② S.M. Nazmul Hassan, “Strengthening Railway Transport Connectivity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Asia,” BIMSTEC presentation, March 15–16, 2017,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5.3_S.M._Nazmul_Hasan_BIMSTEC%20Secretariat.pdf.

③ David Brewster, “Japan is back in the Bay of Bengal,” The Lowy Institute, September 10th, 2018, <https://www.loy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japan-back-bay-bengal>.

一、日本关于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定位:作为日本“印太”战略下的深耕区

二战期间,日本并未将缅甸以西的包括孟加拉湾在内的区域视为其所谓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圈”范围内。1942年日本在占领缅甸之后并未选择继续向西部的印度推进,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于日本并未将孟加拉湾看作是一个单一战略实体。^①二战之后,日本战败。1952年“旧金山对日媾和”之后,日本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同盟国军事占领状态,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恢复正常。彼时日本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国家经济。这使得日本政府热衷于与能够提供原材料,或能够成为其制成品市场,或能为投资提供适宜环境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经济落后,无法为日本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对孟加拉湾地区是缺乏战略关注的。

1977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在出访东南亚各国时发表了著名的“福田主义三原则”,开始从战略高度逐渐重视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这可被看作日本经略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起点。之后,日本开始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主,辅之以海外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加强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相继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价值观外交”也明确强调了印度洋周边国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意义。2016年日本正式提出日本版的“印太战略”——“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FOIP),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明确表示,“日本有责任促进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和非洲的汇流,使之成为一个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不受武力胁迫的繁荣之地。”^②而孟加拉湾正处在两大洋、两大陆的中心位置,其对日本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因而日本更加密切了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从经济、安全、战略三个层面将孟加拉湾地区作为其“印太战略”的深耕区。

(一)经济层面:拓展新兴市场的战略储备区

在经济层面上,孟加拉湾地区是日本拓展新兴市场的战略储备区。日本看重孟加拉湾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因而积极将孟加拉湾地区打造成日本开拓海外新兴市场的战略储备区,这是日本对该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定位。

日本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其能源自给率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为6.4%,2019

^① David Brewster, “Dividing Lines: Evolving Mental Maps of the Bay of Bengal,” *Asian Security*, Vol.10, 2014, pp.151-167.

^②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iplomatic Bluebook 2017*, Japan, 2017, <https://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17/html/chapter1/c0102.html#sf03>.

年的自给率不足 10%, 大多数能源依赖于进口。^① 在能源的替代性上, 尽管日本政府在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恢复了核电站, 但火力发电比重仍较大且逐年增加, 因而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需求大。在能源供应的脆弱性上, 日本进口原油的 80% 来自中东地区。^② 但中东是各类冲突的多发地带, 为减少这种能源供应的脆弱性, 日本一直在积极追求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孟加拉湾丰富的能源储量能够为日本解决能源的脆弱性和替代性问题, 进而助推日本经济的发展。根据 2011 年英国石油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报告》(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孟加拉湾地区(主要是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沿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约为 100 万亿立方英尺, 占世界未开发油气储量的 1%, ^③ 目前日本也已成为孟加拉湾地区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④ 另外, 从煤炭进口来看, 2019 年日本煤炭进口约 233 亿美元, 是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⑤ 图 1 展示了 2019 年日本进口煤炭的前 14 位供应国。在日本煤炭进口的主要供应国家中, 有印度尼西亚、泰国两个孟加拉湾国家。因此, 孟加拉湾地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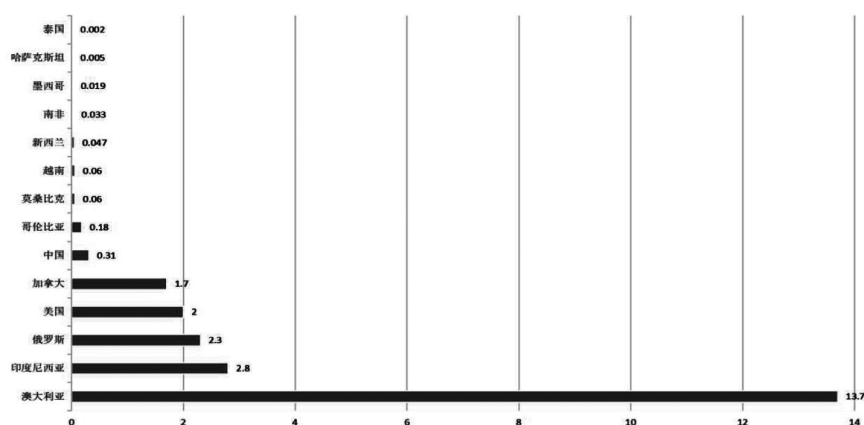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日本煤炭进口前 14 位供应国(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Trade Map

①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energy situation in Japan 2019,” Japan, November 2019, https://www.enecho.meti.go.jp/en/category/special/article/energyissue2019_01.html.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hite Paper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15: Japa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apan, 2015, p.143.

③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British Petroleum, 2011, pp.22–23.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country/de_de/PDFs/brochure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1.pdf.

④ Ash Rossiter,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Japan’s Emerging Security Posture,”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3, 2018, pp.113–131.

⑤ Daniel Workman, “Coal Imports by Country,” *World’s Top Exports*, May 4th, 2020,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coal-imports-by-country/>.

算是日本的自然资源储备区。

在劳动力资源上,日本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挑战——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预计到 2065 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①因而日本对劳动力有着迫切需求。目前,除蓝领行业的劳动力短缺之外,日本高科技公司还面临着 IT 工程师的严重短缺。^②而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③劳动力充足且人口结构年轻化。印度、孟加拉等孟加拉湾地区国家都是劳务输出大国,且印度的 IT 高层次人才较多。日本正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就劳务输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如图 2 所示,2020 年在日本的外国工人构成比例中,来自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的工人占比超过一半。此外,日本政府 2018 年 6 月发布了新的“特定技能签证”(Specified Skills Visa),计划到 2025 年接纳 14 个关键行业的 50 万名外国工人。^④2019 年日孟两国签署了日本接受孟加拉熟练工人来日工作的备忘录。^⑤2021 年印度政府也批准了日印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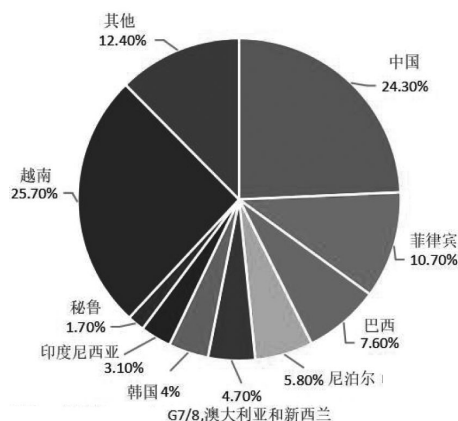


图 2 2020 年在日本的外国工人比例(按原籍国划分)

资料来源:Statista

① Rebekah Smith and Anita Vukovic, “How Can Japan Meet Its Goal of 500,000 Foreign Workers by 2025? By Contracting Out Labor Mobility Program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September 12th, 2019, <https://www.cgdev.org/blog/contracting-out-labor-mobility-programs>.

② Ming Hui Tan and Nazia Hussain, “Japan-India: An Indigenous Indo-Pacific Axis,” The Diplomat, March 18th,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3/japan-india-an-indigenous-indo-pacific-axis/>.

③ Constantino Xavier and Darshana M. Baruah, “Connect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Problem,” The Seminar, March 1st, 2018, <https://carnegieindia.org/2018/03/01/connecting-bay-of-bengal-problem-pub-75710>.

④ Rebekah Smith and Anita Vukovic, “How Can Japan Meet Its Goal of 500,000 Foreign Workers by 2025? By Contracting Out Labor Mobility Program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September 12th, 2019, <https://www.cgdev.org/blog/contracting-out-labor-mobility-programs>.

⑤ “Dhaka, Tokyo sign MoC for recruiting skilled workers to Japan,” The Daily Star, August 27th, 2019, <https://www.thedailystar.net/politics/japan-hire-skilled-workers-from-bangladesh-1791376>.

于“特定技术工人”的合作基本框架备忘录,文件的批准将使印度向日本派遣合格的印度技术工人机制化。^①由此可见,孟加拉湾地区正成为日本的劳动资源储备区。

(二)安全层面:确保海上安全的战略航道区

安全层面上,孟加拉湾地区是日本确保海上安全的战略航道区。作为一个列岛国家,日本南北长、东西窄,战略纵深短,其地缘战略环境是由海洋主导的。也就是说,海洋安全是日本战略纵深带,^② 确保海洋安全是日本重要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列岛国家,海上交通线(SLOCs)在日本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原油有8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而日本的能源运输则主要依赖于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这条海上航道,日本油轮通过这条海上航道每天进口约320万桶石油。^③ 孟加拉湾南部是日本油轮从中东进行原油运输的必经之地,该地区可谓之日本海上能源运输的“咽喉要地”。

虽然这条海上交通线不是直接横穿孟加拉湾,但是日本国内近年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担忧:一旦南海因封锁不能通行,那么孟加拉湾和东印度洋对日本的战略重要性就会凸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运输线将向东移,经由孟加拉湾绕道龙目海峡和望加锡海峡进入菲律宾海。^④ 由此得出的进一步推论是,日本需要稳住印度洋东部的孟加拉湾地区,孟加拉湾是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区,需要在该地区保持一定的战略存在。日本筱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西田一平(Ippeita Nishida)甚至建议日本应积极将孟加拉湾打造成为通往东方的门户地区,以此解决日本海上战略通道的脆弱性。^⑤

正是出于对孟加拉湾战略通道区的这种考量,日本愈发重视印度洋—太平洋海上交通线上的关键节点国家,这其中就包括了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之一的斯里兰卡。日本将斯里兰卡

① “Govt clears India-Japan pact to institutionalise mobility of skilled workers,” The Hindu, January 16th, 2021,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govt-clears-india-japan-pact-to-institutionalise-mobility-of-skilled-workers/article33510493.ece>.

② 张景全:《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初探》,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5期,第35-40页。

③ “Japan 2017 thermal coal imports hit record, LNG up for first year in three,” Reuters, January 23rd,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nergy-japan-imports-idAFL4N1PJ1DT>.

④ David Brewster, “Indi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Cooper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2016, pp.59-60.

⑤ “Centre for Bay of Bengal Studies and Embassy of Japan organized ‘The Bay of Bengal as Connectivity Hub in Indo-Pacific Region’ at Independent University Bangladesh,” The Policy Time, March 16th, 2021, <https://thepolicytimes.com/ambassador-ito-and-japanese-experts-spoke-at-a-conference-the-bay-of-bengal-as-connectivity-hub-in-indo-pacific-region/>.

视为海上交通线的重要合作伙伴国,重点加强双边海上安全伙伴关系,近年来进行了双边安全对话、提供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援助、双多边联合军演等一系列海上安全合作活动。

(三)战略层面:对冲中国的战略制衡区

战略层面上,孟加拉湾是日本推行“印太战略”对冲中国的战略制衡地区。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包括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在内的区域内国家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进行着密切的合作。中国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这引起了日本的焦虑与担忧。日本担心中国的地区战略会对日本的地区利益带来相应影响,尤其是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以及中国潜艇停靠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港口之后,日本更是认为海上力量的投射是中国在孟加拉湾等印太地区进行的一种新的军事外交。^①再者,在美国公然推行制衡乃至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可让自己在变化中的印太地区权力结构中有契机谋求符合自己利益的权力布局。作为新兴战略要地的孟加拉湾是印太地区权力结构的缩影,将该地区定位为对冲中国的战略制衡区符合日本的这种战略预期。

因此,日本开始逐渐将其注重东南亚的“亚太外交”转变为注重包括孟加拉湾地区国家在内的“印太战略构想”,在其地区战略版图中将孟加拉湾地区划作对冲制衡中国的战略门户,^②并谋求向该地区国家展示自己可发挥替代中国的作用。除了稳固与印度等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开始有选择地重新定义并加强与该地区具有关键地缘意义的国家的关系,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如,斯里兰卡是日本认为的具有关键地缘意义的国家,日本将斯里兰卡作为其“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国家”。位于南亚东南亚连接点的缅甸在日本的官方表述中被称为推动“印太”战略的“关键国家”。^③位于印度和东盟之间的孟加拉国在其“印太”战略中则被称作区域间的连通性国家。^④

^① David Brewster, “Indi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Cooper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2016, pp.59-60.

^② Sohini Bose, “Forging a strategic ‘Gateway’: The Bay of Bengal and Andaman Sea,” ORF, November 18th, 2020,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forging-strategic-gateway-bay-bengal-andaman-sea/>.

^③ 李益波:《日本全面渗透环孟加拉湾地区:现状、动力与影响》,载《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2期,第91-98、6页。David Brewster, “Indi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Cooper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2016, pp.59-60.

^④ Masahiro Kurita, “Japan’s ‘India-Plu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South Asia,” South Asian Voice, May 14th, 2020,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japans-india-plus-strategic-engagement-with-south-asia/>.

二、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战略实践

正是基于上述对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定位,在“印太战略”的整体战略考量下,日本在战略实践层面从经济和安全两个层面对孟加拉湾地区进行“战略耕耘”。

(一)经济层面: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开发援助两手抓

在战略实践中,日本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开发援助开道,拓展日本在孟加拉湾的资源和市场。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一则体现在日本推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中。该战略旨在塑造一个有利的区域环境,扩大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选择来确保其战略自治,^①并以此促进法治、航行自由和自由贸易;通过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实现繁荣;通过能力建设、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打击海盗等行动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这是实现日本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的三大支柱。^②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是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议题之一。再则体现在日印共同出台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这一计划旨在推动日印携手促进亚洲与非洲的联系,集中关注开发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与制度连通、技能培训与提升以及民间交往伙伴关系四大领域。^③基础设施联通同样是其合作重点。据此,日本在印太地区积极打造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港口、铁路、公路、能源等基建项目。

孟加拉湾作为印太的关键区域,亦是作为日本打造发展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的“样板地”。日本重点打造孟加拉湾地区系列经济走廊,如印度的德里-孟买工业走廊(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工业增长带(Bay of Bengal Industrial Growth Belt)、缅甸的仰光-曼德勒铁路(Yangon-Mandalay Railway)、土瓦特别经济区(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以及连接缅甸、老挝和越南的东西部走廊(East-West Eco-

① Celin Pajon,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Shaping A Hybrid Regional Order,” War on the Rocks, December 12th,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12/japans-indo-pacific-strategy-shaping-a-hybrid-regional-order/>.

② D. Scott, “The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of Jap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 No. 2, 2019, pp.136-161.

③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A Vision Docu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May 2017, pp.8-11, <https://www.eria.org/Asia-Africa-Growth-Corridor-Documents.pdf>.

omic Corridor)、连接越南和柬埔寨的南部走廊(Southern Economic Corridor)等。^①以孟加拉湾工业增长带为例,该建设计划是2014年9月日本提出,旨在利用孟加拉国的经济潜力和地缘战略位置,推进孟加拉的团结统一,整合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资源。^②该计划包括在吉大港和考克斯之间开发一条经济走廊,以及初期投资60亿美元的新深水港口设施建设。^③此外,日本、泰国和缅甸还签署关于共同开发缅甸土瓦经济特区的合作备忘录,日本政府已同意为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土瓦地区发展提供8亿美元的贷款用以进行该基建项目的建设。^④

就政府开发援助而言,日本对这一地区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可追溯至1954年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之后日本开始向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提供战争赔偿(1976年结束),并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供赠款。^⑤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其政府开发援助额在不断增加,其中约有60%的资金流向亚洲,20%流向非洲。^⑥在亚洲内部,东南亚国家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总量最多的地区。近年来,南亚地区国家(尤其是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正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主要目的国(见图3)。2018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金额最多的五个国家中就有三个属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分别是印度、孟加拉和印尼。^⑦这几个国家正是日本经略孟加拉湾地区的关键国家,且排名前两位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南亚国家。其中,自2012年以来日本一直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单一双边援助国,其以日元贷款形式提供的援助

① Kyle Springer, "Implementing the Indo-Pacific: Japan's region building initiatives," Perth USAsia Center, August 2019, p. 10, <https://perthusasia.edu.au/events/past-conferences/defence-forum-2019/2019-indo-pacific-defence-conference-videos/keynotes-and-feature-presentations/put-134-japan-book-web.asp>.

② Akihiko Tanaka, "BIG-B towards Growth beyond Borders", JICA, June 16th, 2014, http://www.jica.go.jp/english/about/president/speech/140616_02.html.

③ Nurul Islam Hasib, "BIG-B 'Centrepiece' of Japanese Cooperation: Abe," BDNews24.com, September 6th, 2014, <http://bdnews24.com/bangladesh/2014/09/06/big-b-centrepiece-of-japanese-cooperation-abe>.

④ "Japan invests in Dawei," The Nation Thailand, December 15th, 2015, <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business/30274933>.

⑤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ASEAN—Connecting to the Future," JICA's World, September 2013, <https://www.jica.go.jp/english/publications/j-world/1309.html>.

⑥ Kyle Springer, "Implementing the Indo-Pacific: Japan's region building initiatives," Perth USAsia Center, August 2019, p.10, <https://perthusasia.edu.au/events/past-conferences/defence-forum-2019/2019-indo-pacific-defence-conference-videos/keynotes-and-feature-presentations/put-134-japan-book-web.asp>.

⑦ "Donor Tracker: Japan," <https://donortracker.org/country/japan>.

总额已达 220 亿美元。^①从这种政府开发援助的倾斜中不难看出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侧重点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到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国家,其试图整合南亚和东南亚战略版图的目的可见一斑,即日本将孟加拉湾视作战略储备区,希望把孟加拉湾、泰国湾和西太平洋联系起来,以推进“印太”战略背景之下的自由开放的孟加拉湾地区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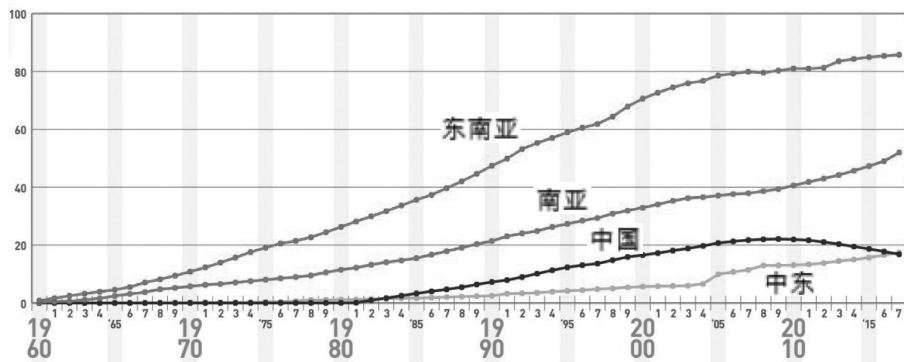


图 3 1960-2017 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情况(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OECD Aid

(二)安全层面: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三步走”

在安全层面的战略实践上,日本在确保其关键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主要有以下三步。^②

其一是利用美国在孟加拉湾地区的战略联盟关系。一直以来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根本上聚焦于与其盟友美国的合作。冷战期间,美日结成同盟关系,美国鼓励日本建设防御力量。随着 1952 年第一份美日安保条约的签署,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海上自卫队(JMSDF)。冷战结束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合作加强印度洋-太平洋西端航道的安全,比如配合美国完成了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阿拉伯海域的水雷清除工作、为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提供了后勤支持等。日本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安全战略实践依赖于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印战略关系密切带动日印安全合作发展。随着美国与孟加拉湾地区大国印度战略接触的扩大,日本也逐渐密切与印度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安全合作。2014 年日印发表了《东京宣

^① “Japan's 41st, largest ever ODA Loan to Bangladesh Signed,” Embassy of in Bangladesh, August 12th, 2020, https://www.bd.emb-japan.go.jp/itpr_ja/11_000001_00171.html.

^② John Bradford, “Southeast Asia: A New Strategic Nexus for Japan's Maritime Strategy,” CIMSEC, September 21st, 2020, <http://cimsec.org/southeast-asia-a-new-strategic-nexus-for-japans-maritime-strategy/45718>.

言》，双方升级了“2+2”安全谈判，将定期举行海上演习机制化，^①也正是从2014年开始日本每年都参加了“马拉巴尔军事演习”(Malabar exercise)。如表1所示，2007年、2009年以及2011年日本作为观察员国间断性地参与美印军演，而到2014年之后日本参与美印的马拉巴尔军演才逐渐机制化、定期化。这与美印关系的逐渐密切不无联系。

表1 2007–2020年马拉巴尔军演情况一览

年份	参与国家	军演地点
2007	美国、日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	孟加拉湾
2008	美国、印度	阿拉伯海
2009	美国、日本、印度	日本近海
2010	美国、印度 印度	西海岸
2011	美国、日本、印度	日本近海
2012	美国、印度	孟加拉湾
2013	美国、印度	印度东海岸
2014	美国、日本、印度	日本近海
2015	美国、日本、印度	孟加拉湾
2016	美国、日本、印度	菲律宾海
2017	美国、日本、印度	孟加拉湾
2018	美国、日本、印度	菲律宾海
2019	美国、日本、印度	日本近海
2020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孟加拉湾；阿拉伯海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二是在孟加拉湾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自2015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频繁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组织联合军事训练或军舰停靠活动。2017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始在包括孟加拉湾地区在内的印太地区长期派遣驱逐舰。^②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日本军事力量就定期在孟加拉湾出现。1991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岸警卫队每年定期举行“Sahyog-Kaijin”联

① “Tokyo Declaration for India–Japan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MEA, India, September 1st, 2014,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3965/Tokyo+Declaration+for+India+Japan+Special+Strategic+and+Global+Partnership>.

② Tomohiko Satake and Ryo Sahashi, “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Vision’ for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Issue 137, 2020, pp.18–35.

合军事演习。^①仅根据2015年4月到2018年6月日本参与孟加拉湾地区军演的不完全数据显示,日本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举行军演次数均为14次,与印度举行12次,与泰国举行7次,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则各1次。^②2008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访问斯里兰卡约70次,成为仅次于印度的斯里兰卡第二大海军访问国,远远超过了中国海军的访问次数。^③2018年9月日本派遣日本海军最大航母级直升机驱逐舰“加贺”号以及主力驱逐舰——“村雨”级驱逐舰“电”访问斯里兰卡,此次访问阵容强大、级别高,外媒称“这是日本为加强与中国争夺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而采取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外交举措。”^④

其三是加强与海上通道沿线伙伴国家的积极关系。2006年安倍上任后不久就推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政策,补充了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优先事项,包括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和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强调促进民主和加强与从北欧延伸至中东、经过印度次大陆和整个东南亚的伙伴国家的能力。^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外务省通过政府开发援助为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近年来,日本的援助范围扩大到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其中,日本已于2018年向孟加拉国捐赠了2艘巡逻艇,并宣布了一项价值3500万澳元的援助计划,还为孟加拉国海岸警卫队提供24艘海岸救援艇。^⑥此外,自2013年以来,日本防卫省还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越南和缅甸等国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和培训,涉及海洋学、搜救、船舶维修和水下医学等海上安全领域。日本海上保安厅还向孟加拉湾国家开展联合培训、人力资源交流和技术支持,以提高其海上安全能力,加强与孟加拉湾海上安全伙伴关系。

① “India, Japan conduct joint exercise”, Deccan Chronicle, January 15th, 2014, <http://www.deccanchronicle.com/140115/news-current-affairs/article/india-japan-conduct-joint-exercise>.

② Kyle Springer, “Implementing the Indo-Pacific: Japan’s region building initiatives,” Perth USAsia Center, August 2019, p. 10, <https://perthusasia.edu.au/events/past-conferences/defence-forum-2019/2019-indo-pacific-defence-conference-videos/keynotes-and-feature-presentations/pt-134-japan-book-web.asp>.

③ “Japan moves in to thwart Chinese ambi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Daily FT, August 25th, 2018, <http://www.ft.lk/columns/Japan-moves-in-to-thwart-Chinese-ambitions-in-the-Indian-Ocean/4-661517>.

④ “The latest trip by Japan’s largest warship is a big message to China,” Reuters, October 1st,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as-chinese-influence-grows-japanese-warship-visits-sri-lanka-2018-10>.

⑤ David Brewster, “Japan is back in the Bay of Bengal,” The Interpreter,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japan-back-bay-bengal>.

⑥ Ibid.

三、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前景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从经济、安全、战略层面对孟加拉湾地区进行战略定位,在经济、安全领域开展战略耕耘,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的特点,即以经济为中心,以安全为扩展,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与安全性。具体来讲,一方面,日本的孟加拉湾地区政策以经济为中心,政府开发援助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并举,赋予经济手段以政治安全性,将传统的发展援助伙伴扩展至战略接触伙伴(Strategic Engagement Partnership)。例如,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背景下,作为日本主要发展伙伴国的斯里兰卡,其在日本的他者角色定位中已扩展至战略安全层面,成为日本的海上安全伙伴国。日本除了增加对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援助之外,还开始将之纳入日本的海上安全建设之中。在赠送舰艇的同时,还让斯里兰卡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2018年日印海上军演。不难看出,日本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扩展行为既有促进地区互联互通、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考量,又有制衡中国的成分。

另一方面,日本以安全为扩展,追求安全合作机制化,以打造孟加拉湾区域安全合作框架。目前,日本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合作模式正从“1+1”的双边模式转向“N+1”的大双边模式,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较为成熟。日本与南亚的安全保障合作模式则主要是“印度+”的双多边模式,亦即主要是与印度进行安全合作,辅以有选择性地与南亚其他国家进行包括军演、海上安全能力建设在内的安全合作。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国家指的是符合印度“邻国优先”外交利益(Neighbour First)的国家,巴基斯坦并不在此列。综上可看出,日本在孟加拉湾地区还未形成一种机制化的区域安全合作框架,更多的是分别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安全合作机制。但从近年来日本政府多次强调孟加拉湾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就加入孟加拉湾的地区组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所做的努力来看,^①日本是希望整合南亚和东南亚的安全对话机制,在孟加拉湾地区扩展其安全议题,搭建孟加拉湾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日本目前在该组织中已由“观察员国”转变为“对话伙伴国”,正积极成为该组织的关键成员国。^②

①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立于1997年,截至目前,成员国有印度、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目前处在从“经济实体”向“安全实体”转型的阶段。参见戴永红、王俭平:《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经济合作倡议:转型与前景》,载《南亚研究季刊》2019年第3期,第90-100页。

② Vindu Mai Chotani, “BIMSTEC and Japan: Exploring prospects for renewed cooperation,” ORF, April 14th, 2018,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bimstec-japan-exploring-prospects-renewed-cooperation>.

在日本推进“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其孟加拉湾地区政策能够得到较好地实施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印度作为孟加拉湾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国家,对日本进入该地区总体上持积极态度。正是受印度邀请,日本早在2014年就积极在印度东北部地区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包括道路兴建、农业援助、林业管理、水利系统的建造等,^①其合作范围还涵盖中国的藏南地区,可见两国合作的密切程度,也印证了双方的“战略默契”。此外,印度还积极推动日本加入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之中。二是孟加拉湾地区国家与日本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多数孟加拉湾地区国家过去都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和直接投资中受益,且地区中力量较小的国家乐于看到在孟加拉湾地区除了存在中国、印度的战略力量外,还有第三个国家加入,形成权力均势。这可谓是小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思维。

除此之外,也要看到日本孟加拉湾地区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最大掣肘,就是日本无法摆脱对美国依赖,无法保持符合自己地区利益的战略独立性。近年来美国开始不断加大对孟加拉湾地区外交、安全方面的投入,试图通过采取离岸平衡战略,保持其优势地位。^②对美国而言,在孟加拉湾地区主要想让日本承担分担责任的角色,并不希望日本脱离自己的控制。另外,当前日本战略优先事项还是强化与美国的安全防务合作,而非凸显自己的独立军事能力。结合美国在该地区对日本的角色定位以及日本目前的实力来看,日本要追求符合自己地区利益的战略独立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此外,孟加拉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几年开始凸显,如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全球变暖、非法捕捞、自然灾害等,在日本未来的孟加拉湾政策中安全治理必然会成为其主要议题之一,然而自身的防务限制能允许日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孟加拉湾安全治理仍是问题。

尽管如此,随着孟加拉湾地区自身的发展潜力以及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日本会在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下,进一步增强在孟加拉湾地区的经济、军事力量存在,以提升其地区影响力。面对前文所述这些有利条件和掣肘因素,未来日本该如何协调自己的孟加拉湾地区政策,因势利导,追求自己的地区利益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张 婷,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

① Ankit Panda, “India Invites Japan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 in Its Northeast,” The Diplomat, February 1st,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2/india-invites-japan-to-develop-infrastructure-in-its-northeast/>.

② 李益波:《美国强化环孟加拉湾地区政策:措施、动因及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第41-53页。

安倍政府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困境： 基于生产结构性权力的视角

张宇婷

内容提要 东亚经济一体化在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里程碑式成果——签订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表明经济自由和开放仍然是亚太经济发展的主流。安倍执政期间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但生产结构性权力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影响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区域制度秩序。日本作为依靠出口导向和海外投资建立优势生产权力的经济大国,在此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境。由于安全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驱动不足削弱了生产权力比较优势的作用,而安全、金融、知识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权力的相互作用降低了日本推动自由贸易谈判的能力,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 结构性权力 安倍经济学 东亚经济一体化 RCEP 困境

引言

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涵盖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十国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诞生。RCEP是由东盟发起并主导,自2012年以来历经31轮正式谈判、1.4万余项文本法律审核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①它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竞争、政府采购等多项内容,其开放水平和自由化程度远高于WTO,其签署标志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日

^① 《RCEP: 逆势建“群”, 自贸伙伴“扩容”》, 新华社,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11/23/c_1126773943.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日)

本、韩国三个东亚大国继 WTO 之后首次纳入同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表明在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的形势下,经济自由和开放仍然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主流。

日本是自由贸易和东亚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2010 年,日本出台《国家战略发展方针》,将促进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合作纳入对外战略目标,致力于提升区域和全球的经济自由化水平。除 RCEP 谈判外,日本还积极参与 CPTPP、APEC 等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将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

2020 年 RCEP 谈判经过八年长跑终于签署完成,进入审批阶段,但日本希望的印度最终没有加入。日本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长居资本主义第二大经济国(除欧盟外),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实力雄厚,在美国、欧盟只能以域外势力施加间接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实力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经济强国日本推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区域(如北美地区、欧洲地区)。

本文试图从结构性权力理论中的生产结构性权力视角剖析经济强国日本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困境所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国家与市场》一书中提出“结构性权力”这一概念。结构性权力指的是一国不依靠强制力,而是依靠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对另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施加影响的权力。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中,结构性权力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在这四个结构基础上,还衍生出四个次级权力结构——运输结构、贸易结构、能源结构和福利结构。八种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共同构成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而行为体则受到结构的影响。^①

现有的中文文献多是从美国政策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东亚一体化的意义和可行性路径三个角度展开讨论。刘建江、王英英等学者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和政策入手,分析日本在美国影响下对东亚一体化进程起到的作用。^②还有研究从中国、日本、东盟中的两方或三方角度研究上述行为体间的关系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路径和政策建议。张玉来认为,日本和中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两个核心,应当在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中加强关联和紧密互惠关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3 页。

② 刘建江,李曼,袁冬梅:《美国干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因与举措——基于复合相互依赖视角》,载《当代经济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61-66 页;王英英:《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主导权问题》,《亚太经济》,2012 年第 4 期,第 3-6 页。

系,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①该研究肯定了生产结构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突破口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慢、程度低的现实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中日经济关系的变化会导致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反复,区域一体化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小范围开始逐步扩大。^②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肯定了东亚一体化对中国、日本、东盟国家的积极意义,并看好对东亚一体化的前景。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谢晓光提出东亚一体化合作的困境来自内部国家间“冷战经热”的二元分离结构,欧盟经验表明区域共同体的出现离不开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等相互依存的安全保障体系。^③文章强调了多元机制合作对东亚一体化的重要性,但并未明确指明其路径。此外彭述华认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内部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如国情差异、不对称相互依存、民族主义观念、“安全困境”、日本的消极态度等,其中安全和政治因素影响最大,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国家矛盾上述表象原因背后的根本原因。

国外学者将东亚一体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区域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模式缺陷、大国竞争、日本领导力下降等方面。安倍政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颇丰。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欧洲和东亚的一体化条件,提出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缺陷和外在势力干扰。^④一些学者则具体分析了日本和东亚国家的发展特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和阻碍。炳俊安(Byung Joon Ahn)指出,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阻碍了自由贸易谈判中的一体化进程。^⑤马克·比森(Mark Beeson)认为日本建立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合适的路径和模式。^⑥彼得·卡森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也提出,日本模式对东

① 张玉来:《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东亚——中日合作的空间与潜力》,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3期,第40页。

② 郑有国、高文博:《中日经济关系的转变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5期,第16页。

③ 谢晓光、杨玉霞:《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与方向: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128页。

④ Woosik Moon, *Regional Integration - Europe and Asia Compar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⑤ Byung-Joon Ah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2, 2004, p.18.

⑥ Mark Beeson,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A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Experiences,” *Asian Perspective*, Vol. 33, No. 2, 2009, p.5.

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一体化产生了模式限制的影响。^①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将东亚一体化面临困境的原因归结于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域外大国干预、中日关系、体制竞争等较为宏观的因素,鲜有从日本政策角度入手探寻东亚经济一体化困境的研究,且对事实的梳理和行为体间关系的论述缺乏理论支撑。随着 RCEP 签署,东亚地区涵盖范围最广的自由贸易区诞生,研究关键行为体在东亚深化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必要性。本文采用政策分析与结构性权力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梳理安倍时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 RCEP 的谈判历程为主)和安倍政府政策的基础上,从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四个角度分析日本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困境所在,并从中得出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合作的有启发性的经验和建议。

一、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时,日本已经经过了十余年总量庞大、增速缓慢的经济发展期。安倍上台后,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行钞票,增加货币流动性,人为创造通胀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在上述政策刺激下,日元在两个月内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 8.4%。^②2013 年 1 月,安倍在国会通过了高达 1170 亿美元的政府投资议案,此时日本的政府负债水平已经高达 200%,高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从 2012 年 12 月安倍上台到 2019 年 4 月,日本经历了长达六年的经济扩张期。时任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在 2019 年 1 月的内阁会议上汇报经济状况时指明“从 2012 年 12 月开始的本次经济扩张期截止本月已达 74 个月,可以认为是二战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

在短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基础上,安倍政府提出了经济结构性改革计划。安倍政府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分为投资、人才竞争、培育新市场和经济开放度四大领域,每个领域内分别设置了具体改革内容,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结构分布。^④如在投资领域,安倍政府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

② 《日股再度暴跌 5.15%》, 人民网, 2013 年 5 月 31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531/c70846-21686438.html>.

③ 「月例経済報告等に関する関係閣僚会議議事要旨」、日本内閣府、2019 年 1 月 29 日、<https://www5.cao.go.jp/keizai3/getsurei/2019/01gijiyoshi.pdf>.

④ 陈友骏:《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载《日本学刊》2015 年第 2 期,第 80 页。

鼓励外资进一步进入日本市场,扩大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的地区性海外投资;在人才竞争和新市场领域,安倍政府召开“人才培育促进会议”,加快制定和实施重点战略领域,并拓展具有成长潜力的海外市场。^①其中,日本十分重视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有意在亚太框架内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地位,^②和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形成良性互动。

与国内经济改革措施相呼应,安倍在国际层面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即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扩大与全球范围内国家的经济合作。2014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将这一战略上升为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理念。对日本而言,对外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自由贸易框架内对国内经济利益集团施加压力,有助于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成功。2016年出台的《日本复兴战略》提出日本要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核心的目标。^③2016年底,日本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签署完成,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宣告建立。到2020年,安倍政府先后和欧洲、亚太、东亚国家签订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主要国家中区域经济合作协议签署最多的国家。

表1 日本、美国、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2020年12月)

区域	FTA/EPA	双边 FTA
日本	东盟, TPP, 欧盟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文莱, 越南, 澳大利亚
美国	美加墨 FTA; 北美自贸区	新加坡, 秘鲁, 澳大利亚, 智利, 韩国
中国	东盟	韩国, 新西兰, 新加坡

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

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谈判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2010年,日本便与东盟签署了“10+1”自由贸易协定。2017年以前,日本追随美国,将东亚一体化的机制锁定在TPP,然而2017年美国退出,日本重新提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日本转而推动RCEP的谈判,但2019年底,莫迪政

① 「日本再興戦略 2016 これまでの成果と今後の取組」、日本内閣府、2016年6月、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2016saikou_torikumi.pdf。

② 陈友骏:《“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新理念的产生、引入与效果评估》,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第94页。

③ 「日本再興戦略 2016 第4次産業革命に向けて」、日本内閣府、2016年。

府迫于国内压力宣布退出 RCEP,日本非常希望印度加入,但经过数月的努力依旧无果。总的来说,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诸多阻碍。

二、日本在东亚的生产结构性权力现状

(一)“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基础上的生产结构性权力

在四种结构性权力横向对比中,日本的生产结构性权力相对是最强大的,日本一直希望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大国”等其他目标。

学界也肯定了生产在政治经济秩序变动中的重要性。斯特兰奇认为,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社会中的权力中心与生产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权力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的手里。^② 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生产实力视为霸权最重要、最根本的权力。^③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性权力是首要的。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活动是其他重要的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④ 生产的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动员的社会力量是霸权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经济被嵌入到霸权国主导的、生产过程中建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则之中。因此,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切入视角有助于厘清日本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优势和困境所在。

生产结构性权力指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包括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生产等。^⑤ 日本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呈现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特点,其中东亚地区是日本出口和海外投资的第一大地区,对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口超过总出口的 50%,在东亚地区的海外投资占总投资的 40%以上。^⑥ 此外,日本还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第三大进口国。^⑦ 因此,日本在东亚地区拥有强大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在出口和投资两辆马车的拉动下,日本和东亚国家建立了高程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2017 年日本内阁府的调查表明,出口对

① 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 68 页。

② 同上,第 96 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年年版,第 391 页。

④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3.

⑤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8 页。

⑥ “Japan Exports by Country,”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japan/exports-by-country>, 2020-12-28.

⑦ “External Trade Statistics,” ASEAN, https://asean.org/?static_post=external-trade-statistics-3.

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越来越大。^①

表 2 各国所处全球分工体系位置

上游	中上游	中下游	下游
瑞士	比利时	中国	墨西哥
日本	爱尔兰	葡萄牙	希腊
芬兰	奥地利	葡萄牙	波兰
荷兰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
瑞典	法国	印度	匈牙利
美国	韩国	巴西	克罗地亚

资料来源:整理自张会清:《主要货币汇率非对称变动对贸易的影响——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4期,第145页。

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结构性权力来源于战后中长期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漫长的历史积累。自“轻军事、重经济”的吉田路线以来,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日本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②二战后日本依靠美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朝鲜战争中日本通过提供战争物资实现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接下来的二十余年日本国内则迅速发展工业化经济。相比东亚其他国家,日本进入全球市场的时间早,具有先发优势。斯特兰奇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生产结构逐渐打破本国的界限,在为全球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先行者比后者拥有巨大的、部分是幸运的优势。^③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超越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日本开始积极扩展海外市场,向全球出口商品,并向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进行对外援助。在国家援助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日本逐渐完成了工业化经济的产业升级换代,也形成了以出口导向和海外投资拉动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80年代,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超过美国,引起美国不安。美产生经济摩擦之后,日本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改革的脚步。^④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迅速升值,直到引发泡沫经济全面崩溃,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

① 「日本经济 2017-2018」、日本内閣府、2017 年 1 月 18 日、http://www5caogojp/keizai3/2017/0118nk/pdf/n17_1_1pdf。

② 张永涛、杨卫东:《日本主导 CPTPP 的动机及我国的对策分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19 年第 39 期,第 14 页。

③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第 86 页。

④ 樊勇明、贺平:《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载《现代日本经济》2009 年第 1 期,第 25 页。

低速发展恢复期。虽然 GDP 增长速度缓慢,但日本仍旧是除美国、欧盟外资本主义第三大经济体,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人均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三。总的来说,日本具有较明显的经济实力优势,尤其在东亚地区,日本是进入全球市场最早、全球化程度最高、产业升级换代次数最多的国家,因此可以说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产权力体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二)安倍政府的生产结构性改革与东亚一体化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中的短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经济刺激效果,但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是缓慢的。斯特兰奇指出,20 世纪美国建立全球性生产霸权的两个重要前提是,其他国家默许美国担任“领头羊”的角色和美国国内经历了经济政策自由化改革,其国内经济政策和市场是自由开放、竞争充分的。安倍政府的结构性改革表明日本经济存在自由竞争度不足、市场开放度低和产业政策保守三大问题。

其一,日本国内的市场寡头竞争度高、自由竞争度低,导致日本民间投资的低迷。因此促进民间投资是安倍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区域经济价值链中处于优势和核心地位的日本产业基本由国内大财团及其子公司、关联企业控制,如半导体、汽车、新能源等产业,政府依赖传统的利益集团来推动核心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其二,日本国内的外资开放度低,本国市场封闭,这一点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诟病。通产省/经产省对资本自由化采取拖延策略,严格限制合资企业的股份比例。安倍希望通过多边贸易协定作为切入口,改善外资在日本的投资环境,同时通过外部竞争的引入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优化。^①但这一改革举措没有赋予政府在相关改革政策上的绝对主导力,也没有隔绝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未能建立起完全由市场来协调国内经济资源的调拨与分配、并由市场来决定相关产品及服务定价和利润分配的运作体系。因此,日本的资本市场仍处于低自由度水平,且改革步履困难。

其三,日本对部分产业实施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前,日本主要通过价格支持保护农业;90 年代后,日本通过发放农业补贴、控制关税税率,并通过农业补贴、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的运用免于减让 WTO 制定的承诺。在签署的 RCEP 条款中,日本破例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做出了较高水平的关税减让承诺,显示了日本逐步开放原保护产业的积极信号。但总的来说农林水产品进口的关税撤销率并不高,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类五类重点农产品免于开放,同时协定的减税过渡期长达 11-20 年。^②

① 陈友骏:《论“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第 86 页。

② 《RCEP 对日本意义非同寻常》,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9/content_5562466.html。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拥有部分优势的生产结构性权力,但仍然存在国内经济政策自由度不高、市场开放度有限等限制生产权力发展的问题,安倍的改革方向总体符合了扩大区域生产结构性权力、促进东亚一体化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主要举措停留在粗浅的框架倡议阶段,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经济改革效果和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强化,市场自由度和产业政策等议题的谈判冲突导致了东亚一体化发展缓慢。

三、日本生产结构性权力与其他权力的互动

(一)生产性权力的扩张受到其他权力影响

1、安全结构调整增加了生产结构的不稳定

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三个主要价值观——财富、平等和自由——相比较,安全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安全结构不仅影响个人、公司企业和国家间的安全分配,还影响到制度和安全在区域事务中的重要性位次。^①

日本是东亚安全结构的重要提供者和需求者。自日本确立“吉田路线”以来,日本以部分的国家自主权换取美国提供的国家安全保障。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公布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取代自1957年开始实施的《国防基本方针》。^②新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坚持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追求日本和美国地位的对等和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在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安倍政府强调了“统合机动防卫力”和“岛屿防卫”的建设,破例大幅增加军费,更新海空军设备,加强两栖战斗力和建设和自卫队作战效率提升。^③

日本安全军事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其在东亚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安倍政府寻求扩大自主承担的安全保障范围,为此增加军费支出、购置先进武器、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在国内造成了巨额的政府债务,挤占了本就有限的用于经济建设的生产资源,另一方面在东亚引起区域安全局势紧张,安全争端损害了区域贸易关系。2017年,特朗普公开要求日本提高承担驻日美军的军费比例,并要求日本按照特定价格购进美国先进的武器。日本军费支出连续七年呈增长趋势,2020年军费预算达到了创纪录的5.32万亿日元。^④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第49页。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日本内閣府、<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③ 张望:《东亚安全结构中的日本及其战略选择》,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69页。

④ “JAPAN military seeks eighth straight spending hike”, Indo-Pacific Defense Forum, <https://ipdefenseforum.com>。

总之,日本增加自主安全结构供给的一系列战略和举措改变着原有的地区安全结构,给周边国家(中国、韩国、东盟国家)带来不安全感,削弱了周边国家对日本的政治信任和经济生产合作意愿,引发了生产结构的不稳定。

2、金融结构削弱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影响

金融结构指的是由政府 and 银行分享的建立信贷的权力和由政府政策和市场共同决定的货币汇率关系。^①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金融权力通过广袤的贸易投资网络和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关系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塑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日本通过金融信贷在东亚地区建立了庞大的信用体系。日本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安倍上台后增加了对东盟民主化转型国家的日元贷款。2014 年日本分别向缅甸和柬埔寨提供了 260 亿、192 亿日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2015 年,日本政府提出在 2020 年之前达到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额超过 1000 亿美元的目标。日本规模庞大、运作成熟的信贷体系为日本的贸易活动和海外投资直接注入了资金和流动性,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区域生产结构性权力。

然而日本金融权力的短板在于货币体系。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国家发展银行贷款和汇率政策推动日元取代美元成为东亚地区首要的流通货币,但这一举措遭到了美国的极力反对,最终没有成功。2020 年第二季度的进出口数据中,日元结算的比重仅有 5.7%,美元结算比重高达 61.2%。^②2012 年安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日元一路贬值,但



图 1 美元 - 日元汇率变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第 96 页。

② 《国际支付比例美元稳居第一》,南生经济网, https://www.360kuai.com/pc/9b5edff0d9da11414?cota=3&kuai_so=1&sign=360_7bc3b157。

2016 年美联储一宣布降息,日元汇率立马反弹 50%,由此可见日本的金融货币权力抵御全球货币风险的能力并不强健。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性和国家间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安倍政府的金融改革效果不如预期,且无法长期稳定地为贸易和海外投资提供增长动力。

更糟糕的是,安倍政府的金融举措会引发其他国家不安全感的上升,可能导致汇率恶性竞争的货币战争。^①总的来说,在美元霸权的金融体系下,日本在东亚地区金融信贷权力的优势和货币权力的劣势削弱了日本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和实践进程。

3、知识结构对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多重影响

技术和价值观是知识结构的两大内容。在技术方面,安倍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2016 年日本内阁发布的《日本复兴战略》中明确表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日本在上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了发展制高点,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力量,但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安倍政府对日本国内的创新动力有所担忧。安倍政府提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结构性改革目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及结构升级。安倍政府选择氢能源汽车、iPS 细胞、机器人三大领域作为推进日本整体产业升级的主攻对象,并希望借助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及重大技术突破,对其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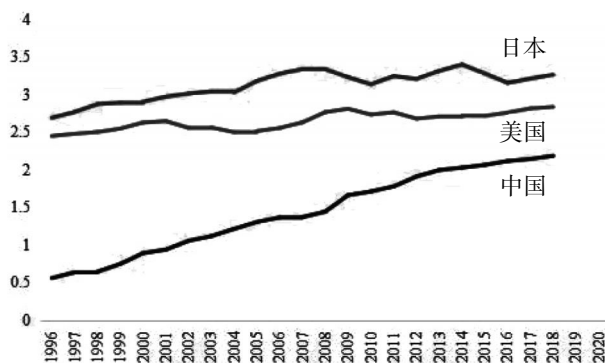


图2 各国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价值观方面,安倍政府提出了价值观外交。在东盟国家内部,日本“自由与繁荣”的设想符合了一些国家民主化转型的价值追求,比如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价值观的宣传成为

^① 蔡怡竑:《十字路口上的东亚区域整合:竞争还是合作?》,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4 页。

日本软实力的一部分,树立了良好的日本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比如,日本政府和企业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积极参与东道国当地的环保、人权组织活动,保证了项目顺利推进,进一步扩大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生产结构性权力。然而在民族信仰的旗号下,安倍多次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中韩政府和民众的抗议,两国的贸易和市场交流由此受到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外交宣称支持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从东南亚到中亚形成一条包围中国的弧线,多次以此为名和周边国家开展军事演习,引发中方的警惕和军事回应。导致区域安全结构的不稳定。东盟国家有“小国领导”的观念传统,因而日本在东南亚联合“自由价值”国家设计的包围圈路线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秩序必然与此发生观念冲突,从而使得技术权力无法与价值权力完全结合,进而对经济秩序的变动发挥积极的显著作用。

基于上述科学技术的相对竞争力减弱、价值观外交的复杂后果,东亚国家不希望形成由日本领导建立区域经济秩序的共识。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性权力唯有和价值结构性权力相结合,形成强大的知识结构性权利,才拥有改变政治经济秩序的力量。^①日本的技术结构性权力和价值权力没有为区域生产结构性权力的构建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生产结构性权力影响其他权力

四种结构性权力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生产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家的能力和负责的变化。生产结构的国际化带来的两个问题是国家财政问题的复杂化和国家承担风险的功能变化。^②前者表现为一国乃至一个区域金融安全和稳定的能力,后者表现为一国在国际冲突和危机事件中的政治稳定能力。

日本强大的生产结构为国内的金融市场和亚洲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奠定了基础。金融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在区域表现的差异源于各国的社会生产结构差异。日本的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表现为高品质、高附加值,且以第二、第三产业产品为主,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海外投资企业的支持提升了日本金融权力的稳健性。2016年,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00%,是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日本政府的信用评级依然是A级,正是生产结构为金融结构的稳定提供了支持和动力。

生产结构性权力的强大提升了日本抵御国家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降低了区域军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第136页。

② 同上,第89页。

事安全冲突的风险。在东亚,“安全”对于“财富”而言始终居于价值上位序列,处于主权冲突之中的国家安全仍然是区域主要议题,也是阻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大国”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基础上的,生产结构的全球化能够减少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和烈度。诚然,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生产贸易联系和发展援助贷款增加了区域内部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部分化解了由于历史问题和安全问题引发的双边不信任和关系紧张;在与中国、韩国就领土问题发生冲突时,双边依旧保持“政冷经热”的现状,民间交流的繁荣促进了军事冲突的缓解,降低了危机事件的社会负面影响。

虽然生产结构的强大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政治安全冲突带来的国家关系风险,但日本与各国建立的生产权力依赖关系对区域安全供给能力的转化程度是有限的。日本仍处于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突破和走向“普通国家”的道路上,在经济大国基础上设立的“政治大国”目标遭到了来自现实的诸多挑战和阻碍。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全球化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优势逐渐出现,开始对日本依靠海外投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比较优势建立的生产性权力产生威胁,“雁型模式”的式微对日本建立可持续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发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四、日本面临的困境和以及中国的应对

安倍执政期间,东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曲折的谈判进程,并取得了初步的积极成果。安倍政府政策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互动、日本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过程也显示了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合作中个体国家困境的来源和结构性矛盾所在。

第一,日本生产结构性权力的优势正在面临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依靠出口和海外投资建立的比较经济优势地位受到威胁,从而导致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实力不足。日本高度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和经济对外依赖强使其在安全政策、谈判中受到限制。此外,日本安全结构的调整和与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安全冲突极大增加了日本生产结构的不稳定,限制了日本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和实力。

第二,日本国内政策自由度有限,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制度的溢出影响有限。不利于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本作为区域经济大国,其保守的经济政策极大限制了区域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化的进程,也损害了东亚国家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信心和制度基础。在日本的优势产业条款谈判中,日本提出的严格保护政策难以为其他国家接受。

第三,日本金融货币权力的和生产权力的不匹配限制了国内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安全、贸易和投资关系受到美元霸权体系的影响,从而限制了日本依照自主意愿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四,日本跟随美国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价值观构想体现的霸权思维与东盟国家的“小国领导”传统发生冲突,使得东亚国家对于日本领导建立区域经济秩序的共识度进一步下降。

第五,安倍政府短视的经济政策对建立可持续的、长期稳定的生产结构性权力产生了阻碍,损害了东亚国家对日本经济带头的信心。安倍政府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提振了日本经济景气,但依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的举措引发了周边国家不满,也损害了汇率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在区域经济整体疲软、动力不足的发展阶段,日本“独善其身”的经济政策和表态不利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重要经济体,两国在努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相似的情景和困境。因此,在分析日本在推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困境基础上,可以对我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东亚经济向着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和建设高质量自贸区发展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驱动的生产性权力建设,提升在国际化生产和市场竞争中的技术优势,利用技术和传统生产优势促进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可持续地提升中国的生产实力和结构性权力。

第二,推动对话、调解等和平方式解决双边和多边政治安全问题,构建各国共识基础上的有效冲突解决安全机制,提升对区域安全结构性权力的供给能力。

第三,重视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建设货币的区域影响力,深化人民币在进出口、海外投资、业务结算等场景的国际化运用。发挥货币体系在生产结构中的“杠杆”作用,从而提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综合结构性权力。

第四,循序渐进,发挥东盟的“小国领导”中心地位。尊重东盟的“小国领导”传统,肯定东盟模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打破西方霸权秩序下的固有思维,稳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

第五,稳步推进国内经济政策中在进出口和投资领域的自由度和开放度,提升制度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为制度效应的区域外溢做准备。

结 语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二十一世纪 10 年代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为经济自由和市场开放的经济潮流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发展相对缓慢的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东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地区内部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各异、水平差异大,既有日本、新加坡等经济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也有柬埔寨、老挝等挣扎在贫困线的“极不发达国家”,还有像中国、印度尼西亚等经济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和发展有利于各国优势互补、共享发展,长远来看符合区域和各国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日本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强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日本依靠自身在经济生产方面的优势,努力推动区域内外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和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生产在结构性权力框架中的不足限制了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进展。日本面临的困境来源于处于下降趋势的生产权力比较优势和国内经济制度自由度的不足。此外,日本在安全结构中的角色调整在生产资源和安全争端两个方面降低了日本在区域内的生产影响力,降低了其推动自由贸易谈判的实力。

在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主要潮流的当今世界,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加重要。其中生产结构性权力是根本且重要的,生产结构性权力作用和反作用于安全、金融、知识三大权力,并共同构成一国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结构性权力总和。结构性权力视角下日本面临的多重困境既揭示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缓慢、处于中低水平的原因,也说明了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东亚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实践应当在充分认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困境的基础上,努力解决与主要国家间基于主权和安全问题争端,增强政治互信;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增强安全结构性权力;重视市场规则、制度协调合作,降低对自发的市场合作机制的依赖性,增强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结构性权力,寻找和建立广泛的区域思想共识,提升国家在区域经济秩序构建中的能力和话语权。

(张宇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占领期神道的改造与战后政教关系的确立^{*}

——从《神道指令》到战后宪法

王子铭

内容提要 占领期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动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使日本建立起世俗政治体制。战前基于美国学者丹尼尔·豪彤等人对国家神道的认识,盟军总司令部将它视为天皇崇拜与原始神道的扭曲结合,为极端的国家主义提供精神动力。为了防范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再次威胁,占领军制定《神道指令》,使国家神道解体,根除军国主义的“精神武装”,神道丧失“国教”地位成为普通宗教。《神道指令》与战后宪法一道确立了国家与宗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奠定了战后日本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该原则旨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建立彻底的世俗国家,但是它不同于一般政治学上的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政教分离模式,而是在公立机构与活动中排除一切宗教元素。由此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尽管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针对所有宗教而设立,但神道被区别对待,限制更为苛刻;另一方面,该原则因复杂的现实环境而产生如公立学校能否组织寺社旅行等种种疑难,后被证明难以严格执行。

关键词 《神道指令》 战后宪法 完全的政教分离 国家神道

2019年平成天皇明仁退位,新天皇德仁即位,“大尝祭”“剑玺渡御”“即位礼正殿仪”等一系列天皇换代仪式陆续进行。其中“大尝祭”作为皇室祭祀是“皇室行事”,而“剑玺渡御”与“即位礼正殿仪”则是宪法与《皇室典范》规定的“国事行为”。但看似合规的仪式引起了日本学界不小的争议,日本历史界四个学会联合发布声明反对即位之礼与“大尝祭”,^①理由是作

^{*} 本文初稿曾于2020年“中国宗教法治高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上宣读,感谢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教。文责自负。

^① 四协会为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

为“国事行为”的“剑玺渡御”与“即位礼正殿仪”明显具有神道神话色彩,^①而作为“皇室行事”的“大尝祭”费用却是由宫廷费这一公费承担,二者皆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要理解天皇即位仪式为什么会受到学界的责难,学界为什么会执着于近乎苛刻的政教分离原则,必须回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占领时期,探究战后日本的政教关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自1868年明治新政府颁布《神佛判然令》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经过一系列机构创设与宣教运动,神道与日本国家权力结合,演变成为具有国教性质的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一词由宗教学者加藤玄智最早提出,但并非战前普遍使用的词汇。^②学界对它存在两种定义方式。其狭义定义是“国家管理下的神社及其集合体”。这种定义方式将国体论与皇室祭祀排除在外;另一种是广义的:“国家神道是把皇室祭祀和以伊势神宫为顶点的神社及神祇信仰放到非常高的位置上,把继承神的系谱的天皇神圣化,保护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信仰与实践体系。”^③国家神道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后来卷入到日本民族主义运动与对外扩张之中,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的精神动力。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团签署《日本投降书》,同盟国正式开始了对日本长达七年的军事占领,占领当局的诸机构随即成立。引人注目的是,驻日盟军总司令(SCAP)并没有将宗教事务作为内政问题交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理,^④而是成立了隶属于民间情报与教育组的宗教科专司宗教事务,该科的主要工作是促进宗教自由,废除日本原有的政教关系。很快《神道指令》颁布,国家神道解体,一种被称为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的新型政教关系被建立起来。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我们不禁会问,SCAP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日本的宗教问题?SCAP是如何认识神道并对其予以改造的?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态是怎样的?它是如何被确立的?本文将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① 日本神道分为神社神道与教派神道,其中神社神道在明治维新之后至1945年之前指国家神道,在1945年之后指以神社为中心的由神祇崇敬者组织的进行仪式礼仪、信仰的宗教形态,亦是狭义上的神道,与幕末、明治时代出现的以天理教为代表的神道系教派团体相区别,后者称为教派神道。本文如无特别说明,神道皆指神社神道。

② 深作安文『加藤玄智博士の「神道の宗教発達史的研究」を読む』、『日本論理と日本精神』、目黒書店、1937年、307-314頁。

③ 岛藎进:《国家神道与日本人》,李建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页。

④ 驻日盟军总司令或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是盟军对日本占领期间日本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英文为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缩写SCAP,日本又称之为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缩写GHQ,本文如无说明,皆使用SCAP。

一、SCAP 宗教政策的目的及认识

(一) 宗教政策的目的

二战后期,日本利用神风特攻队发起玉碎战,攻击太平洋战场各地区的同盟国军队,尽管并未扭转战局,但给予了同盟国军队极大的精神冲击。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美国国务院与陆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制定了《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①其中明确提到 SCAP 占领的终极目的包括两项:

1. 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 最终建立一个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它能够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美国目标的《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美国希望这个政府应该尽可能遵守民主自治原则,但是联合国不主张强求日本采取不为自由的国民之意见所支持的任何政治形态。^②

占领时期的政策设计名义上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目标展开的。美方认为为了达成清除日本的威胁这一目标,必须使日本全面放弃扩张主义的政策,扫除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的信仰与实践。日本的威胁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军事力量的威胁,战争结束后美国立即采取解除陆海军武装,复员军人,封锁、破坏军事设施,废除陆海军省、参谋本部等军事机关等等去军事化的政策。同时展开审判战犯、修改宪法、解体财阀、改革农地、设立劳动者保护法等等政治、经济民主化政策,以在物质、制度层面上彻底根除军事威胁滋生的土壤。但在另一层面上,美方认为日本人的精神和文化基础支撑着上述威胁性的制度与组织,因此必须制定严格的政策来解除日本人的“精神武装”。国家神道被看作是上述“精神武装”的核心与源泉。

(二) SCAP 对宗教政策的认识

事实上,1945 年前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神道的了解非常之少,以至于 SCAP 在政策制定时能运用的材料不多。美国的神道学者丹尼尔·豪彤(Daniel D. Holtom)算是西方少数神道方面的专家,他明治末年来日,师从宗教学者加藤玄智研究古神道,后转向神道的民族主义研究。他曾出版《日本的国家信仰——现代神道的研究》和《现代日本与神道国家主义》(该书 1943 年出版前 6 章,8 章的完整版于 1947 年出版)两本书,他将神道与国家主义、帝国

^① 国务院与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 SWNCC 是美国于 1944 年 12 月设立的处理战后对轴心国进行占领相关的军事内政事务的部门。

^② Politico-Military Problems in the Far East: United States Initial Post-Defeat Policy Relating to Japan, August 11th, 1945, SWNCC 150/1, ndljp/pid/9898810,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神道原来是一个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礼拜仪式,但被军国主义者扭曲滥用,他同时把狂热的爱国主义与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归结为神道的作用。^① SCAP原本想要请他来日本参与政策制定,因为健康原因未能成行。但他仍然给SCAP一份意见书,该文件由文部省、教科书的修改、天皇、神社与仪式、神社与神职的管理五部分组成。他要求对教职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对文部省进行监督;对神话的、非历史的教科书进行修改;对神格天皇观进行修改,废止对天皇相片(御真影)和《教育敕语》的奉戴仪式,对天皇与国家国民的关系进行彻底改革;停止强制或半强制的神社和神道仪式的参拜;减少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神社与神职的支持等。这些意见清楚地说明了如何解除日本人的“精神武装”,它对包括《神道指令》在内的SCAP发布的诸教育指令,及天皇宣布放弃神格的《人间宣言》的制定影响巨大。^②

尽管西方学界对神道了解不多,但美国很早就开始对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宗教问题做准备。1942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成立了作为总统咨询机构的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开始研究战后的对日政策。委员会中的知日派与强硬派之间对于天皇制的存留存在极大的争议,但都认为日本的侵略思想和天皇崇拜、神道与军国主义的扭曲结合密切相关。1944年1月作为政策咨询委员会后身的战后计划委员会(Committee on Post-War Programs,简称PWC)成立,开始研究长期的对日战后占领政策,它在同年3月发布《基本目标》《信教的自由》和《天皇制》三份与宗教政策相关的文件,为占领期间的宗教政策制定与实施勾画出基本蓝图。

其中《信教的自由》文件涉及神道与信仰自由的问题。^③ 该文件首先设定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一种宗教的神道与极端的国家主义间的区分非常困难,占领军在日本是否应该允许信教的自由呢?对于该问题,文件首先表明同盟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表明战后政策要遵循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6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扬的四大自由原则。^④ 该文件提出:“为了煽动近来狂热的爱国主义和侵略主义情绪,军国主义者将国家主义的天皇崇拜

① cf. Douglas G. Haring, “Daniel Clarence Holtom 1884–1962,”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5, No. 4, 1963, pp.892–893.

② cf. H. Hardacre, *Shinto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4–135;参见:大原康男『国家と宗教の間—政教分離の理想と現実』、日本教文社、1989年、14–15頁。

③ Japan: Freedom of Worship, March 15th, 1944, PWC-115, CAC-117, 1944, Vol. V, pp.1207–1208, in FRUS, Qtd.<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4v05/d1191>.(登录时间:2020年1月1日)

④ 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四项原则后被写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信仰(cult)嫁接至本来无害的具有泛灵论信仰的古神道(original Shinto)之上。”从而将神道划分为两个侧面，强调了区分古神道与作为极度好战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礼仪的国家神道两者之间差别的必要性。两者间的混乱使用，产生了对于天皇制的误解。

确认这一基本认识后，文件将日本全国大约 10 万个神社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起源于古代，祭祀地域社会守护神的神社，它是严格意义上具有宗教性质的神社，在数量上占绝大部分；第二类是两三个如同伊势神宫一样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这些神社起源于古代，不过是作为国家主义的象征而存在的；第三类是如同靖国神社、明治神宫、乃木神社、东乡神社等近年来为了祭祀国家的“英雄”而建立起来的神社，此类神社不是宗教崇拜的场所，而是鼓舞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国家主义的神社。^①对三类神社的处理意见也不相同，对于第一类神社允许继续存在；第二类原则上认可存在，但若有必要会进行封锁；对于第三类神社，文件认为它们是促使日本进行扩张的军国主义的思想装置，应该予以铲除，但是如果也将其视作宗教的话，那么强制的废除就是盟军利用政治权力对信仰自由原则的践踏。不过日本政府反复强调国家神道并非宗教，而是道德传统与爱国实践，那么将其封锁也就并非是对信仰自由原则的侵犯了，这无疑是对战前日本政府宣扬的“神道非宗教论”的极大讽刺。^②

文件又提到要谨慎地实施相关的政策，因为强制关闭国家主义的神社可能会招致 SCAP 所不希望的负面效果。需要禁止在这类神社中举行游行示威、集会、仪式；解雇除设施必要的管理人员之外的官国币社的人员；同时国家应该停止对他们的经济支持。不过在不违反公共秩序与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这类神社也可以作为个人信仰的对象继续存在。^③该项建议实际上既涉及到保障个人信仰自由的原则，又期望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力图在日本的特殊语境下寻求二者间的平衡。在以上论述之外，文件提出了关于战后宗教政策制定的 6 点建议：

1. 占领后应迅速发布信仰自由的宣言；
2. 在不允许利用古神道从事破坏活动的前提下允许第三类神社继续保存；
3. 伊势神宫等神社应予以封锁，在不发生事态的情况下允许存留；
4. 占领军不应损坏神社；

① 中野毅「アメリカの対日宗教政策の形成」、『創価大学比較文化研究(7)』、1990年、121頁。

② “神道非宗教论”指战前国家神道被视为“公”领域的国家祭祀，全体国民有参与的义务，而非“私”领域，国民可自由信仰的宗教。参考岛田进：《国家神道与日本人》，第7页；安良丸夫『神々の明治維新』、岩波書店、1979年、208-209頁。

③ 中野毅「アメリカの対日宗教政策の形成」、122頁。

5. 对于佛教寺院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
6. 应对基督教会予以解放,完全恢复组织和信仰上的自由。

《神道指令》正是 SCAP 根据这一意见而制定的,它将神社神道与作为国家主义的神道相互区分,在保障个人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对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的思想机构予以铲除。该文件同时具有针对日本建立政教分离原则的构想。但是其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相对宽容的处理预设,在日后《神道指令》的实施过程中也有所表现,造成了神道界的不满,认为自己相比其他宗教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事实上,对极端的国家主义的精神支持并不限于神道,佛教的日莲宗、禅宗甚至包括基督教都曾为战时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积极效力。^①

二、《神道指令》的制定与颁布

(一)指令制定之过程

在SCAP对日实施占领之初,虽然作为纲领性文件的《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中完全没有提到神道,但是神道界仍然认为SCAP有意彻底废除神道。^② 1945年10月8日东京的晨报出现国务院远东部长兼国务院与陆海军协调委员会远东小委员会委员长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的一篇广播,并被冠以“神道的官方地位被废止”的标题。他在广播中明确划分出作为个人宗教的神道与政府创造的国家神道(他使用“National Shinto”一词)。报道在民间并没有引起很大冲击,不过SCAP官员却因为事先不知道此事而表现得很惊讶,在面对宗教领袖和新闻记者的询问时,SCAP并没有准备好回答,只得承认对此全然不知情。^③

当时 SCAP 的行政机构分为参谋部与幕僚部,与宗教事务相关的是幕僚部 9 月 22 日成立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它主要负责与日本有关的公共情报的事务,和与社会、文化问题相关的政策之建议与制定。该机构初期由准将戴克(Ken R. Dyke)负责。CIE 下设六科,其中教育宗教科负责宗教相关事务,12 月 3 日教育宗教科被拆分为教育科与宗教科,但两年后宗教科又与其他部门合并为宗教文化资源局,宗教相关事务始终由中尉彭斯(William Kenneth Bunce)负责直到占领结束。

占领初期,SCAP 认为宗教与教育事务紧密相关,二者共同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

① 参考中島岳志、島蘭進『愛国と信仰の構造 全体主義はよみがえるのか』、集英社、2016 年。

② cf. H. Hardacre, *Shinto: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41.

③ Woodard W P.,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1945-1952 and Japanese Religions*, Leiden: Brill Archive, 1972, p.54.

的国家主义的精神动力,所以它们往往被放在一起讨论。CIE 共发布四项宗教、教育相关的重要指令,合称为四大教育指令。首先是阐述教育相关的基本占领政策及目的的第一指令(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方针)、具体罢免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职人员的第二指令(教职追放)、废除国家神道的第三指令(也即《神道指令》)以及以扫除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育为目的的第四指令(停止修身、地理、国史教育)。

在文森特的广播之后,CIE 的主任戴克将一份关于文森特广播的声明稿件交给彭斯,要求他起草一份指令,并告知这就是 SCAP 或者华盛顿唯一的官方指导意见。彭斯本人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专业,曾在 1936—1939 年在日本担任英语教师,其夫人也出生于日本,虽然对日本相当熟悉,却也没有多少神道的相关知识。因此在制定指令的过程中他与同事阅读了大量的材料,除了研究上述丹尼尔的作品及意见之外,还咨询了许多学界人物,其中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教授岸本英夫对指令的制定影响很大,为守护神道的存续贡献卓越。岸本除了充当顾问外,他还同时担任了宗教相关问题上 SCAP 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络人,是《神道指令》颁布前唯一看过草案及文件的日本人。由于之前彭斯关于神道的知识主要来自丹尼尔的作品,岸本极力化解彭斯对神道的先入之见。他认为联合国方面过于夸大了国家神道的影响力。两人不仅对神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还共同参与观察了许多宗教活动。彭斯很清楚神道包含非常宽泛的内容和多样的传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宣传。但是对于靖国神社这一最具国家神道特色的神社是否也可以被这样理解存在疑虑,当时的 SCAP 倾向于永远关闭它。1945 年 11 月 20 日,在岸本的中介下,戴克和彭斯共同参与了一次天皇亲拜的靖国神社神化 200 万战死者“英灵”的“临时大招魂祭”,在仪式之后,他们认为没有发现存在军国主义的问题,因而同意其继续保存。岸本后来认为这是“靖国神社逃脱的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一次危机。”^①

(二)《神道指令》之内容

《神道指令》于 1945 年 12 月 15 日以 SCAP 参谋副官艾伦(H.W.Allen)的名义正式发布。它是对第 448 号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令的俗称,其全称为“有关废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担保、支持、保护、监督、传播的文件”。^② 其中国家神道一词也因指令而广泛传播。

^① 参考奥山倫明『制度としての宗教: 近代日本の模索』、晃洋書房、2018 年、225-234 頁。

^② ABOLITION OF GOVERNMENTAL SPONSORSHIP, SUPPORT, PERPETUATION, CONTROL AND DISSEMINATION OF STATE SHINTO (KOKKA SHINTO, JINJA SHINTO), December 15th, 1945, SCAPIN-448, ndljp/pid/9885515,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指令共包括 13 小项,其中 10 项和国家与神道相互分离有关,包括:

1. 禁止国家、公共团体等公立机构对神道的管理、监督、支持;
2. 禁止对神道与神社的公共的财政支持;
3. 废除伊势神宫和各官国币社的宗教仪式;
4. 废除神祇院;
5. 废除以神道研究和教育为目的的公立学校;
6. 停止对相关私立学校的财政支持;
7. 禁止在一般的学校内开展神道教义的宣传;
8. 撤去在政府、学校等公共机构中的神棚等神道设施;
9. 禁止对不参加神道仪式的官吏及一般国民实行差别性对待;
10. 禁止官员对神社的公式参拜。

这十项内容中一半是停止国家对神道的支援与管理,另一半是针对神道教育的,在 CIE 制定者眼中只有彻底去除神道教育、国体教育,才能铲除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滋生的精神土壤。

另外三项与战前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有关:禁止包括神道在内所有宗教中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弘扬;禁止颁布《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及相关的官方书籍评论乃至与神道相关的训令等;在公文书中不准出现“大东亚战争”“八纮一字”等与神道、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相关的用语。

最初的草案还包括停止修身、地理、国史教育、祝祭日的处理、全面禁止《教育敕语》等规定,但在最终的指令中被删去,部分内容被纳入其他指令。《神道指令》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也提出了明确的界定,表现为四点:

1. 日本的天皇的家系、血统因为有特殊的起源所以比他国的元首更为优越的理论;
2. 日本国民的祖先、血统因为有特殊的起源,所以比其他国民更为优越的理论;
3. 因为神圣或特殊的起源,日本列岛比其他国家的土地更为优越的理论;
4. 对欺骗日本国民,趁机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是当同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以武力的方式解决的行为进行讴歌。前三项是民族优越论的表现,第四项是对战争进行赞美的思想。

《神道指令》的旨意不仅仅是废除国家神道,而是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和教条与国家相互分离的准则。但是因为指令一发布就迅速被冠以“神道指令”一名而广为传播,以至于它所表达的涵盖所有宗教的普遍性意义常常被忽视。正如威廉·伍德德(William Woodard)所说,

“神社神道成了被占领军鞭打的小男孩。”^① 神道被视为承载极端的国家主义宗教的罪魁祸首。战时佛教、教派神道等其他宗教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之宣传被 SCAP 所忽视。

《神道指令》建立起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它不仅仅是废止国家对于神社的管理,让诸神社成为独立的宗教组织;而且在公共机构中全面禁止一切与神道相关的仪式、信仰、神话传说、教义、哲学、神社和象征物等等。这与美国所施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并不一样,美国的政教分离是指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及与特定的宗教团体分离,未必将宗教的一切仪式与象征物从公共领域中剔除。罗伯特·贝拉将美国总统手按圣经的就职宣誓仪式作为美国公民宗教表现的重要一环,当然公民宗教仅仅存在宗教维度(religious dimension)而非宗教。^② 因而在《神道指令》中存在远比美国严格的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这也是广受神道界诟病的地方。

三、《人间宣言》与战后宪法

(一)天皇神格的否定

如果说战前的国家神道是以天皇崇拜为中心,将天皇视作现人神来崇拜,那么 1946 年裕仁天皇所发布的《人间宣言》就是从官方立场上对天皇神性的否定。1946 年 1 月 1 日,裕仁天皇继《终战诏书》后第二次肉声广播,发布《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短短一千余字的诏书一方面重申了明治初年日本立国之根基的《五条誓文》,号召民众发奋建设新日本;另一方面在诏书后半部分提到:“朕与尔等国民同在,希望与你们利害相同休戚与共。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依靠互相信赖与敬爱所结成,并非单单依照神话与传说而产生;也不是基于天皇是现人神,并且日本国民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从而延及存在支配世界的命运的这种架空的概念。”^③ 通过此极其晦涩的语言,裕仁天皇委婉否认了自己现人神的地位,因此该诏书被称为《人间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人间宣言》仅仅否认天皇是现人神,而没有否认日本万世一系天皇之神圣统治,以及天皇祖先之“神格”。尽管如此,神道界还是对此大为震惊,它动摇了明治以来国家神道的基石。1952 年新闻审查结束后,《神社新报》等神道界官方出版物措辞严厉地谴责《人间宣言》是占领军诋毁日本国体最坏的三个行为之一,另外两个是颁布《神道指令》和在

① Woodard W P.,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1945-1952 and Japanese Religions*, p.69.

② cf. Bellah R N.,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Daedalus*, 1967, pp.1-21.

③ 『官報 号外』、1946 年 01 月 01 日、大蔵省印刷局[編]、ndlp/pid/2962196、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教育中废除《教育敕语》等天皇诏书。^①

1947 年日本政府与 SCAP 共同制定了《日本国宪法》，第一条即为：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②

日本由此建立起“象征天皇制”，实现了“主权在民”的立宪愿景。天皇不再享有明治宪法规定下的国家的主权与统治权，只能在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下进行有限的国事行为，而这些行为大多数是礼仪性的。新宪法在法律层面上将天皇与政治相互隔离，约翰·道尔将这种体制称为“天皇制民主主义”。^③ 尽管在 SCAP 监管下制定的宪法日后饱受批评，特别是来自右翼的责难，但对于象征天皇制，绝大多数右翼人士最终都予以认可，他们拿出日本历史上天皇长期不亲政的例子，将其解释为恢复了天皇作为文化象征处于政治之外的传统。^④ 当然这种说辞亦可以看作日本右翼学者对无法改变的既成现实进行自我合理化的解释，不过从中不难看出“象征天皇制”渐渐被日本社会普遍接受。天皇神格的否定与“象征天皇制”的确立，至少在政治与法律层面上，将天皇崇拜这一国家神道的内核去除，这是 SCAP 改造神道的关键一步。

当然天皇崇拜的思想在战后日本并没有消失，直到今天都不断有日本民族主义者特别是神道界人士在推动“皇室尊严护持运动”，促进天皇崇拜。虽然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天皇崇拜与神道关系并不紧密，但是因为国家神道阶段将天皇奉为现人神的历史，即使在“象征天皇制”下天皇的神格被否定，神道界人士也仍然认为天皇是神道的核心和确立“何为日本人”的民族基石。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他们总是去强调天皇的万世一系和神道的深远历史，没有看到所谓“历史”仅仅是明治之后建构的扭曲“历史”，对真正历史的实相反而视而不见。

（二）宪法中的政教分离

1947 年 5 月 3 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将《神道指令》中政教分离原则作为国家基本

① cf. H. Hardacre, *Shinto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449.

②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https://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登录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③ 参考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262 页。

④ cf. Ruoff K J., *The People's Emperor: Democracy and the Japanese Monarchy, 1945–19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38–142.

制度确立下来,宪法中涉及宗教内容的分别是第二十条和第八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条规定:

1. 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
2. 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活动;
3. 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

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

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①

两条法规围绕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展开。神道界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基本表示认可,但是对于国家与宗教分离,特别是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所用,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因为战前的绝大多数神社都是国营机构,不仅仅享受国家的财政支持,而且明治四年后,寺社的土地都收归国有,因而神道界极其担心 SCAP 会没收神社的土地,所幸在占领期间神社的土地并没有被没收。^②但新宪法使得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被确立下来,它既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神道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走向,也因为生硬的法律原则与神道之间在日本的复杂情况下的龃龉而产生诸多难题。

四、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

(一)国家与宗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现代世俗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治原则。一般而言,政教分离中的“政”并非是指政治,而是指“国家”;“教”也并非宗教,而是“教会”,即国家禁止支持或压迫任何宗教机构,宗教机构也不能干涉代理国家机构。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教分离原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美国型。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国家公平地对待诸宗教,国家并不强烈地抑制自身与宗教的连结。诸宗教与国家连结,或者会出现某种宗教与国家的方针相一致的情况,并不会出现无理地终止国家与宗教保持这种良好关系的情况。各种宗教享有平等的地位,随行神职人员(chaplain)、传

^①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https://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登录时间:2019年11月1日。)

^② cf. H. Hardacre, *Shinto: A history*, pp.454-455.

教士可以进入军队在内的公共机构中。美国型政教分离强调对国家的限制,防止它过多干涉宗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教分离形式。

第二种类型是法国型。法国曾卷入强有力的宗教的对抗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就是重要的国家政策立足点。法国天主教会的实力曾非常强大,法国为了压制天主教的权力而实行政教分离。因此在这种政教分离类型之下产生对宗教严格限制的政策。宗教要与国家权力完全分离,也就是所谓“laïcité”原则:确立完全的世俗国家。

在宗教学者菱木正晴看来,根据宪法第二十条所规定,日本的情况属于法国型,国家与任何宗教都不能发生关系,实行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①因为日本曾有被国家神道所裹挟进行殖民侵略的历史,因而 SCAP 在只考虑达成完全去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基础上,制定了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而早在制定之初,《神道指令》就面临着执行困难的现实性问题。

首先,日本并不存在如法国的天主教会一样的强有力的宗教机构,尽管 1946 年刚刚成立的神社本厅将全国绝大多数神社纳入其中,但它当时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宗教联盟,远远无法发挥影响国家政治的作用。即使在战前,情况更多表现为国家对于神道的利用,神道机构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能量。至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尚处于边缘地位,不足以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②因而首要的问题是日本所确立的政教关系到底是国家与教会分离还是国家与宗教分离。

宪法中的宗教条款虽大体继承了《神道指令》的旨趣,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制定《神道指令》的 CIE 宗教科成员并没有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依照《神道指令》的第二项“本指令的目的是使宗教从国家中分离”,因而《神道指令》所规定的是国家与宗教的完全分离原则,在公立机构与活动中排除一切宗教元素。不过事实上制定《神道指令》的 CIE 宗教科对到底是“国家与宗教分离”还是“国家与教会分离”两个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在其报告中经常两者混乱使用。依据起草宪法第二十条的“运营委员会”和“关于人权的小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运营委员会对该条款予以简化和修正,要从正面保障信教的自由,同时要规定教会与国家相分离。”^③因而从立法目的来看,宪法所要规定的是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并非将《神道指

① 菱木正晴『市民的自由の危機と宗教』、現代書館、2007 年、16 頁。

② 60 年代后的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例子可能是一个例外,但 70 年代后公明党仍为应对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批评,极力摆脱与其母体创价学会的关系。

③ 大原康男『国家と宗教の間—政教分離の理想と現実』、49 頁。

令》的原则原封不动地导入进来。但是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并非十分明晰,且是在《神道指令》颁布后执行最严格的时期公布施行的。如上所述,日本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强有力的教会机构,因而宪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仍被理解为国家与宗教的完全分离,也从此出现了按照宪法字面意义理解的完全分离主义的宪法解释立场。

(二)对神道的严格限制

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与新宪法一样,最常受到的批评就是它是由美国在不考虑日本的传统和宗教的风土的情况下外在地强加于日本的。它不仅仅危害神道,还引起了日本人精神生活的混乱。在实践层面上,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占领初期非常严格,甚至有过度执行的倾向,但很快就发现这种完全分离是难以为继的。

首先在《神道指令》颁布后,司法省下发关于监狱内的宗教教诲的通牒,要求不得强制受刑者参与宗教仪式,同时指示撤去监狱内部的佛坛和神棚,而监狱中的宗教设施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在执行的过程中,神棚被立即无条件地撤除,而佛坛在短时撤去后被保留下来,不久司法省再次通牒,在可能的情况下于监狱内别置一室放置佛坛。全国各地的国立疗养机构内所建的神社全部被裁撤,而佛堂、基督教礼拜堂,乃至天理教的宗教设施却基本被保留下来。^①神道与其他宗教被区别对待,对神道的要求显然更为严苛。

《神道指令》有时被过度执行,乃至日方开始自我审查和限制。或许因为对于占领军权力的畏惧,很多地方不仅停止了官方对神社的资金支持,甚至限制私人自发为神社捐款的活动,一时间各地神社经济极其拮据。战争结束后大量的战歿者需要安葬,葬礼是宗教氛围最浓厚的过渡仪式之一,日本传统上要举行慰灵祭等神道仪式,尽管《神道指令》没有直接涉及公葬的问题,但是内务省和文部省在1946年11月明确,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非宗教仪式,禁止一切对战歿者的公葬;民间团体组织的对战歿者的葬礼,公职人员禁止列席参加,而对于文民的葬礼则无此规定。这种对战歿者和文民的区分,是将战歿者与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同列,同时将举行慰灵仪式的靖国神社与各地的护国神社视为“军国主义的神社”,予以严格限制。为战歿者所立的忠灵塔、忠魂碑等纪念设施也停止建设,已在学校内修建的以及在公共建筑物和公共用地上包含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想的纪念设施被一同去除。

从如此诸多的严格限制中可以看出,在 SCAP 及其控制下的日本政府眼中,并非要剔除

^① 大原康男『神道指令の研究』、原書房、1993年、306頁。

宗教机构或教会对政治的影响,而是要在一切公共事物中剔除宗教特别是神道的符号,因而可以认为他们所理解的政教分离原则就是“国家与宗教的完全分离”。

(四)对宗教教育的限制

教育领域是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着重实行的地方。从《神道指令》起草的过程中就能够看出,SCAP 对于神道与教育的联结极为警惕,因为它意味着极端的国家主义精神能否继续向下一代灌输。战前的日本,从明治三十二年(1899 年)文部省的第十二号训令开始,公立的学校教育就与宗教相分离,不过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基督教的精神对学校教育的渗透。^① 进入昭和时代,因为对基督教的恐惧日益淡薄,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对国民的思想进行政策引导,促使政府对于宗教教育的态度有所变化,在学校教育中禁止特定的教派、宗派、教会的教义教育和仪式,但不禁止陶冶宗教情操的教育活动,包括利用追悼会、学园祭、远足、旅行之机的宗教情操教育,以及介绍德高望重的宗教家等等。^② 因为战前国家神道并不被视为宗教,因而对于宗教与教育的分离主要针对于基督教,而且这种分离并不十分严格。

SCAP 则主要剔除神道对于教育的影响。在占领初期,神道相关的宗教教育被从公立学校中全面剔除,甚至学校组织前往寺社的见学旅行活动都受到限制。例如神奈川县一所公立学校组织学生去镰仓见学旅行,他们在神社吃午饭后,领队的教师让学生将咖喱便当收拾到一处,而被认为是“强制要求学童打扫神社”,最终那名教师和校长被一同免职。此类极端之事屡有发生。^③ 昭和二十三年(1948 年)文部省最终下发通牒:国立及公立学校组织的前往神社、佛阁、教会的访问因违反《神道指令》而被禁止。^④ 这一通牒全面禁止了公立学校对宗教设施与团体的访问,各方面对该通牒都表示出失望,很快出现诸多对该规定的反对意见和向 SCAP 的陈情与请愿。

一方面,很多观光地就是以寺社为主要景点,学生的见学旅行是奈良、京都等地的旅馆、土特产店的从业者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战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此规定实施,很多观光地的从业者将面临破产。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宗教也是日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禁止学生对寺社进行访问,使学生失去了对日本历史和文化学习的大好机会。与战前相比,占领

① 文部省「官立公立學校及学科課程ニ關シ法令ノ規定アル學校ニ於テ宗教上ノ教育儀式施行禁止(明治三十二年八月三日文部省訓令第十二號)」、『教育法規類聚』、静岡県教育協會[編]、大正元年、ndljp/pid/922794,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第 237 頁。

② 大原康男『神道指令の研究』、293-294 頁。

③ 大原康男『国家と宗教の間—政教分離の理想と現実』、43 頁。

④ 文部省「学習指導要領社会科編取扱について(昭和二十三年七月九日)」。

初期的宗教教育将“宗教情操陶冶”与“宗教教义仪式”教育一同禁止。对此 CIE 内部的教育科与宗教科也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宗教科要求在教育领域内严格的执行行政教分离的原则,教育科则相对宽松。完全地剔除具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是正常国民教育的一种损失,最终在 1949 年 10 月 25 日,文部省又下发通牒:“允许在非强制、命令的情况下,对国宝和文化遗产的研究或以其他文化上的目的而由学校组织的寺社访问。”^① 宗教教育的相关规定大为放松。

五、结 论

学界能够对具有神道色彩的天皇即位仪式进行抨击,源自于 1945 年 SCAP 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它给日本带来突然而至的世俗化进程。SCAP 的宗教改革基于战前美国学者对国家神道的一系列认识,把它看作是天皇崇拜与原始神道的扭曲结合,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的精神源泉,要使日本免于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就必须铲除这一“精神武装”。教育领域是 SCAP 关注的重点。而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则是受到结构性压迫的待解放者。因此 SCAP 通过《神道指令》使国家神道解体,神道被踢出神坛,成为与佛教、基督教同等地位的普通宗教,又通过战后宪法将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建立起来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不同于政治学上一般理解的政教分离,因为它并非国家与教会的分离,而是国家与宗教的完全分离,在某种程度上贴合法国的“laïcité”原则:建立起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尽管这一原则针对所有宗教,但其他宗教显然比神道受到了更多的优待,一切与神道相关的仪式、信仰、神话传说、教义、象征物等等在公立机关中被全面禁止。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鸿沟,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准则,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产生种种疑难,因而难以被严格执行。在占领后期,除了教育领域之外,包括战死者的公葬仪式、皇室葬礼、靖国神社的公式参拜等方面,《神道指令》的适用条件都极大松弛,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战后日本民主化的建设及冷战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 SCAP 转变对日政策有关。占领结束后《神道指令》停用,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并不明晰的状态下被新宪法继续实行下去,它所诱发的矛盾仍在不断发生。直至 1977 年“津市地镇祭诉讼”引入“目的效果基准”的司法解释后情况才有所改观。^② 但无论如何 SCAP 所确立的完全的政教

① 文部省「社会科その他、初等および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宗教の取扱について(文初庶第 152 号)」,昭和 24 年 10 月 25 日、大阪教育法研究会、<http://kohoken.chobi.net/cgi-bin/folio.cgi?index=sch&query=/notice/19491025.txt>。(登录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

② 参考『行政処分取消等』、最高裁判所大法廷、昭和 52 年 7 月 13 日、判例集:民集 第 31 卷 4 号、533 頁、2 頁;平野武『政教分離裁判と国家神道』、法律文化社、1995 年、11-15 頁。

分离原则都奠定了战后日本政教关系的基本形态，也是对日本右翼特别是神道界希望神道重回“国教”地位的最坚实防线。

（王子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心大事记

2021 年上半年

- 1月 徐静波教授专著《原色京都:古典与摩登的交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 1月 贺平、沈逸主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的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3月9日 复旦大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2020: 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非常态与新常态》发布。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主持,课题组成员对各自承担的专题进行了介绍,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季风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研究员作了精彩点评,线上线下130余人参加了发布会。
- 3月20日 中心与日本中央大学、财团法人中日创新中心、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线上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酒井正三郎中央大学总长、滨田健一郎创新心理事长致辞;日中协合理事长·中央大学经营管理学院特任教授服部健治先生作「歴史から見た日中経済協力の意義を如何に再認識するか」基调报告。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日本中央大学校长助理李廷江教授、JETRO广州代表处清水顕司首席代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寄南研究员、复旦大学胡令远、袁堂军、包霞琴、张浩川、高兰、贺平、王广涛等20余名中日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 3月21日 第一期“沪上日本史研究工作坊”在中心举行,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等上海、苏州两地的青年学者参加工作坊。
- 3月23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主题为“长三角一体化与中日经济合作的新机遇”,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家

- 委员会委员姚为群教授主讲。
- 3月30日 王广涛副教授参加日本山口大学举办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日韩三国的政策应对与制度变化”在线研讨会并发言,发言题目为《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以及中日合作的动向》。
- 4月6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美欧亚盟国对华关系的新特点”研讨会,作《国际新格局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势》主题报告。
- 4月22日 贺平教授参加第八届日本研究杂志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华日本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承办,主题为“日文参考文献格式规范研究”。
- 4月23-24日 胡令远、贺平、王广涛参加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华日本学会年会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日本与东亚形势”学术研讨会,胡令远做《日美对华认知战略性变化背景下的因应之道》大会主旨演讲,贺平和王广涛分别做《日常之锁与理论之眼——〈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日本参与五眼联盟:动因、限制与走向》学术报告。
- 4月25日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2021”。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变局下东亚区域发展与中日关系”,复旦大学八位博士生报告了论文并参与主持、讨论和点评。
- 4月28日 三菱商事(上海)企画业务部沈震乾先生一行来访,贺平、王广涛接待,并就中日经贸关系以及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
- 5月1日 王广涛译著《财阀的时代》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5月7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日本LAOX执行董事、中国乐购仕总裁傅禄永先生主讲“双循环下中日经贸变局”。
- 5月7日 胡令远主任接待韩国驻沪首席领事千成焕、经济领事朱原爽,就拜登执政后中日韩美关系的变化进行了交流。
- 5月10日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水田贤治访问本中心,胡令远、贺平、王广涛接待,就中日经贸关系进行了交

流。

- 5月15日 王广涛参加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政党与国家治理论坛并发言,题目为《日本政治右倾化与社会右倾化辩证关系研究》。
- 5月24日 中心举办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16周年校庆报告会,主题为“拜登执政与中日美关系的变数”。胡令远、高兰、贺平、包霞琴、王广涛、王天然分别作主题发言,高兰主持。
- 6月 徐静波教授专著《同域与异乡:近代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图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6月1日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女士访问中心,胡令远、高兰、贺平、王广涛接待,并就合作事宜进行商谈。
- 6月5日 王广涛参加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复旦两岸青年论坛研讨会,并做点评。
- 6月15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三井物产”系列讲座,主题为“东亚民俗文化一瞥——中日端午节之异同”,由复旦大学校友、上海商学院日语系主任洪伟民教授主讲,复旦大学日语系邹波主任主持。
- 6月17日 高兰教授参加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与周边安全形势专家研讨会”并发言,题目为《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中日关系分析》。
- 6月25日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助理松本千绘访问中心,胡令远、贺平、邹波、王广涛接待,并就合作事宜进行商谈。
- 6月26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茶道里千家”冠名讲座,由日本茶道里千家准教授蒋海霞老师主讲,中心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主持。

(王广涛)